

炎黄春秋

第 **5** 期
2010年

文件重读：在报刊上展开批评

科学家与农民竞放“卫星”

何方：全球化的几个问题

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

苏东国家领导人更替的教训

目 录

求实篇

- 1 重温《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徐晓波
- 4 全球化的几个问题 何 方

往事录

- 12 科学家与农民竞放“卫星” 薛攀皋
- 19 山东的法制“大跃进” 肖 磊

人物志

- 23 寻找王佩英 郭宇宽
- 30 何家栋的尊严 杜 光
- 34 陈独秀是中国最早的工运领袖 胡甫臣

一家言

- 38 改革的可持续性决定执政的可持续性 章立凡
- 41 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 周筱赟

沉思录

- 47 苏东国家领导人更替的教训 张利华
- 49 秋瑾案与林昭案的启示 刘凤梧

怀人篇

- 51 我的父亲李汉俊 李声馥
- 54 林韦这个人不会长寿 陈泊微
- 57 怀念张遗 李洪林

亲历记

- 61 我家的“阶级敌人” 张 安

争鸣篇

- 64 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 周 拓
- 66 被埋没的红军攻占长沙大捷 李维民

访谈录

- 68 李锐谈“周惠谈话” 盛禹九

忏悔录

- 72 背负杀人的自责 王冀豫

品书斋

- 76 贱民的样本 张 鸣

海外事

- 79 印度的宪政之路 思 源

编读窗

- 65 理性批判的范围是什么 朱震林

顾问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荣华 李 普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杨继绳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徐 孔(副召集人) 秦 晖 袁 鹰
高尚全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曾彦修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徐 孔 吴 思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副 社 长: 徐 孔 杨继绳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网络总监: 张晓鸥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本 刊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 yanhcq@sina.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辑室: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

传 真: 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定价: 6.90元

重温《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 徐晓波

1950年4月19日,新中国宣布成立不到200天,中共中央即发出了新闻宣传方面的一个重要文件,这就是《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注1}。这是当代中国新闻史上,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出的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关于新闻舆论监督(批评报道)的专门文件。

一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就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成为执政党后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1944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先后发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要求全党对于李自成的教训要“引以为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的周期率时说了一段著名的话:“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会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国家才不会人亡政息。”^{注2}

那么,怎样才能跳出周期率,防止执政后的腐败,使中共赶考考出好成绩?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第一次写进了党章:“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

1950年初,中共中央由刘少奇直接领导了关于在报刊上公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件起草工作。4月19日,经刘少奇作了认真修改的《决定》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注3}。4月22日,

《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这个《决定》,并配发了列宁和毛泽东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论述。次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同时刊发了题为《坚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的两篇社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闻战线》杂志重新刊发了这一《决定》,并发表评论员文章号召新闻界《开展一次报纸批评问题的讨论》,以促进“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积极地正确地开展起来”。

二

尽管《决定》全文只有1800余字,但内容却十分丰富,涉及到报刊批评与自我批评报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方式方法和具体要求等方方面面。

《决定》首先深刻而简要地阐释了这一决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之所以要“在一切公开的场合,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开展对于党和政府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因为随着革命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的领导权、成为执政党后,党及其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同时,又因为革命成功后党的领导权威信提高,很容易产生骄傲的情绪,在党内党外都拒绝批评,有的甚至是压制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特别是在具有广泛公开性的报刊上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监督党和政府及时修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和政府“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

《决定》的第一段文字对这种以报刊为载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了界定:“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

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这里的批评,就是“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自我批评,就是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上对下”的批评,不是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对下级或人民群众中存在的缺点错误和落后现象进行的批评,而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批评,是“下对上”的批评。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在党内展开而是在社会上展开,不是内部文件、会议或面对面的形式,而是“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自由地”进行的形式。

《决定》随后指出,要公开在报刊上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应该在党内和人民中进行两方面的教育。一是要教育党员特别是干部正确地认识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因此,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对报刊上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而对群众批评置之不理、限制发表和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与嘲笑的官僚主义态度,则要坚决予以反对。要让“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和建议”,即使是这些批评和建议并非完全成熟与完全正确,也不能因此而受到打击与嘲笑。《决定》特别指出,这个方面的教育“是主要的方面”。二是要同时教育报纸刊物的编辑人员、记者、通讯员和人民群众去区别性质不同的两种批评。《决定》把报刊上的批评分为正确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正确的批评是指“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农民)以促进和巩固国家建设事业为目的、有原则性有建设性的、与人为善的批评”,而破坏性的批评则是“为着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纲领、为着破坏纪律和领导、为着打击人民群众前进的信心和热情,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和散漫分裂状态的”批评,“特别是反革命分子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对于这类批评,报刊工作人员必须加以拒绝。

为了使报刊批评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决定》规定了四个方面的具体办法,要求各级党委与党报工作者切实地加以执行:

1. “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这就是说,报刊在刊发批评报道时,无需经过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审定,也无需与被批评者见面,而是由报刊独立地、自主地确定是否可以或应该刊发。只有在“报纸刊物的人员对于自己不能决定真伪的批评”,才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但是《决定》又强调,“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决定》对这一规定的理由的解释是,“过去在许多地方曾经实行一种办法,就是把批评党和政府的组织与人员的稿件送给被批评的组织 and 人员阅看,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加以发表。这种办法,在战争期间调查不便的条件下,曾经避免了许多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和不周到的批评,但是在现时的条件下继续采取这种办法却是害多利少的,不对的”。在这里,《决定》将报刊独立地、自主地进行批评报道的权利,与报刊独立地承担这种批评报道的责任统一起来。^{注4}

2. 对于报刊通讯员采写的稿件,也同样适应第一个方面的规定,不受党政组织的审查决定或征求被批评者的意见。通讯员的工作,由报社领导,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协助。《决定》特别强调,“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力压制工农通讯员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或加以报复。”

3. 对读者来信中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批评进行了具体规定。对于有益的批评性读者来信,《决定》要求,凡是报纸刊物能够判断其为真实的,就应当予以发表。对于读者来信刊发时是否用真实姓名的问题,《决定》说,“投书者应将真实姓名住址告知报社,但报社得依投书者的要求代守秘密。”这就十分明确地表明,批评性的读者来信在报刊上刊发时,是可以不署真实姓名的,只需将真实姓名、地址告知报刊社即可,而且报刊社有为来信者保守秘密的义务。

4. 批评报道刊发后的处理问题。批评报道刊发后,如果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果有部分失实的,“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果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

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而且,因“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由于当时还存在一些民主党派主办的报刊和民营报刊,《决定》还规定,“党外报纸和刊物在同样精神上采取同样正确的态度批评党的组织和人员时,党也应当按照同样的办法给予应有的合作和支持。”

三

在新生政权面临着复杂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发布这一《决定》,号召人民群众“公开地”、“自由地”批评党和政府的缺点和错误,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坚定决心和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强大自信心。这一重大决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各界对中共的这一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报纸刊发的普通群众的来信即可见一斑:“对于中共中央这一严肃认真的决定,实在感动万分,使我一向在思想上对共产党所存在的顾虑,一扫而空。”“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和决定,是中国共产党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又一具体表现。因为只有真肯接受批评,改正错误,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政党,才会办好人民的事业。”^{注5}

自中央《决定》发表后,《人民日报》在1950年4月当月即收到读者来信1674件,较3月份增加1倍,而5月份则增加到2487件。随之而来的是当代中国新闻史上报刊批评报道第一次高潮的兴起。《人民日报》和各级党报在1950年和1953年间刊发了大量的批评性报道和文章,仅《人民日报》就刊发了4243篇,其中1950年为753篇,1951年为1749篇,1952年为1741篇,1953年为1027篇,三年中日均刊登批评稿超过4篇。^{注6}当时一些轰动一时的批评报道,不少都是由《人民日报》予以报道的。各级党报的这些批评报道,不仅没有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反而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毫无疑问,《决定》的发布和实施,对于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共探讨民主新路、巩固政权、反对

腐败和执政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通过报刊这种公开的形式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增强了人民当家做主、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以及监督、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完全可以说,《决定》是中国当代新闻史上中共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一个纲领性文件。60年后我们重温这一《决定》,尽管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它对于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注释:

注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版,第5-8页。以下《决定》引文均引自此。

注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注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版,第45-47页。

注4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唯一一次在党的文件中,规定报刊开展批评或新闻舆论监督应由新闻媒体或媒体的记者编辑亦即报刊编辑部独立负责。自从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对此进行修改后,中共党的文件中再也没有出现这类规定。

注5 《人民日报》1950年4月28日第6版。

注6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

(作者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吴思)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 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全球化的几个问题

• 何 方

新中国诞生以来的六十年,先后经历了国际化与全球化各为三十年的两个时期。头三十年是国际化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我们采取了消极和抵制态度,执行了闭关锁国政策,因而丧失了一段良好的战略机遇期。后三十年,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化已转变为全球化,我们适时采取了积极参与态度,实行对外开放,这才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现在,全球化正在迅速发展,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否意识到和是否愿意,都已被越来越深地卷入其中。虽然人们对全球化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但是有些方面的经验教训还容易被忽视,因此值得一再提出并进行新的探讨。下面就谈点个人对全球化几个问题的看法,供大家讨论。

一、从国际化到全球化

全球化这个名词,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在这之前,人们把各国之间的相互交往、合作与融合的过程称为国际化。它是同资本主义共生共长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既然叫国际化,自然是在民族国家开始形成之后,否则也产生不了“国际”这个名词。而民族国家的形成,又正好是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同步。因此,人们就把国际化的源头定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初期发展比较缓慢,国际化在很长时间也发展得很慢。直到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国际化才发展得快了起来。这首先表现在国际贸易的大幅增长和对外投资的开拓。但是这一趋势,不久又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打断。战后,资本主义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国际化也出现萎缩。直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情况才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化得到快速发展,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这正是新中国建国的头三十年。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自由竞争的传统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干预和调节的现代资本主义。这一转变,使资本主义摆脱了经济上的长期停滞,促成一轮经济和科技的空前大发展,把人类社会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也说明资本主义仍然具有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既没有垂死,也不完全腐朽,还没有为其他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取代的迹象。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引起一些人关于资本主义行将崩溃的议论。其实,这种议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时也曾出现过,后来被90年代的高速发展把它从人们的记忆中给冲淡了。

上世纪70年代前后,除发生“滞胀”外,一个更重要的历史事态就是: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崛起和飞速扩展,很快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内容和国际经济关系。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也掀起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高潮,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世界贸易,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谈资本输出(还多为间接投资)完全不能相比的。据一项研究报告,90年代中期,全世界一百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中,已有51个是跨国公司。

人们看到,跨国公司越来越代替国家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发挥主要作用,再加上各种国际组织的作用大为提高,人类相互间的交流和融合,已非国际化所能涵盖的了。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经济学家T.莱维在1985年提出全球化这个名词并很快得到普遍使用。从此,全球化风靡世界,已经很少人再使用国际化的老概念了。

至此,我们就可以为国际化和全球化简单归纳出几点区别。第一,国际化的行为主体,主要是

主权高于一切民族国家。全球化的行为主体,则除了国家外,还有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以至个人。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加深与扩大,国家的作用还在不断减弱,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却越来越大。第二,国际化实际上缺少对各国都有严格约束力的规章制度和必须遵守的国际法规。全球化则有越来越多和越来越严格的国际制度、法规和组织,约束着各国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促进传统的国际关系不断地和迅速地全球化转变。第三,国际化不要求各国对本国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也不一定要求各国和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对世界经济和其他公共事务进行协调、规划和监管执行。而全球化除需要各国对本国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外,还一定要求它们对越来越多的世界问题,包括经济、政治、环保、气候、卫生等,进行越来越深入的协调和越来越严格的履行。第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正在形成全球性的意识、观念、伦理、价值等构成的全球文化。人们在保留民族文化和国家意识的同时,也要从全球利益考虑问题。“保护地球”成了所有人的共同责任。

二、全球化的基础与动力

其实,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主要区别还在于世界各国是否都要实行市场化。在国际化时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进行市场化改革,没有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当时的苏联、中国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由于市场化在全世界得到迅猛扩展,不但推进全球化出现高潮,完成了从国际化向全球化的过渡,而且也为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形成和发展做了夯实和扫尾的工作。所以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就在1995年11月1日的一次会上说:“将来,当历史学家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们视为突出的事件也许不是两个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束。这么多的国家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也许是更震动更大的变化。这是一场把亚洲、东欧、拉美和非洲几十亿人送上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的运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都验证了

萨默斯的预言。中国的改革只比印度早十多年,就从经济上人均GDP落后于印度而很快赶上和超过了它。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时期也为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改革。这场波澜壮阔席卷全球的市场化运动,是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过的。只是有些人淡忘了,不是想继续努力,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市场化,而是要停止前进,甚至实行倒退了。

市场化不只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和参与全球化的起点,而且是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每个国家,要求得到经济迅速发展和赶上世界潮流,就必须对内和对外都尽快实现和不断完善市场化。中国曾经耽误了一段国际化的黄金机遇,成为全世界的最大落伍者。后来多亏实行了改革与开放,才没有再次掉队。但由于市场化过程中没有同时启动政治改革,就不但妨害了市场化本身的完善和成熟,而且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制度性腐败,为今后社会发展留下极大隐患。

如果说市场化是全球化的基础,那么,信息化就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由于信息化具有传播快和普及快的特点,就迅速以电脑、互联网、传感器等手段织成了一个把世界所有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囊括在内的大网,几乎没有什么人群和事物可以漏网在外。1995年,非洲只有5个国家与因特网连接,三四年后就已经是47个国家了。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加上交通工具的日益便捷,就使人们发现,世界原来是“平”的,整个人类都住在一个“地球村”里,无论远近,大家都成了“邻居”。这既便利了世界一切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交流与来往,同时也对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作出一定约束。原来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已经远不够用了,而应以全球社会或世界社会的命名所取代。原来所说的参与国际社会,现在也就是参与全球化了。在当今世界,过分强调民族特点,自外于全球社会,那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了。

三、全球化并不限于经济

大概是为了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不受外来影响,我国的舆论导向一直把全球化限制在经济范围内,每谈全球化,前面必得冠以“经济”二

字。其实,这是违背事实,也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早就说得很清楚,“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单方面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经济固然是全球化的基础,但全球化并不限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也在或快或慢地“化”着。而文化本来就无疆界,所以“化”得最快。

就以政治来说,全球化所表现的国内政治国际化和超国家权力的日益加强都是很明显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也必然会反映到政治上来。所以,伴随全球市场化潮流,也兴起了全球民主化潮流。对此,我们以前曾在别的地方谈过,这里不再重复。总之,如同市场化一样,民主化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再艰难也得走,只能是早走或晚走的问题,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

民主化不单表现在各国内部,同时也表现在国际关系中,而且两者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使人民群众更多地关心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活动,更积极地参与外交决策和对外活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新兴国家的崛起,也打破了美欧几个大国控制和主导国际事务的格局,国际关系越来越走向民主化了。而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的民主化,反过来又会推动各国的民主事业。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不断提高各国人民的政治觉醒,使许多国际活动成了大众性的共同活动。不但在国家之间建立起各种越来越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法规和组织,而且成千上万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活动,也都早已超越国界,实现全球化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交往和活动超出了国家管理范围,成为人民之间的事了。外交的性质和内涵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文化的全球化也许发展得最快最明显。知识的全球传播和普及,使后进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可以走很多捷径,缩短追赶发达国家的时间。而且文化的全球化,还表现为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不但后进国家吸收先进国家的文化,而且后进国家也可保护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并将其中的优秀成分融合到全球文化中去。所以文化的全球化,就是融合与多元两种趋势的并存。经济、政

治的全球化无法阻挡,文化的全球化就更无法阻挡了。这里可以举一个属于文化现象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曾提出要来一次服装革命,用西装代替中山装。此事遭到陈云的批评,说“送煤球也得穿西装?”由于邓小平、陈云二老都不穿西装,害得胡耀邦也不便于在正式场合穿西装,只能在家里或其他非正式场合穿一下。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服装革命到底阻挡不住,没过几年,大约连最反“西化”的人也穿起了西装。

四、全球化对谁有利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国家领导和舆论导向,长期以来总是强调:全球化只对发达国家有利。典型的提法是十多年前主要领导人在一次外事会议上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紧跟的说法就更多了,如全球化就是西化,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我们应该支持反全球化的群众运动等等。直到不久前,还有人说,“现在,全球化进程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这些国家从全球化中得益最多,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受惠很少甚至其利益不同程度地受损。”(梁守德、李义虎主编:《全球化与和谐世界》,2007年版,第70页)。2008年7月17日《中华读书报》上登了一篇《经济全球化:谁是赢家?》的书评,也说,“总体而言,发达国家是这一过程中明显的‘赢家’,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数都是‘输家’。”如同从来没人总结一下国内历次反世界潮流的教训,所以现在竟然还有反普世价值的逆流存在一样,在宣传教育上讲了多年的全球化对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利的说法,还真值得重提一下。

与我国的上述舆论相反,西方一些学者早就指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最有利,而对发达国家不利。例如1998年5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经合组织一项研究报告表明,一些成员国表现出强烈抵制全球化的迹象,把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扩大等都归因于全球化。这当然也有点偏。全球化开始时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完全吃亏,它们不会干。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即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和世界形势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无

论什么国家都阻止不了的。实际上,全球化对多数发达国家还是有利的。20世纪末和2007年前这段时间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是证明。即使对一些国家不利,它们也不得不积极参与,以适应潮流和从中谋利。反其道而行,只能给自己带来失败和损失。历史表明,全球化相对来说,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些。全球化在整体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加速发展,增加了他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据世界银行资料,从上世纪90年代起,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已经是发展中国家,它们贡献的比重那时就达到70%,也扭转了整体上南北人均差距拉大的趋势。

全球化不但促进了发展中国家整体高于发达国家增长速度的发展,还在发展中国家里缔造了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一批新兴大国。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几个新兴大国,能够抓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呢?以中国为例,除了本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我们的低人权、低劳动成本和高投入、高资源消耗等国内条件以外,还由于遇到了好的国际经济环境。这主要指:“二战”后第三次技术革命提供了大量成熟技术可供我们采用;又碰上发达国家在进行产业升级转型,我们填补了它们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和产品。

而且说实在话,就是“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安排,对发展中国家也是有照顾和优惠待遇的,并不像以前极左宣传所说,完全是为了剥削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积极要求参加关贸总协定(后改为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并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原因。

如同说全球化只对发达国家有利一样,我国领导人和舆论导向还长时期以来强调南北差距的扩大。直到最近,一些书刊还在做这样的重复。其实,就上世纪后半期,南北差距(总体增速而不是人均)也是一直呈缩小的趋势,只有一个很短的时间除外。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新兴大国,更是在带领世界经济增长,用事实回答了差距扩大的论断。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有个小小的教训,就是在观察国际问题时要允许并听取来自下面的不同意见,不能总是盲目地只

唯上不唯实。

五、全球化的趋势和前景

在这个题目下打算谈下面几个问题。

(一)全球化将进一步加速发展

说全球化的趋势和前景,就是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不然。因为不论中外,悲观论和唱反调的还不少。例如英国的戴维·赫尔德和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的一本《全球化理论》,就在《引言:危险中的全球化》中提出了许多“全球化消亡”的观点,如“全球化时代结束了”、“全球化的尽头”、“正在沉没的全球化”等。国内反对全球化和认为全球化因引起的矛盾太多而不能持续的看法也不少。所以谈这个问题并非多余。

经济全球化仍在迅速发展,不要只看各经济实体间的竞争和争夺,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协调、合作和融合。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没有也不会发展成1929年的大萧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要国家没有完全采取上次那种以邻为壑和单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是实行了国际协调与合作。而且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还往往在“润物细无声”中进行着,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已分不清国货和洋货了。例如在生活用品上的中国名牌,已多为外国资本经过控股或收购所拥有。中华牙膏早已为荷兰人所有,金龙食用油属新加坡公司,娃哈哈为法国人收购,汇源果汁为可口可乐收购,南孚电池为美国吉利集团收购,等等。可见,在日用品上要想支持国货,表现点“爱国主义”,已经很难了。其他机电产品更是如此。其实,这也是参与全球化的必然现象,对我们并不完全是坏事。如果我们不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经济也不可能得到快速发展。而且这种渗透是相互的。我们在经济发展起来后已重视对外投资,特别是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

经济的全球化一定会反映和影响到政治上来。政治全球化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全球化主要表现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相互交融,超国家权力的不断加强,全球社会的逐渐形成。传统上属于国内政治的一些事务,会

受到国际社会的干预和介入。同样,参与国际事务的除国家外,还有团体(特别是各种非政府组织)、企业以至公民个人,而且参与的程度越来越深,范围也越来越广。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超国家权力,不同于主权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权威,而属于全球公民社会。它虽然没有主权的刚性,但约束力已越来越大,国家、团体、企业以及个人都要受其制约,国界、国籍的重要性则在减弱。

文化的全球化也不仅表现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日益广泛和深入,更表现在各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逐步合成包括一切文化精华的全球文化。原来的一些民族与地区文化则渐次消失。例如世界上的语种就在逐步减少,世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在日渐趋同。

总之,全球化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阶段,是长时间持续的宏伟世界潮流。事实证明,对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而言,积极参与全球化,各方面都得利,过分强调民族国家和地区特点,无论全面地还是局部地抵制全球化,都注定失败。全面抵制,全面失败;局部抵制,局部受损。这是不会有例外的。

(二)全球化与和平发展时代

全球化跟和平与发展时代是相辅相成的。世界不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自然就不可能有全球化。道理很简单,没有世界处于和平状态(局部冲突不算,它们也确实没碍),就谈不上全球化;而没有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也全球化不了。反过来,全球化又更有利于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

全球化有可能使人类争取到持久和平,避免世界大战。这有三个明显的原因。第一,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沉痛教训,人类理性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已在反对和避免世界战争(即大国之间进行的使用毁灭性武器的战争)问题上达成共识,任何有资格挑起世界大战的国家都不敢贸然行事。民族矛盾、领土争夺、宗教冲突、反恐等引起的战争仍将不可避免,但会限制在局部范围,不可能酿成世界大战。第二,全球化就是全球走向一体化,各国和各地的利益已越来越交叉重叠在一起,这就限制了大国和地区之间的战争。例如在欧盟内部发生战争已经不可想象。第三,科技的迅速发展也是避免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更新更具威慑力的武器还会不断出现,实际

上的军备竞赛也还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既是防卫问题,也是国际和国内的政治问题,还是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但研制和使用终究是两回事,到一定时候就又会协议裁减。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展,各种裁军问题终会提上议事日程,并会逐步缔结出一些裁军协定来。

至于全球化促进发展,那就更明显了。例如:全球化极大地开拓了市场,以信息和交通的革新压缩了时空的限制,加速了新技术、新产品的传播和普及。全球化把人类带进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使各种发展周期,科学—技术—生产,产业的转型和升级等,都大大缩短了。人类历史上,从天文革命到工业革命,用了几百年时间。但从量子科技走向信息革命,只用了几十年时间。现在互联网、手机等传递方法和手段,更是日新月异,发展变化得十分神速。全球化不只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交换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以至思想观念。全球化日益突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人们不但要放眼世界,而且可以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例如1949—1979年国际化时期的三十年里,中国出国人数总共只有28万,每年不足1万。可是2008年一年就有4000多万人出国。全球化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是全方位的,其速度之快,是人们都能看到和体会到的。

(三)世界社会与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与国、人与人的相处越来越接近,交往越来越频繁,接触越来越密切。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国际化时期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已经不适应和不能涵盖新的形势和新的内容了。全球化以后,世界上的国际、人际关系已发生巨大变化,虽然人们还在使用国际社会这个概念,但内涵已经是全球社会和世界社会了。

人们看到,全球化的生产力已经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国家界限,世界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各国经济都从整体上在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例如中国出现两亿多农民工这个新的群体,就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结果和表现。他们为中国三十年来的快速发展立下了最大功劳,但也因给世界提供廉价产品而为全球化做出了最大牺牲。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仍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没有竞争就

没有进步) ,中国正是靠廉价取胜。与过去不同的是 ,国际间的协调与合作已经越来越占上风。各国的参与全球化 ,也就是在合作中竞争 ,在竞争中合作。

在政治上 ,全球化就是国际政治国内化和国内政治国际化。以前 ,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和争夺是国际政治的常态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现在 ,人类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 ,因此需要寻求尽可能多的互助合作 ,求得共同发展。在大国之间 ,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的手段 ,不但极其不得人心 ,而且各国都已经不再定为基本国策了。现在 ,以至今后相当时期 ,许多国家还在增加军费、加强战备。这既有国际政治上争强好胜的惯性 ,也有国内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对这种多少带有军备竞赛性的事态发展 ,人们必须提高警惕 ,正确应对。但也要看到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 ,世界大战和大国之间的战争已很难打起来 ,各国都在把争取和平发展定为基本国策。

在文化上 ,由各民族文化中先进和优秀部分形成全球性文化的过程仍在继续 ,这就是文化在更大范围和更多领域的交流与传播 ,既是本民族本地区文化向全球文化的扩展 ,也是全球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为本民族本地区的采纳。人们在保留自己民族和地区文化的同时 ,也都承认人类文化的共性 ,从而正在逐渐形成与全球文化相适应的新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而生活方式和日常消费上的相互学习和模仿也许来得更快。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国际政治协调的加强和各民族文化的趋同 ,使以全球化为基础的世界社会逐渐显露出雏形。国家与社会不同 ,国家关系与国际(或世界)社会也应分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 ,人们就有了两重身份 ,既是本国公民 ,要为自己的国家服务 ;又是世界公民 ,要为了保护地球尽责。所以还在全球化初期 ,邓小平就说 :“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 ,而成为世界公民。”他也一再强调 ,在珍视国家独立主权、树立民族自信心的同时 ,要为世界尽可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首先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这也是世界公民最多的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所应承担的光荣任务。

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社会的形成 ,说明国际化时期的国际机制 ,即为稳定国际秩序和规范国

际行为建立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和交往规则 ,已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而必须经过不断改良和革新 ,逐渐建立起新的全球化机制。这就是人们说的全球治理。新旧机制的替代是渐变的 ,所以人们容易不大在意 ,其实差别并不小。例如 ,参与旧机制的成员主要是国家 ,新机制就扩大到全球的和地区的各种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 ,以至个人。旧机制建立在大国操纵和传统均势的基础上 ,第三世界没有多少发言权 ,新机制则以多极化和多元化为基础 ,并在逐渐走向民主化。旧机制管辖范围有限 ,涉及的方面也较窄 ,新机制涵盖全球 ,管辖范围也越来越宽。旧机制遵守主权不可侵犯原则 ,新机制则要求让渡一定主权 ,并日益介入各国政治。旧机制的强制性较弱 ,新机制的超国家权力却在不断加强。

如何面对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有两点注意事项。

其一 ,必须更新观念。也就是周有光老人所说 ,“过去从国家看世界 ,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 ,现在的世界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 ,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 ,一切事物都要重新认识。”(《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例如过去只替国家民族着想 ,现在就必须同时为整个世界着想。如果说 ,过去在民族还没有完全独立时 ,提倡民族主义有进步意义 ;那么 ,在全球化和国家已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时 ,还强调民族主义 ,颂扬排外 ,到处说“不” ,那就只能是反动的了。

其二 ,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社会 ,既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和世界社会赋予的权利 ,也必须为全球化负责任和尽世界社会成员的义务。国家、个人都应该如此。不但观念必须更新 ,而且实际行动和具体做法也必须改变。例如 ,过去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认识 ,对一些灾害、事故、疫情等尽可能秘而不宣 ,现在就应主动、透明、及时向外通报。实际上 ,随着人类共同利益的增多和技术的发展 ,过去许多保密的事情也应当公之于世 ,不能再采取鸵鸟政策了。既然已经融入世界社会 ,那么政府行为就不仅要接受本国人民的监督 ,而且也应该接受世界人民的监督。所谓负责任的大国 ,就是要自觉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 ,主动为世界做贡献。

六、全球化冲突

全球化是一种社会进程,不是一种社会状态。全球化进程没有也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矛盾、冲突以至二律背反。所以我们这里借用美国学者霍夫曼的话作为本节标题。而且全球化即使在不出现大反复的情况下,也顶多是进两步退一步的局面。整个说来,它的总趋势可归纳为:长期的发展和短期的倒退。

伴随全球化进程的矛盾和冲突极多,我们这里只能谈其中的几个。

(一)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全球化发轫之初,就出现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参加的主要是各国的弱势群体。因为全球化进程确曾给许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失业率上升和两极分化加剧的现象。身受其害的人们及其代表反对全球化是很自然的。当然,参加反全球化运动的成分也很复杂,除上述受害的弱势群体外,还有不同人群中的加入者,如社会极端保守势力、反对外来文化和普世价值的狭隘民族主义、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无政府主义、某些不满现实的非政府组织,还有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等等。他们的动机和目标不同,但在反对全球化上却走到了一起。前面提到的世界各国中最大的弱势群体中国农民工,却并没有参加反全球化运动。这是因为,一则中国的社会环境不允许,他们或许并不了解全球化是怎么回事;二则他们还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算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试想如果没有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来料加工、扩大出口等措施,他们也就没有机会外出打工。正是由于可以利用低人权和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参加国际竞争,就使中国成了所谓的“世界工厂”,影响到外国的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水平产业的工人就业和收入,促使他们参与反全球化运动。所以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是一对非常复杂的矛盾,两者无法以正义与否来分。

但是正如前面一再论证的,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进程,既不由人的意志决定,更不是人力所能改变。因此,不管反全球化的一些弱势群体多么值得同情,他们的呼声多么响

亮,但是就整体而言,这个运动是违背历史潮流、没有前途的。正像产业革命初期手工业场工人起来砸机器一样,最后只能从历史上逐渐消逝。近几年,反全球化潮流有所减弱,也许就是兆头。

其实,认为上面提到的失业率攀升和两极分化加剧等问题由全球化带来,那也只是表面原因,根子还在各国的制度和政策。如果政府能够适应全球化潮流,及时改变不合时宜的制度和政策,就有可能妥善对付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例如中国改计划经济制度为市场经济制度,就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还避免了大失业浪潮。但由于缺乏政治改革的配套,又使两极分化之快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据联合国开发署2007年8月的《人类发展报告》,表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中国是0.469%,资本主义的日本只有0.249%,反倒是亚洲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

又如巴西,长期以来都是以贫富差距之大、失业率之高和贪污腐败之严重,在拉美以至世界上出名的国家。前几年的几次世界反全球化大会,也是在那里举行的。可是自从七年前卢拉当选总统以后,适当地调整了经济社会政策,就使巴西的经济得到较快增长,基尼系数有所下降,贪污腐败问题有所好转。结果,巴西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得到显著提高,国内形势稳定,增强了团结,竟出现几乎举国一致要求修改宪法,以使卢拉总统在二届任满后可以继续当选执政的呼声。只是这遭到了卢拉本人的拒绝。

(二)全球化与民族化

这里说的民族化主要指民族国家,同时也指民族主义。整个说来,全球化对国家和民族都是严峻的挑战,既限制国家主权,也削弱民族特性。全球化虽然没有改变主权的基本原则,但却使它的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如跨国公司对主权的侵蚀;国际协调和超国家机制对主权的干预;参与一体化和与国际接轨,限制国家某些决策权;对外开放,影响国家资源与领土的管辖权等。而且全球化还使主权的属性遭到削弱,如参加世界组织、国际合作和地区一体化,都会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主权的最高性、排他性、不可干预性和不可让与性。总之,全球化既然是不可

抗拒的时代潮流,那么,国家主权受限制和民族特性遭削弱就成了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同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发生矛盾以至对抗。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化发展以来,引起了新一轮民族情绪高涨的原因。

新一轮民族化的加强,不仅表现在冷战后一批新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争取经济独立开展的斗争上,还表现在各国为维护本国本民族私利而采取或加强的各种措施上。例如,全球化形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但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却受到各国,首先是发达国家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原来对外来移民采取较为开放的国家,现在也在不断收紧。还在许多国家的人民群众中产生和增长了一种严重的排外情绪,以至出现专门排外和欺凌非本族居民的极端主义组织,如俄罗斯的光头党、德国的新法西斯团体等。

很明显,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民族主义。但在今后长时期参与全球化的主要行为体又只能是民族国家。著名学者汤因比说的,“必须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一切都要服从于全球世界政府的主权”,只能是一种梦想。民族主义和国家还有旺盛的生命力,爱祖国是人的天性,每个人也都应当为自己国家的繁荣昌盛尽力。但同时必须看到,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进步的;而民族主义和国家崇拜则是落后的,它们的逐渐削弱和减退也是必然趋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反对全球化,提倡民族主义,夜郎自大,盲目排外,那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名曰爱国,实则害国。至于呼吁“军事崛起”,鼓吹加强军备,要走富国强兵之路,争当第一军事大国,取代美国领导世界的思潮,那已经是超越民族主义界限,走向军国主义化了。这是东邻日本一百多年前开始走过的道路,并没落得好下场。“殷鉴不远,在夏侯之世”。无论是别国还是本国的经验教训,都应谨记,因为忘记过去就是背叛。

(三)全球化与地区化

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地区一体化发展得反而更快。这是在全球发展不平衡和跨国界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相邻和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联合起来,便于发挥地区优势,加快区

内各国的发展。不过地区一体化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上世纪90年代曾经如雨后春笋,但后来有些不是名存实亡,就是发展很慢,甚至连名也不存了。这种现象在拉美、非洲居多。

地区一体化的典范当然是欧盟。它在全面合作上已经走得很远,在国际关系的许多方面成了一个单一的行为主体。但它的发展进程仍经过不少波折,也经常是进两步退一步。近些年由于贪大求多,东扩过猛和欧元准备不足,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就遇到特大困难,导致人们对欧盟发展信心动摇。其实这也是多虑。欧洲的一体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总会在克服困难中继续前进。而且欧盟在很多问题上都在为全球一体化探路,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例如欧盟在处理发展均衡化上,就为全球化起了示范作用。它使原来落后的国家可以得到集体帮助,加快发展步伐,赶上先进国家。爱尔兰从后进变先进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也是为什么大批东欧国家急于要求加入欧盟的原因。

但是怎样使一体化和均衡化更有利于推动竞争和发展,却似乎是一个并未完全解决好的问题。这或许是限制整个欧盟竞争力的一个因素。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情况。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是礼崩乐坏、战乱频仍,另一方面却是社会繁荣、文化昌盛。等到秦始皇实现了统一,中国社会反而从此发展缓慢,几乎停滞了两千年。

当然,在全球化和地区化的进程中,还会出现很多矛盾与冲突。但从发展的观点看,都是会得到解决的。例如,由于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地区化就克服了地域的限制,使原来的自由贸易区演变成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延伸到全球各地。

地区化和全球化看似一对矛盾和悖论,但终究会统一到全球化上来。因为地区化实际上只是全球化的发展阶段或组成部分,它们的进一步交叉、重叠和扩展,就已经是全球化了。毫不奇怪,在这之后还会有新的分化,出现新的矛盾和冲突。人类历史和世界万象本来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循环往复中不断进步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科学家与农民竞放“卫星”

● 薛攀皋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它同“反冒进”针锋相对,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从此揭开了瞎指挥、浮夸风、弄虚作假的序幕。

1958年夏季,全国各地农村的小麦、早稻、花生等作物的高产“卫星”竞相“上天”,令人眼花缭乱。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的影响和支配下,放高产“卫星”运动席卷全国,有些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也被迫卷入这一场神话般的竞赛中。

一个假命题把两家科研机构逼上梁山

1958年7月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院第二届党代会上讲话,谈到全国已经出现很多亩产一万斤的小麦试验田。这时,坐在台下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代表聂春荣递上纸条,上面写道: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小麦高产能手,准备向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和其他有关单位挑战。张劲夫当场号召中国科学院组织各方面专家,连夜开会提出办试验田的研究计划,向农民生产能手应战(《文汇报》1958年7月6日)。

1958年7月5日至9日,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为在科技界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促使科学家深入实际、虚心向群众学习”,组织首都科学家与湖北、河南、浙江、江苏、河北、安徽、陕西等省及京郊的30多位小麦、水稻、棉花高产能手,在北京东城南河沿文化俱乐部举行丰产座谈会。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的有关负责人、科学家应邀参加。范长江、

于光远主持座谈会。范、于当时都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成员。于光远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在这种压力下,根本不容许讨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被迫仓促上阵应战。

科学家与农民打擂台竞放“卫星”

7月5日和6日两天,会议组织者安排各地丰产能手介绍丰产经验、大胆创造的事迹,以及当年下半年和次年的计划。7月7日,各地丰产能手参观有关研究所。7月8日,分为小麦、水稻、棉花三组座谈。名为交流经验,实际是展开了高指标大战。

为了迎接这次农业丰产座谈会,生物学部早在7月2日晚就召开了有北京地区生物研究单位的负责人、科学家参加的预备会。在会上,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谢鑫鹤同志讲了话。他说:目前科学的发展落后于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科学工作者要从六亿人民利益出发,打破常规,跟上形势。大跃进的关键在于政治挂帅,应该不断解放思想,以虚带实,走群众路线,提倡集体主义、大协作。在研究工作中应该贯彻以任务带动学科,并把它作为主要的方法。这样,不仅研究目的性明确、具体,可以吸引更多人参加工作,而且通过综合性的研究,可以促使不同学科的发展。科学工作者要多快好省进行工作,就必须把实验室的工作同六亿人民的创造结合起来。他鼓励大家办试验田,并表示院部将给予大力支持。但是他没有对产量提出具体要求。

在预备会上,大家表示要“通过试验田的工作,在思想上、耕作技术栽培管理上、理论上和作

物产量上来四个大丰收”。会议决定由土壤队、北京植物生理室、北京微生物室、动物所、昆虫所、应用真菌学所、植物所和遗传室等八个单位大协作,把试验田办起来;并且商定了向农民丰产能手应战的1959年丰产试验田单季亩产指标,第一本账:小麦1.5万斤,水稻2万斤,籽棉3千斤,甘薯15万斤;第二本账:小麦2万斤,水稻3万斤,籽棉4千斤,甘薯20万斤;第三本账:小麦3万斤,水稻4万斤,籽棉6千斤,甘薯26万斤。

7月5日和6日听取农民丰产能手的报告后,大家觉得原定的应战指标已经远远落后了。7月7日,借农民丰产能手参观有关研究机构,丰产座谈会暂时休会之机,生物学部召开了会议,把亩产指标调整为:小麦2万斤,争取3万斤;水稻2万斤,争取3万斤;甘薯30万斤,争取40万斤;籽棉6千斤,争取1万斤。

7月8日,分组座谈。原定是交流经验,但是会议一开始就展开了指标大战。

在小麦组的会议上,湖北省谷城县新气象五社主任王家炳首先发难,提出1959年小麦亩产3万斤的指标。紧接着出现了拍卖行里经常见到的那种竞相抬价的景象,亩产从3万2千斤、3万5千斤,迅速提升到4万斤,话音未落,那边又冒出了4万2千斤……竞争主要在农民丰产能手之间展开。

在紧张的第一回合较量中,生物学部彻底打输了,不仅不敢向农民挑战应战,就连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出的挑战(小麦亩产指标4万5千斤),还犹豫了好久才应战。就在生物学部仓皇应战时,河北省邢台县丰产能手一下子把小麦亩产指标提到5万5千斤。

7月8日晚,生物学部紧急会议,连夜讨论新的高产指标和保证措施。9日上午是丰产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生物学部向中国农业科学院贴出了挑战书,亩产指标是:小麦5万斤,争取6万斤;水稻6万斤,争取6万5千斤;籽棉1万5千斤,争取2万斤;甘薯40万斤,争取50万斤。

到9日会议召开时,这些指标又迅速退居下游了。河南、陕西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小麦亩产指标10万斤;江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稻亩产指标为7万斤。

多数科学家和农民都心知肚明,亩产万斤是

绝无其事,但只能假戏“真做”。

中国科学院不惜血本放小麦“卫星”

丰产座谈会开过后,生物学部组织了一个由中国科学院在京的生物学单位负责人、科学家、青年科技人员、农场工人代表组成的生物学部丰产试验田委员会,下设小麦、水稻、甘薯、棉花四个小组,并由几个研究所(室)党组织的书记组成领导小组,立即着手进行丰产试验田的准备工作。

由于生物学部所属京区研究机构没有合适的试验用地,实际在北京只种了小麦高产“卫星”田,而且是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南墙外的6亩地进行试验。

紧接着是采购颗粒肥料、混合肥料和有机肥料。7月中旬,从内蒙古采购的几火车皮马粪运抵北京清华园车站。中国科学院院部调动十多辆卡车,生物学部各研究所(室)派出50多名职工,把这些马粪从火车上卸下装上卡车转运到试验地,从当天中午直到晚上10点钟才抢运完。我参加了这次抢运劳动。

8月8日开始进行深耕整地,按对比试验的要求,根据不同耕翻土地的深度、播种量和施肥量整理出许多实验小区。为此,生物学部京区单位抽调出396名职工和研究技术人员,采取军事化组织,分为三班每昼夜24小时不停地轮流施工。据会议的记录,土地耕翻的深度和每亩施用肥料(底肥)的种类和数量如下(生物学部丰产试验田委员会技术领导小组1958年8月7日下午会议记录,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档案,1959-16-3):

耕翻深度(cm)	每亩施肥量(市斤)
0—20	马粪5万斤,粒肥3500斤
25—50	马粪6万斤,粒肥10500斤
50—100	混合肥12万斤,粒肥24000斤
100—150	混合肥10万斤,粒肥14000斤
150—200	混合肥6万斤,粒肥10000斤
200—250	混合肥9.4万斤,粒肥8000斤
250以上	混合肥5.4万斤

9月26日播种小麦。各试验小区的播种量折合每亩从50斤以下到50斤、100斤、200斤、240斤,最多的竟高达460斤。

1959年,小麦越冬返青逐渐生长茂盛。试验田里,为促进通风,增加二氧化碳,强化光合作用

用,白天鼓风机齐鸣,为增加光照,晚上灯光如同白昼。许多研究技术人员使出了浑身解数,投入到明知注定要失败的高产试验。可土地并不按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主观臆想做酬答。1959年6月底收获麦子,7月11日,生物学部丰产委员会技术指导小组宣布产量(生物学部丰产试验田委员会技术指导小组1959年7月11日会议记录,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档案,1959-16-3):

地号	实际面积(亩)	折合亩产量(市斤)
1	1.41	711.6
2	0.78	727.5
3	1.38	541.4
4	0.84	827.6
5	0.94	633.1
6	0.45	711.7
7	0.42	902.0

生物学部不但亩产6万斤小麦“卫星”上不了天,甚至连亩产千斤也没有达到,但这是老老实实劳动的结果。前年在擂台上,陕西、河南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代表扬言要超过科研单位,放小麦亩产10万斤的“卫星”,其结果也不怎么样。原先于光远同志声称,科研机构赛不过农民就要摘牌子,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除奉命与农民竞赛种小麦“卫星”试验田外,还派出大约200名研究技术人员,到国内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去设立基点。让研究技术人员与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同研究、同总结”,向农民学习并系统总结农民种植水稻、小麦、玉米、油菜和棉花的大面积丰产和放“卫星”的经验,并“力争在思想上、生产上、技术上、理论上四大丰收,把自己改造成为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干部”。在农村设立的基点:1958年20个,1959年30个,1960年25个。其中,1960年的25个基点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陕西、河南、湖北、广东、江苏、江西、四川等15个省、市、自治区,在那些地方进行“五同”的有15个研究所派出的193名研究技术人员。这么多研究技术人员在农村坚持了三年。由于天灾人祸,农业生产连年减收,农村粮食严重短缺,他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从1961年起,他们陆续撤离回到原研究所工作。这么多人,在那么多基点呆了那么长时间,却没有发现一颗“卫星”是真

的,也没有找到大面积的高产丰产田。

毛泽东确信亩产万斤、几万斤

“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头脑很热,在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问题,还做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断语。他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去剥夺“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他提出,要在15年赶超英国的基础上,10年赶上美国。他还提出,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在急于求成思想已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破除迷信”,实际上是破除了科学;“解放思想”,实际上是鼓励了浮夸。于是,一些离谱的“创造”诞生了。

1958年1月,广东汕头报告了晚稻亩产3000斤。一个月后,这个记录就被贵州金沙县一季稻亩产3025斤打破了。入夏后,全国小麦“卫星”目不暇接,争相耀眼。6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称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继放出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之后,又放出亩产3530斤的“卫星”。对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写了一篇短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6月16日刊于该报。他提出: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钱学森的短文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1958年8月4日、6日、9日,毛泽东先后到河北徐水、河南新乡、山东历城视察。他对群众干劲冲天放粮食亩产万斤、几万斤的“卫星”确信无疑。

在徐水时,他还提出了粮食生产多了怎么办的课题。8月初,他在接待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说,自1949年解放以来,“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他甚至问赫鲁晓夫,苏联有没有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经验(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69页)。

1958年10月27日,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毛泽东和钱学森有如下对话:

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可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壮。过去是浅耕粗收,广种薄收,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样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文中及以上引文见:中国青年报记者集体采写《最大的鼓舞——记毛主席参观我们的展览会》,风讯台,1958-11-15)

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认可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大力推介后,大科学家钱学森的这篇短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58年11月21—27日召开武昌会议时,“大跃进”初期的狂热已过,乱象和问题出现不少,中央开始降温。在会议初始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找秘书李锐谈话。在谈到粮食“放卫星”问题时,李锐特地问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百万斤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说真话难



1958年,毛泽东在河南农村视察

俗话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58年夏秋两季,在全国范围内,粮食“卫星”越放越大。毛泽东心情越来越愉快,而地方的干部和科学家面临的压力,则越来越大。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原本是一位注意调查研究,讲究实事求是的高级干部。1958年7月在中南区五省农业协作会议上,兄弟省之间相互攀比增产指标非常激烈。其中,河南省的高指标最为惊人,而广东省明显落后,有人甚至和陶铸开玩笑说:“你们广东还是只乌龟在后面爬!”陶铸在强大压力下坐不住了,回到广东就和其他负责同志说:“再不浮夸就是态度问题了。”他立即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提出1958年全省晚稻要达到平均亩产600公斤,粮食总产量300亿公斤的高指标(郑笑枫、舒玲:《陶铸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266-267页)。为实现高指标,他进一步贯彻以“密植”为中心的多项技术改革(包括良种等)。他的高指标,以及盲目的高度密植,在广东种植辽宁高产的粳稻等,受到丁颖等科学家的质疑批评。7月18日,陶铸写了《驳“粮食增产有限论”》长文刊于1958年8月《红旗》杂志。文章写道:“不久以前,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有趣的短文,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



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

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这说明了农业的生产潜力有多大。”陶铸在文中不点名地把质疑、批评、反对他的科学家批判为“粮食增产有限论”者，认为“粮食增产有限论”是同资产阶级的“土地报酬递减律”学说和反动的人口论殊途同归的。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罗宗洛，认为当时报纸上公布的水稻、小麦单季亩产几千斤、一万斤、几万斤等是不可信的，并且不同意研究所有些人士提出的放弃植物生理学研究工作，去总结这些不可靠的高产经验的主张。他的这些意见在研究所内引发激烈争论。作为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被贴了一百多张大字报，对他的批判大小会持续不断，如狂风骤雨一般。但罗宗洛没有被压服，一直坚持实事求是、据理力争。上海分院某领导人只好动员罗宗洛的好朋友朱洗，向他转达警告：这是党的政策与路线问题，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问题，就此收场，不可顽抗到底。罗宗洛只好不再申辩了。他保持沉默，但拒不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任何错误（黄宗甄：《罗宗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6-197页）。

现在，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在全国科联丰产座谈会开过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室从事甘薯育种研究的以凡同志私下对我说，一亩地单季产稻麦5万斤6万斤、甘薯几十万斤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说，他算过细账，拿白薯来说，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每个白薯长得像30斤体重的小孩

那么大，那么，亩产15万斤就相当于7个半小孩挤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如果亩产50万斤，就相当于25个小孩挤在一平方米土地之内，这根本不可能。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少说真话的人，一些诚心诚意向党提意见的人，被错误地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少人为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凡说：我也是有家的人，家里有老人，有老婆，有孩子，我不能不考虑他们受株连的后果。当时的环境使得他和其他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

历史教训不该忘记

反右派、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给我国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和损失，大大挫伤了研究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为了扭转极左的不良作风，恢复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秩序，196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并且由国家科委于1962年2月16日至3月12日，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总结“大跃进”以来科技工作的经验教训。有几位领导同志在广州会议的大会上或小组会上，对自己做的过头事或说的过头话进行了自我检讨和批评。他们这样做，不仅没有降低自己的威信，反而拉近了同科学工作者的距离。

于光远同志在广州会议小组会上，检讨了自己于1958年组织农民同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打擂台，竞赛放粮食高产“卫星”这件事。我当时是会议的工作人员，听说他就此做了自我批评，但由于会议简报没有刊发他的发言，不了解具体内容。

1993年3月，中国科学院内部刊物《院史资料与研究》第1期，刊发了我的回忆文章《与农民竞赛放“卫星”：1958—1959年生物学部种高额丰产田的回忆》。当时，我在文中只写“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提出科研机构同农民竞赛种高额丰产田，如果比不过农民就要被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曾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过的李佩

珊同志问我那人究竟是谁,我告诉她是由于光远同志。同年11月,《院史资料与研究》编辑部李真真同志,就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问题,访问于光远、李佩珊同志。在谈到“大跃进”时期的几件事时,李佩珊提起“摘牌子”的事,于光远自我批评说:

我是参加过一个农民同科学家比高产的会,这话很可能是我讲的。会上指标越比越高,小麦亩产能到六万斤。我又觉得太玄了,就说“一万斤也不错嘛!”其实同他们的三万斤、六万斤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反映那次会议,但没有发表。这时期我还在《红旗》上发表过一篇讲小麦高产意义的文章,可见我的积极性。这都是我那时头脑发热干出来的事。(李真真《中宣部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1999(6) 27-28)

于光远接着说:

还有一件事,聂总曾带张劲夫和我两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毛主席,要张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要我汇报全国科技的情况。因为那时我正负责编内部刊物《科技动态》。……我当时汇报得很糟糕。我讲了山东的农民把苹果苗插在正在生长的南瓜上,结果苹果同南瓜一起长。这是写在山东省委的报告上的。那时我思想上有一条,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省委的报告还能有错?无论如何,我担任着重要的科学工作,向毛主席汇报这种不科学的东西,后来越想越不是滋味,这是我一件丢脸的事。在这之后我就在科学处的工作方针上加了坚持科学性这一条,近十多年我就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就是坚持科学性这一条的表现。(同上书 27-28)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院长、著名水稻专家丁颖反对盲目高度密植水稻(转引自《黑云滚滚的“广州会议”》,首都批判刘邓科研路线联络委员会主办:《科研批判》1967(2):11-15),不赞成在广东大面积推广种植辽宁高产粳稻(武衡《科学战线五十年》,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88页)。陶铸不但不听,反而对他进行批判,结果造成广东水稻产量严重减产。在广州会议上,陶铸作为东道主在开幕式讲话时,一开始就向丁老当面道歉,承认错误。

陈毅副总理在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同

时,也向大家道歉,承认错误。在他列举的许多事件中,也包括“相信了一亩地打十多万斤以上粮食,不听专家的话,做了蠢事”。据我所知,1958年9月26日的《人民日报》刊发过他的《广东番禺县访问记》,其中提到,“亲眼看到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薯、5万斤水稻的事实。”

高级领导干部在众目睽睽之下承认错误是不多见的。这同样需要勇气,而勇气是来自责任感。在广州会议的全体会议或小组会议现场,我耳闻目睹了几位高级领导自我检讨批评。当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用热烈的掌声予以回应时,我感受到了他们对于这些领导同志的包容、谅解和尊重,尽管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反右”、“拔白旗”、“反右倾”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有委屈,也有屈辱。

就我自己而言,那时是生物学部办公室的科员,没有任何“官职”,并不处在决策的地位,只做具体工作,但也是放高产“卫星”的拥护者。在全国科联的丰产座谈会开过之后,我曾以《风讯台》记者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学农民赶农民超农民——生物学部办丰产试验田》的报道,通篇都是当时时尚的套话。在那场放“卫星”的运动中,人们的心态不会是完全相同的。我在大学读了四年,前两年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后两年是大陆解放以后。当时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清廉亲民,让我从新旧社会的对比中,感到共产党好。因此,我对共产党号召要办的事,对于党报的报道,没有怀疑过。此外,我对农业生产没有感性和理性的知识,甚至连一亩地有多大都没有概念,况且那么著名的大科学家根据科学推算,稻麦如果能利用一年里照射到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那么亩产4万多斤是可能的。1958年秋收前夕,我到湖北、河南农村,实地参观高产水稻“卫星”田,明显看出了把几亩地甚至几十亩地的水稻在快要成熟时,合并移植到一丘地上的弄虚作假的手法。至此,我才恍然大悟,一种莫名的上当受骗感涌上心头,也为前面提到的自己写过的那篇报道而汗颜。

种单季亩产几万斤的水稻或者小麦,是绝对实现不了的命题。而这个不具可行性的命题,不经过任何论证,就把两个国家级的科学研究机构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逼上梁山去跟农民竞赛比高低。这是中外科学史上极其罕见的天方夜谭式的事件。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主事的领导同志事后也承认错误,做过反思。那么,这段历史留给人们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呢?

“大跃进”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大跃进”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1958年影响最大的失误,是农业的浮夸。由于农业的浮夸,导致了一系列决策的错误,而浮夸又是从“放卫星”开始的。薄一波同志认为问题出在我们丢掉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优良传统。他说,1958年通过报纸、广播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可是,当时省以上领导机关却没有任何一位负责干部,对任何一颗“卫星”的真实性做过认真调查。其实,那些天方夜谭的神话,当地群众是一清二楚的,只要跑到当地去看看,住上一两天,神话就不难揭穿(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24-725页)。

问题是,就算这些负责干部调查了,也知道了真相,在当时情况下,又敢不敢说真话呢?1958年7月,广东连县星子乡北庄把60多亩即将成熟收割的禾穗,集中到一亩田里,加上重复过程,放了一颗亩产60436斤的水稻大“卫星”。陶铸对

此是了解的,可他所做的也只是带着深为内疚的心情对秘书马恩成说:“我有生之年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能这样了。”(郑笑枫、舒玲:《陶铸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266-267页)

说白了,虚报粮食产量放“卫星”,是各级干部层执行各自上级指示取得政绩之举。农民是不愿意做这种违心事的,因为他们不仅得不到实惠,反而会招来横祸。“高指标”之后是“高征购”,向农民征收粮食不按实际产量,而是凭干部强迫虚报的“高指标”。在农民的口粮、饲料粮、种子粮大部分被强行收走后,整个中国,尤其是农村,很快即从“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梦境,掉入粮食严重短缺,吃不饱、浮肿病、饿死人的深渊。

我想,做调查研究固然重要,而更实质的问题是毛泽东1957年发动的“反右派斗争”,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民主和法制。1958年,他发动“大跃进”的同时,推动了“正当的”个人崇拜,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他错误批判按党内民主准则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等,并在会后发动“反右倾”运动,粗暴践踏党内民主。它的后果是坚持原则、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这就使得党很难防止、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更大失误。

历史教训不该忘记。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原生物学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 李晨)



声望听力
好听力 · 好生活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听得见听不清 耳聩耳鸣的烦恼

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层

电话:010-84608877 400-610-0896

邮编:100027

网址: <http://www.sw-tl.com>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2009080150号

山东的法制“大跃进”

• 肖磊

1958年春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全国各行各业无不受到严重破坏。我们国家的法制也被折腾得支离破碎，法不成法。笔者当时在山东一个政法部门工作，亲历了法制被折腾的全过程，感受极深。

建国初期，毛泽东曾一度关心国家的法制建设。他亲自领导，并直接参与宪法的制定。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毛泽东说：“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党中央当时的二把手刘少奇，在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强调了法制建设的重要，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法制。这一些，都为国家的法制建设指出了方向。当时，从主管全国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到各级党委及其主管政法工作的书记、各级政法部门负责人，无不认为中央领导人重视法制建设。“实行法治”，成了全党的共识，国家法制建设走出重要的一步。然而让人无法料到的是，宪法尚未全面实施，许多法律尚待制定，毛泽东关于法制的想法突然改变了。虽然没有说宪法作废了，但事实上不算数了。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宪法记不得了。”“不靠刑法、民法维持秩序。”“要人治，不要法治。”“会议决议就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人民日报》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法。”宪法及其他法律，领袖一句话就变了。其他各级领导人都要跟着变。也没有人敢不变。第二把手刘少奇在同一个会议上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此后，从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到各级党委及其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干部、各级政法机关的负责人，都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们从积极主张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到批判“法治”、反对“法治”。中

央政法领导小组负责人，在“反右派”结束，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讲话时，狠批了检察院组织法。说检察干部执行组织法是“动不动拿本本来”。并说：“你这个检察院，你这个第二党，都监督到党的头上了。”山东省检察院、山东省高级法院主要负责人，原来都是积极提倡法治，主张法制建设的，自贯彻全国四次司法工作会议和传达中央领导人关于“要人治，不要法治”的讲话以后，一反过去，他们在山东省委主办的《新论语》刊物上（早已停刊），以“提倡人治，反对法治”为题，共同发表文章，批判坚持“法治”是资产阶级法律观点。说“坚持人治，还是坚持法治，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坚持资产阶级专政的分界点，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由于从上到下对法制的大批判，初步建立起来的法制体系被打乱。公检法三部门形成的各有分工、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制度被废止。法律规定的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基本没有实行。“大跃进”期间，在“打破法律框框”的口号下，许多地区，特别是一些县、市政法部门，积极追赶“大跃进”的“浪头”，批判法制，否定法制，否定法定的部门职能，推行公检法合并。合并后的名称有“安全部”、“治安部”；人民公社成立后，有的称“政法公社”等等。公检法三家合并后，办案“吃大锅饭”，倡导“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一长代三长：公检法任何一长都可代替三长办案。一员代三员：公检法任何一员都可代替三家任何一员行事。所谓回来再分家，只是在法律文书上分别盖上公检法的印章。

在捕人、判刑上，某些政法部门也有“新创造”，所谓“四就一马”就是“新创造”的事例之一。四就：对犯罪嫌疑人就地逮捕，就地预审，就地起诉，就地判刑。一马：马上送劳改队。这种简单的

违反法定程序的办案方法,曾一度在一些政法部门,特别是一些基层政法部门流行。山东省政法部发现这一错误的办案方法后,曾开会制止。但许多县、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干部,认为这是“新事物”,省人力,省时间,符合“大跃进”“多、快、好、省”的要求。这种错误的做法,在较长的时间内未停下来,个别县、市持续到1962年。

一些县、市政法部门,在党委分管政法领导干部的鼓励下,提出不但要紧跟“大跃进”的形势,而且政法也要“大跃进”。为此,一些政法部门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计划,喊出了许多离奇的口号。提出:“从杀人、放火,到小偷小摸、封建迷信等三十多种犯罪全消灭”,把本地区的治安整顿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样透明”。还有的提出:“苦战七昼夜,实现安全县。为了实现安全县,宁愿少活二十年,豁上身体掉二十斤肉。”类似口号在一些县、市政法部门层出不穷。

“大跃进”打乱了政法系统正常的工作秩序。有些分管政法工作的党委书记,听说“打破法律框框,不受法律的约束”,就亲自上阵,用大会捕人的办法为工作开道。据1958年6月24日《大众日报》文章:“惠民地区不少地方开千人大会,游行示威,为翻粮打伤群众。地委书记李×擅自决定:在惠民、阳信等县城成立打击现行指挥部,他亲自指挥抓人。”又据1958年4月山东政法会议披露:有些县、市政法部门“搞花样,凑热闹”,热衷于“大呼隆”。乐陵县政法部门,在县委分管政法书记的亲自指挥下,调集500名民兵,各持步枪、土炮、大刀等武器,如临大敌,在县城游行示威,高喊:“誓与违法犯罪分子决一死战。”滕县政法部门一长代三长,各带领“突击队”分头抓人。苦战一昼夜,三支“突击队”各抓人一百多。县检察长向县委“报捷”后,又向省检察院“报捷”。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李鸿儒听了“报捷”汇报,认为他们突击抓人的做法很“玄乎”,对报捷的县检察长说:“大跃进抓人也要讲事实、讲证据,要符合逮捕标准。抓人不能搞突击。”“报捷”检察长听了不高兴,说县委已表扬了他们。

政法“大跃进”的花样很多,有的地区创造“多快好省”破案法。菏泽地区政法部门阎××一长代三长,创造“双百”专区,计划在30天内,现行案件破案率百分之百,解放后未破的积案,破

案率百分之百。“双百”计划下达到各县、市的政法部门,落实到人,包干负责。“包干”人员感到压力大,唯恐限期内完不成任务,在破案中采取违法手段,选择地富反坏为破案目标,利用村干部向群众暗示、诱导,秘密投票选举作案人,名之曰“群众路线”。破案人员认为即便抓错了人,放人了事,不会追究责任。省政法工作组抽查了“双百”期间50起捕判案件,错案占85%以上。省政法工作组向省委政法领导小组汇报了“双百”考查情况。领导小组认为:“双百”做法不能保证“不枉不纵”,不要继续下去,还是坚持正常办案。

“提倡人治,反对法治”,以权代法也就成为“当然”。领袖既然说“不靠刑法、民法维持秩序”,“要人治,不要法治”,所以抓人、判刑,也就无须依照法律,权力决定案件。1960年春,昌潍地委副书记孙××坐镇益都县,亲自指挥建立“共产主义新村”和开展“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所谓“补课”,就是补划地主、富农成分,全县补了3000余户(经核查全部否定)。“建共产主义新村”,采取先破后立,拆房扒屋,已拆房占全县全部房屋的40%,一家三代只给留一间屋,逼着群众到“共产主义新村”地址建新房。这时,正是三年灾害的严重时期,群众哪有物料建新房。“共产主义新村”一场空,引起村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甚至谩骂,有的村干部带领群众集体上访。孙副书记听了汇报,火冒三丈说:“那些不满分子表面上牢骚怪话,实质上是联合新老地富反坏攻击社会主义,要进行打击。”在孙副书记的指挥下,全县大逮捕,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县逮捕1070人。逮捕这些人,有县委书记批准的,有一长代三长批准的,甚至还有公社书记批准的。先捕人后补手续,检察院不审查材料,只管盖章。大量捕人,县看守所容纳不下,分到各公社关押,并准备在各公社设临时法庭,进行公判。这真是法制的大倒退和对法制的严重破坏。

山东省委发现益都县乱捕乱押,拆房扒屋,对农村党员、干部乱开除、乱撤职(开除、撤职,占全县党员、干部的47%),特别是大批饿死人的问题,省委书记处书记裴孟飞前往处理。他对地委、县委领导人,特别是对地委孙副书记进行严厉的批评,并责成他们进行检查。省委政法工作组对1070起案件逐案做了复查,错案占97%以上。对

错捕的人，“教育释放”，不了了之。

“大跃进”中，法制被打乱之后，一些党委分管政法的书记或政法部长，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干预政法部门正常业务活动。1960年春，金乡县法院审理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合议庭认为：被告说“人民公社好，就是吃不饱”，应判三年刑，合议庭通过。正要宣判时，县委政法部长徐××来到合议庭问：“准备判几年？”审判员答：“合议庭三年。”徐部长说：“不行，攻击人民公社的案件要重判，弄他十来年。”审判员只好重新合议，由原合议庭判三年改为判十年。1960年省检察院工作组抽查了当年捕判的金乡县城关公社60起案件，按当时的标准，错案占75%以上。在抽查阅卷中，看到大部分案卷都有徐部长“指示”的记录。

有的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干部，以政法部门“当家人”自居。不懂法律，不懂业务，却又独断专行，自己说了算。1959年夏，泰安地区（当时归济南管辖）有人举报肥城县发现特务组织。济南市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人魏××闻讯后，先下令抓人。肥城公安局长经初步调查，认为案件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向魏××汇报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认为是特务案件，究竟是中统呢，还是军统呢？如果都不是，这起特务案，就值得研究。”魏××听了汇报说：“我不管他统不统，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在魏的决定下，先逮捕了“为首分子”。审讯中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被株连40余人，全部逮捕。他们的口供互相矛盾，又自相矛盾，且时供时翻。经公安部门反复侦查和预审，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建议撤案放人。魏××说：“不是没证据，而是没本事。”不同意释放在押人员，坚持继续审查。这时，正是三年灾害最严重的时期，不要说在押人员，就是平常百姓，也有许多人被饿死。看守所内在押人员严重的饥饿，加之许多疾病的发生，三天两头的抬出死亡的在押人员。所谓“特务”案的40余涉案人员已死亡过半，且死亡继续发生。

山东省委及省政法部门，不断收到泰安地区政法干部的来信，反映泰安、肥城特务案是假案，要求查清。省委组成政法工作组，对这起“特务”案做了反复的调查研究，认为这是一起由假“情报”，加之个别领导人的主观主义造成的一起重大错案，应立即纠正，释放现有在押人员。魏××

听了工作组的汇报说：“我说是特务，你们说没证据。你们说不是特务，我看也没证据。”魏仍固执己见，但自知没有理由坚持，在上下压力之下，也只好同意撤案放人。这起“特务”假案，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凡亲历这一事件的人，都记得这是法制被搞乱，权大于法的恶果，其教训是惨痛的。

对法制的折腾，还表现在鼓吹检察机关取消风和反对法律监督上。检察机关及其监督职能，是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确定的，但在“反右派”和“大跃进”中，对检察机关指责颇多。在法律虚无主义的指导下，检察机关在一些地方名存实亡。有的检察机关只在门口挂个牌子，无检察人员办公。

检察机关及其法律监督职责，不仅遭到某些领导人的批判，且许多检察干部因履行监督职责，有的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错误的处理。昌潍分院检察长贾振英，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纠正了有关部门一些违法现象。特别在刑场监督中避免了几起错杀，受到省委、地委、省检察院的表扬。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世英，在山东全省检察长会议上，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题，作了长篇讲话。对亲临刑场监督，避免错杀农民安乐三（村干部诬陷安有两条人命）的胶南县检察院检察员刘明智，给予很高的评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正确履行监督职责，受到了表扬，转眼之间却成了严重错误。贾振英被指责“矛头对内，以监督自居，向党邀功，贪天之功为己功”。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养猪。1962年平反后，省委、地委、省检察院仍肯定贾振英依法监督是正确的，只是因履行监督职责得罪了管政法的专员李××才遭此危难。

刮检察机关取消风，反对法律监督，主要来自上面某些领导人，下面有些人跟着刮风。谢富治初任公安部长时，到山东烟台视事，时有省检察院工作组在烟台地区调查案件，顺便向谢汇报情况。当汇报莱阳县村干、民兵违法乱纪，全县打死、逼死60余人的情况时，谢说：“违法乱纪打死人固然不好，但维护了社会治安。”在向汇报有些地方刮检察机关取消风，有的县、市检察院只挂个牌子时，谢说：“这就对了，过去检察院做了些扯腿的工作。”谢富治的谈话表现了他是那么

漠视人民生命,又是那么反对法律监督,让向他汇报的检察干部听了寒心。

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检察机关及其业务活动有所恢复。但无论从检察队伍的数量、干部的监督意识、依法办事的法治精神等,都未能恢复元气,更谈不上符合检察院组织的要求。经过对检察机关的批判和对检察干部的打击,许多检察人员如惊弓之鸟,做驯服工具的“训教”牢记在心。一位1939年参加革命,建立检察署就从事检察工作的“老检察”,1962年回到检察岗位,与笔者见面时说:“这几年挨了三次批判,得出三个教训:一不说依法办事,二不说法律监督,三要做驯服工具。”检察干部虽然回到检察岗位工作,但在思想上很受压抑,时刻提心吊胆。

贯彻“八字方针”后,法制体系和工作制度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反右派”和“大跃进”中被颠倒的法制是非并未得到澄清,宪法与法律的权威并未树立起来。权大于法的观念,在某些领导干部中,更加突出、牢固了。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仍是句空话。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再无人敢说话。

“大跃进”之后,办案已没有什么标准。刑法仍是草稿。“大跃进”前,高层政法机关往往制定若干“政策界限”,作为捕、判的标准。但法制遭到折腾后,连“政策界限”也不见了。捕人、判刑主要是为运动、为中心工作服务,只要涉及这两方面案件,就要狠狠地打击。过去提出的政法案件“三少”(捕人要少,杀人要少,管制也要比过去少)变“三多”。不仅如此,有的省、市还自制“土政策”。1964年山东一政法部门主要负责人,从南方某省取来“打击贫下中农就是反革命”的“真经”(打贫下中农一巴掌就是反革命)。还有所谓“群众专政”(群众定坏人,管坏人,改造坏人)。曾一度出现法制的混乱,大概这就是“人治”。

“大跃进”后的宪法名存实废。宪法无任何实力支撑和保障。毛泽东说:“宪法是根本大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都要实行。”但是恰恰一些领导人不实行。因此,被折腾的宪法,一不能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二不能约束权力的滥用,一纸《5·16通知》,就把全国人民投进灾难的深渊。这是解放后三十年法制的悲哀。

“文革”开始,我国法制在遭到百般折腾后,又被摧毁殆尽。全国遍地是打砸抢烧杀。“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几千万中国人民生命的丧失,“文革”又使二千万中华儿女的生命被夺走(叶帅讲话)。五千年的古国文化遗产大部分惨遭毁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任意揪斗、侮辱,残酷地剥夺了一切权利,直至生命,在“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悲愤中离开人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国法制得以恢复和重建。三中全会后,检察机关是重建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法制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终于又回到法制建设的轨道上来。但不可低估的是:“反对法制,坚持人治”,甚至乐于“无法无天”、抵制“依法治国”的流毒,对法制建设仍有长期影响。某些人还是权大于法。几年前笔者就亲耳听到一位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在检察会议上说:“不要管那些法律条条。”看来,他还是喜欢“人治”,喜欢以权代法。

笔者从亲身经历中,深刻感到:法律监督也许也是有效制度之一。但政治不改革,法制也不可能改革,法律监督仍没多少权威。只有实现了“民主法制”,那才是“依法治国”的真正到来。让我们翘首以盼。

(作者为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员)

(责任编辑 李晨)

启 事

2008年精装合订本 85元,简装 80元

2009年精装合订本 100元,简装 95元

2009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免费挂号邮寄,汇款地址见本刊目录页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过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电话:13611159388

汇款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

鸿顺园小区 528 信箱

收款人:崔秀岭 邮编:102488

寻找王佩英

• 郭宇宽

疑问与追寻

张大中递过来一份复印的判决书,里面记录着一个叫王佩英的女人,“系地主分子”,罪行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押期间还“疯狂地咒骂我党,气焰嚣张到极点……民愤极大”。结论是“依法判决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落款的盖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月27日。([70]刑字第19号)

“她是我的母亲,”张大中说,母亲成为现行反革命给他们全家带来灾难性的打击,直到1980年母亲被平反,才不再受到政治上的歧视,他最初创业的钱就来自于母亲的一千元抚恤金,“没有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

改革开放之后,从最初的个体户成长为有数十亿资产的成功企业家。在有名的大中电器公司,张大中给自己的定位是“首席店小二儿”。

张大中又递给我一份再判决书,这是1980年的,在他的反复上访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王佩英从1963年开始患精神病。原判认定王的罪行是在其精神病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应负刑事责任。”([80]中刑监字第295号)

“她对我们这些孩子都很好,没有什么不正常啊。当时就听说她的所谓反革命言论是,批评毛泽东,让毛泽东退出历史舞台,说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是我党的杰出领导……文革的时候,国家给搞成那样;今天看来,她说的都没有错啊!”

在张大中眼中,母亲很平凡,就在铁道设计院当一个清洁工,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搞政治的。他记得在母亲被判刑之前,曾经有一次对他说:“孩子,妈妈做的事情可能要连累你们,妈妈对不住你们啊。”说明她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的。如果她是一个捍卫真理的烈士,她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刺激了一位七个孩子的母

亲,对一个时代的最高权力,发出最坚决的异议?

王佩英一共有过八个孩子,头生女儿后来夭折了,接下来六个都是男孩:张运生、张贵生、张大中、张大江、张大路、张大圃,最后一个小女儿,是她最疼爱的,她对朋友们都说,这下可是可了我的心了,于是就叫张可心。

张家老二、老五已经因病去世了,我只能采访其遗孀。老大张运生,前些年中风丧失了语言能力,张家往事只能由其夫人杨永茹讲述。在采访杨永茹的过程中,张运生坐在旁边,他不能说话,但是提到很多事显得非常激动和悲伤,时常掩面老泪纵横,有些地方似乎想补充什么,但只能发出含混的音节。采访结束时,我和他握手告别,他捏住我的手,非常用力,还一边在点头,我第一次想把手抽出来,都没有抽出来。

张家的几个孩子性格都不一样,在那段历史的体验也不一样,对母亲也都有独特的回忆视角。老四张大江是个活生生王朔笔下的“北京顽主”,对政治毫不关心,但是对朋友非常仗义,在街坊的年轻人甚至小混混中间颇有一些威望,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母亲被关押期间和枪毙之后家庭并没有受到红卫兵的冲击,老六张大圃当年是个积极的红小兵,在学校是班长,文革一开始就跟着一些大人到处去“抓反革命”。母亲一出事,他班长就被免了,大圃含着泪叙述,当时有一次在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批判大会,他想能不能主动要求在大会发言,批判母亲,和她划清界线,这样就可以得到组织的认可。回家和大哥讲了这个



王佩英

想法,大哥当时脸色非常难看,但也不说他错了,就是不让他去。大圃说,“假如那次我去了,以后我这一辈子都会活在羞愧之中。”

更难采访的是其他旁观者和当事人,王佩英的友人大多已经过世,健在的也都八十多岁了,直到现在,他们也往往为其60年代的政治立场感到恐惧,或者说他们也难于理解王佩英为什么要批评毛主席。最难采访的是她的同事,他们中的不少人或多或少的对王佩英的死负有责任,有的检举了王佩英的“反动言论”,有些人甚至直接就是打手。这些人大多数都拒绝接受采访,接受采访的,也在问及关键问题的时候反复说“老了,糊涂了,想不起来了”。张大中说,就算那几个当时就是主动参与迫害了他母亲,他今天也不会记恨他们,而且想劝他们别太过意不去,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都只是被利用的老百姓。

但我有些怀疑,有些人真会为他们做过的事情感到过意不去吗?

王佩英的青少年

王佩英1915年出生在河南开封,父亲是一个颇为成功的商人,她是家里的独女。据文革前的外调材料,王佩英的童年过着“剥削阶级生活”,家里有两个保姆。7岁那年,生母去世,父亲续娶了继母,12岁那年,父亲也过世了。留下的遗产,还有20多间房产,3亩多坟地,应该还有一笔钱和家当。14岁那年继母也病故了,但一直有一个老妇人在全方面的照顾王佩英的生活。

16岁那年王佩英考进了静宜女子中学(这段教育经历,是在王佩英的档案中查到的,包括张大中在内的子女均不知道母亲曾在教会学校上过学,可以理解的原因是1949年之后,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办学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这所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王佩英是该校的第一届学生。据一些校友回忆,这所学校重视英文教育、体育教育、科学教育,在1933年的“训育规程总纲”中,即提出一些现在看来都颇为先进的教育理念。比如教育目标是“以期养成忠实健全之公民”,教育要目有“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

王佩英的求学之路到初中毕业就终止了。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她恋爱了,一个叫张以成的大学毕业生走进了他的生活。王佩英1934年和张以成结婚,当年就抛家舍业,义无反顾地陪张以成来到北京发展。

张以成,1911年出生的河北人,朝阳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毕业以后,他通过校友的关系,到开封做律师。他在帮王佩英和她的远房亲戚打官司时尽心尽力,官司打赢了,两人也恋爱了。

婚后生活

根据张以成自己的档案记载,原来张以成生活困顿,结婚后王佩英“对我生活稍有帮助”,每个月仅是出租一些空闲的房屋就是稳定的二十多元收入。年轻的张以成心高气傲,不甘于靠老婆生活,到北京谋求发展,但“谋事未成……回到家乡”,这期间,王佩英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11岁夭折。1937年,张以成再到北京找工作,一个多月还是找不到,张以成化名“路平”当小贩卖药,每个月有几元钱的收入。

同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更加凋敝,张以成的卖药生意也收入微薄。1940年,大儿子张运生出生。张以成记载,“穷的住在北城边板桥三条12号半间小土棚子里,每天只有一两顿窝窝头或小米稀粥”。王佩英自己都吃不饱,还要给儿子喂奶,十分艰难。

1940年冬天,王佩英和丈夫、女儿玲玲,还有怀中的儿子运生,回到了家乡。此时的开封也已经被日军占领,但一家子的生活安定了下来。

1941年秋天,张以成终于谋到了一份正式工作,在中华通讯社当明码译电员。但是就在这年的冬天,一群日本宪兵把张以成抓走了,说他开枪打死了日本人,严刑拷打之后,又被押解到了北平宪兵队,押在监狱里。起因是,他的一位在北平当巡官的大姐夫有一把德国造的盒子枪,离开北平时存在了张以成处,张以成离北平时又保存在了一个舅父那里,日本宪兵搜出了这把枪,他舅父吓慌了,就说是张以成的(张以成恰好在那时离开了北平,也许因此成为被重点怀疑的对象。在张以成的档案中出现这一段的详细叙述,也符合那个年代的特点,对于所有有过监狱经历的人,都是被调查的重点对象,害怕是变节分子)。

这段时间里,王佩英变卖家产托人疏通。后来,打死日本人的那个好汉被捕了,张以成被放回了家。虽然生活平静了,心理还是不平衡。有时候会和好朋友感慨“报国无门啊”,“男子汉大丈夫真该马革裹尸还啊”。这被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开封情报站的地下党注意到了。一个有文化的青年,有强烈的爱国心,又在敌人的通讯社当译电员,这难道不是最值得发展的对象吗?

1943年,张以成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有一个对外身份是中国记者协会理事,记者身份是打探消息最好的掩护,却无实际收入,张以成这时外出交际应酬的开销,都依靠王佩英家产的支持。

这时期张以成常常在外工作,佩英带着孩子,让丈夫免除后顾之忧,除了支持、掩护自己的丈夫,有时还帮助传递情报,在地下党碰头的时候,她还承担放哨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王佩英和曾洁光、郭鸿文、胡俊三、周舟等战友及他们的家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王佩英对于共产党最初的印象,大概就是通过这些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们建立了。

陈克强记得一个细节,可以了解王佩英那时的政治立场。陈是1945年认识王佩英的,他的父亲陈振洲后来也成为八路军的外围情报员,是张以成的下线,而陈振洲是先认识王佩英,再由王佩英介绍给张以成的。

1948年,陈克强中学毕业,卧病在床,为前途发愁,王佩英刚生下老三,抱着孩子来到他床头,跟他讲八路军的故事,告诉他“八路军是真心为了穷苦人的队伍”。介绍他去解放区八路军办的“中原大学”,说去了那里“不要钱,管吃,管住”,并且给他准备了介绍信。

王佩英在入党申请中,自我介绍:“那时我的精神和我的思想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早有信仰。”此时张以成的正式身份已经是郑州地下党的负责人。

在这一年王佩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此时的王佩英心中,共产党就代表着解放和人民的福祉。

解放了

1949年之后,劳动最光荣,妇女也能顶半边天,王佩英在自述中说她“离开家庭”,参加郑州邮局的工作,“业务不熟悉只有埋头苦干,有时带病亦上班,处处愿做一个模范”。她还参加了邮务培训班,“毕业成绩是85分”,应该是比较好的。

1950年,王佩英提出入党申请的当年,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转正本应该是在1951年5月,不过在她档案中查到另一条记录,“因候补期间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在某些方面群众影响很不好,还表现虚荣,爱面子,接受意见不虚心等”,因此候补延期一年,到1952年5月才正式入党。

王佩英当时在理论上大概并没有什么深入的想法,但她在天性上和这一套组织文化有些格格不入。当然她是热爱党的,她对党的理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5年,王佩英全家从郑州搬到了北京,她从郑州铁路局调到了铁道部的专业设计研究院工作。在郑州局的时候,王佩英因为深受同志们的信任,保管局的印章和文件,类似于机要秘书的工作。到了铁道部,大概是没有类似的工作安排,让王佩英到机关幼儿园当保育员,56天以上的小孩就送托儿所,这个岗位非常辛苦,值夜班是经常的事。

不过这个阶段,家庭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张以成的工资有138元,王佩英有约70元工资。而且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经济条件可以让家里请一个保姆。

据张家孩子们的回忆,这个阶段,家庭气氛非常欢乐,每个星期天,全家都会出去游玩野餐,天坛、地坛、动物园、北海公园这些地方都逛遍了。1956年12月31日,王佩英终于生了个女儿,孩子的名字是王佩英取的,叫可心。

大约是1958年以后,张以成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后来知道大概是肝硬化一类的疾病,时常看病吃药,有时还要疗养。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政治运动显示出非常荒唐的一面,各个单位都大炼钢铁,连铁道部专业设计研究院也不干正经事,架起了土高炉,王佩英把家里的大铁锅也捐出去了。

丈夫住院,王佩英要去照顾,单位又经常要值夜班,还整天搞政治学习。据一些同事回忆,那时候幼儿园几个党员搞成小团伙,斗争来斗争去。王佩英是个党员,所有组织活动都要参加,于是便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有同事回忆,那时候的王佩英,就是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在单位不爱多说话。

大约在1959年初的时候,王佩英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有一天白天,小孩们在户外活动,王佩英和同事高淑琴打扫室内卫生,王佩英烧了一锅热水,就在她端着一脸盆热水到另一个房间的时候,一个小孩突然冲了进来,王佩英避让不及,结果有一些水泼到了孩子身上,据高淑琴讲,小孩并没有受伤,只是肚皮上烫出一小块红。

原本是一件小事,但按照“狠挖思想根源”的逻辑也可以上纲上线。据说在会上,有人反复责问王佩英“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啊?”同时也有人开始挖王佩英的出身问题,说她是“地主丫头”。不久王佩英被调离托儿所,转到单身宿舍当清洁工,这显然是在政治上被打击。

此时张以成的病情也在恶化,1960年下半年,张以成已经出现了肝腹水的症状,11月的一天,张以成去世了。

张以成去世后,家庭经济非常困难,王佩英每月的工资收入是48.5元,好在大儿子运生已经在政法干校工作,每个月有37元可以贴补家用,但是还有6个孩子,生活非常拮据。几个月后,不得已把家里的保姆送回了原籍,接下来为了孩子上学自己上班方便,换了一处2居室,小一些的住房。

地下党时期张以成的上级和老战友曾洁光当时是北京铁路分局的党委书记,同情她家里的遭遇,专门找到专业设计院的工会干部,请他们关心王佩英的生活。后来组织决定每个月给王佩英额外补助30元,直到几个孩子成年。

张以成病重到去世的阶段,也是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开始爆发的时候,国家经济体系完全混乱,一方面农村生产被人民公社的瞎指挥和浮夸风搞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放卫星又带来高指标的“征余粮”。城市的基本供应还是保障的,在农村饿死人情况已经相当普遍。但报纸上还说形势一片大好。

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道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王佩英也并不了解。在张以成去世后不久,她去买了一尊白瓷的毛主席像放在家里,文革前个人崇拜的氛围并不那么浓厚,买毛主席像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这也说明了王佩英在那个时候的思想认识,她对孩子们说,“毛主席可是我们的恩人啊。”

王佩英对刘少奇也非常崇敬,她不叫刘主席,而叫少奇同志,非常有感情的样子。大圈回忆说,母亲在家里常爱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来被称作“黑修养”,她有时会一边带孩子们洗脚,一边捧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读出声来。

讲真话的“疯子”

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期间王佩英思想转变,从把毛泽东视为恩人到直接批评毛泽东,是让人困惑的最关键问题。

王佩英的家乡开封和张以成的家乡保定地区,都是饥荒的重灾区。农村的亲友为了生存,即使不敢透露饥荒的真相和批评人民公社政策,也一定会想尽办法和城市里任何能攀得上关系的亲友寻求联系,应该也有亲友会找到王佩英“借粮食”,在后来总结王佩英罪状的材料中有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现在老百姓非常困难,我也困难”,应该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说的。

铁路设计院有一个年轻的技术员暴天成,也是开封人,按照他的说法,王佩英这个人“胆子大,别人不敢说的,她都敢说,一点儿都不避讳什么”。按照档案材料中对这个阶段的调查,“王佩英时有反党的话,总是先找群众,荣胜男,灵雪露(此人是1958年在职工人,对党不满),刘辉,现在经常找的徐金琛(国民党骨干干部)。”这些被提到的人都是王佩英被捕期间的调查对象,其中有些人显然为保护自己,检举揭发了王佩英,比如在档案材料中,荣胜男就检举了王佩英的言行,并表示和她划清界限,斥责王佩英“你胡说”。

这些信息可以看出,当知道中央政策在基层造成的悲剧后,王佩英是相当不满的,并且她有话就直说。

但是这还不足以解释,王佩英为什么直接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毛泽东。那个时代大多数老百

姓就像今天一样,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策略需要,即使遭受切身苦难,也会说,中央政策是好的,就是到了下面走了样。比如王学联就说“王佩英真了不起,我们当时谁都觉得社会不对劲,可我直到文革后期,都是只是恨江青,觉得她太不是东西了。”

到了1961年底和1962年,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逐渐公开化。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61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七千人大会”。在大会上,刘少奇公开说:“全国总体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

王佩英在了解了分歧之后,认为刘少奇是对的。有这样的语言被记录了下来“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王佩英在被关押期间,还说过“赫鲁晓夫说得对”。

对于态度如此明朗的王佩英,最尴尬的大概就是她单位的领导。刘少奇毕竟还是国家主席,毛刘对立的形势还不明朗。如果处罚王佩英,对刘少奇是什么态度?这时,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宣布:王佩英疯了。

1963年3月,王佩英被送去精神病院看病,是用单位的车送去的,但并没有看出什么病来。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展

到当面抬扛。之后毛当着众人的面,训斥刘:“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见薄一波和安子文的回忆。)而王佩英在单位里依然坚决地表达对刘少奇的支持。根据档案材料记载,1965年以来,“多次疯狂攻击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

国共产党……还写了13条反动口号恶毒的攻击我们伟大领袖……”还有“吹捧世界上最大的叛徒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铁路专业设计院的革委员起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佩英主要罪行》)。到这个时候,在单位已经没有人敢和王佩英讲话,而她却更加激烈地到天安门还有灵镜胡同去散发传单。灵镜胡同是中组部所在地。

1965年4月,她做出了今天看来都惊世骇俗的举动——要求退党。根据赵文新到文革期间写的“揭发信”,王佩英在1965年5月初找到他和王世彦,并谈了自己的想法:

“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了。”

“共产党员都有特殊待遇,过去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解放人类,而现在共产党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

“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我坚决退党,从现在起我不参加你们的会了,不交党费,你们也管不了我了。”

“共产党官越大,越骑在人民头上,那些坐小汽车的都够劲……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赫鲁晓夫说得对。”

张大中回忆,1965年大约是五六月的时候,应该就是在王佩英要求退党之后,单位书记王世



王佩英参加毕业典礼照

彦通知他去办公室谈话,张大中一去就感觉气氛不对,以往王世彦对于他们家都表现出比较关心的态度,而这次说话口气非常严肃,而且关上了房门。问大中,你母亲有反动言论,你们家属知不知道。大中并不知道,就如实回答。他回忆,完了也没有人再提这方面的事情。

大约是得不到答复,王佩英又提出书面的退党申请,“申请退党,理由如下,因无意义,又无目的。自我受罪,何苦而为,因此因此,坚决退党,速办手续。”还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甘心情愿,愿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绝不改变自己,绝不顾惜自己的一切。”

没多久,王佩英就被单位强制性地送去了安定精神病院,几个月后被转到回龙观的分院。此时刘少奇还没有被打倒,不能说王佩英支持刘少奇就是反革命,这么做也有一些保护王佩英的含义。

曾洁光听说王佩英住院了,买了蛋糕去看望,据说那天王佩英非常清醒,讲到当下,她就开始批评毛泽东。曾洁光不敢接话,匆匆告辞。回到家里,曾洁光流着泪对妻子说:“王佩英真是疯了,她连毛主席都敢骂。”

“反动立场”与舐犊之情

在这个阶段王佩英的很多言论,包括散发的纸条传单,成为后来宣判她的罪证。这些言论,结合当时的情形来看,绝不是头脑不清楚的人能说出来的话:

“共产党员不管老百姓饥与渴,共产党员把人民利益放脑后边。”

“共党居世,铁打江山。共产党员,着上马衣。升官发财,耀武扬威,骑在民身,作威作福。只顾自己,不顾人民。”

“陈独秀是好人,应该永远纪念他。”

“彭德怀、刘少奇都是我党的优秀领导。”“敬爱的周总理,千辛万苦作外交,一心一意为人民。”(以上言论都被视为是王佩英的反动罪行)

一个带着7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为什么要对高层政治这么坚定地表达异议?张大中回忆,那时候他怪母亲多管闲事,“把咱们家搞好就行了,操那些心干吗呀。”大嫂杨永茹说,她到现在都不

能理解,她婆婆一个妇道人家,为了这么些孩子,有再大的想不通,“忍一忍还不行吗?说两句违心的话又怎么样呢?”

这个选择对王佩英来说也很艰难,据张大中回忆,在那段时期,王佩英一度染上了抽烟的习惯。她最后走上了一条绝然的道路,但把各方面的细节和信息凑到一起,她对孩子的保护和爱已经尽心尽力。

张家的孩子们,没有一个知道母亲当时是怎么想的。也就是说王佩英在单位和社会上挺身而出,在家里从来没有跟孩子们提过这方面的问题,也没表露过这方面的想法。这应该是王佩英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也是对孩子们最大的保护。王佩英在单位要求退党的时候,她的孩子们都还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大团还是学校的班干部。王佩英挺身而出的同时,和自己的家庭“划清”了界限,这也是她为什么反复强调自己“一人承担”。

王佩英意识到她的危险之后,几乎对每个孩子都做过交代,而且都是结合不同孩子的性格分别私下交代的,很有一些因材施教的意味。

张大江,就是前面提到的顽主一样的老四,记得母亲那段时期曾经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国王要死之前,把孩子们召集到床前,给每人一杆箭,让他们扳断,儿子们轻轻松松就扳断了,老国王又把一把箭拿出来让他们掰,他们用尽力气也掰不断。故事的道理很明显,就是讲兄弟一定要团结,这样才不会受别人欺负。王佩英被宣判以后,张家的孩子们确实没有受到外人的欺负。

最小的可心记得,1965年前后,王佩英常在晚饭后拉着她一个人出去散步,搂着她很认真地说:“妈以后要是不在了,你一定要懂事,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可心当时就哭了,搂着母亲说:“妈妈别瞎说,不会的。”

老六大团,当时非常积极,是班上的班长,文革一开始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去抓反革命。王佩英大概对他这样的状态反而最放心,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对大团并没有什么交代。

有一次张大中去精神病院看母亲,时间到了,在他准备告辞的时候,王佩英突然说了一句让他终身刻骨铭心的话:“孩子,妈做的事可能会

拖累你们，妈对不住你们啊。”

至死不变

关在精神病院中的王佩英，每天都被喂服或注射大量镇静药物，据张大中回忆，有时候他去看望母亲，会发现母亲有反映迟缓甚至流口水的症状。但王佩英对她最基本的信念始终非常清晰。

1965年12月20日的病历记载：“治疗已达五个月，病情不见好转，若令其出院对社会影响不好。”

刘少奇被打倒之后，已经不必再把王佩英作为精神病人看管了。1968年6月6日，主治医师写了诊断意见：“出院诊断证明，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医师：吴志长。”

王佩英被押送回单位，关押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大院宿舍楼第100栋的“牛棚”里，由“革命群众”看押管教。

一天下午，张可心拎着给母亲准备的换洗物品，来到了关押母亲的地方。开门的是一个面无表情男人，可心说给母亲送东西，那个人接了过去，门就砰地关上了。就在这大概几秒的光景里，一幕景象印进了张可心的脑海。

房间里，对着门有一张桌子，一个背影像是母亲的女人，手被绑在身后，双膝跪地在桌前，身后还站着人。也许是听见了可心的声音，这个女人挣扎着扭过身来，在她侧脸时，可心看清她嘴上戴了一副像是口罩的东西。

王佩英受到的待遇，除了毒打，还包括饿饭，手反绑，上厕所都需要狱友协助。王佩英在被关押期间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还不如国民党呢。”

王佩英还要被“劳教”，王佩英当时的状态是“脸色蜡黄，被折磨得瘦弱不堪”。可劳动的时候，她却一点儿不偷懒，甚至常常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

这时的王佩英，用造反派的话说，“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变本加厉”。她的难友们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藏了笔和纸，写了很多小纸条，都

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口号。当她们被看押一起去食堂的时候，王佩英就偷偷把这些纸条塞到有人能看到的，甚至在1968年的9月9日、9月30日、10月4日，在食堂“高喊反动口号，疯狂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攻击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更可恶的是，她于9月29日写了大量反动传单预谋在国庆节散发，真是狗胆包天，猖狂之极。”（均摘自铁道部专业设计院革委会整理的王佩英罪行材料）而据难友的回忆，王佩英在食堂的时候，态度非常镇静，当食堂人最多的时候，她起身大声地说“同志们，我有几句话要说……”接下来她的遭遇就是被七手八脚地堵着嘴拖回去，然后被饿饭，被毒打。有几次打得太狠了，几乎是往死里打，王佩英的难友都哭了，齐克琦鼓起勇气抗议“你们别打了，她是个病人，打死她也没有用啊！”最后一次大概就是在10月4日，王佩英直接在食堂喊出口号“刘少奇万岁”。那时正是全国上下一片高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的疯狂时刻，王佩英却表达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反潮流勇气。

齐克琦、刘克英等难友们都曾劝她，你鸡蛋和石头碰，这是何苦呢？王佩英说“刘少奇是吃人民的饭的，毛泽东也是吃人民的饭的，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我想不通。”她还说“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要把刘少奇整成这样，这么害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吗？”

据所有人的回忆，在王佩英被打的时候，都是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从不求饶，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人家让她承认刘少奇是叛徒，她顶回去：“谁是叛徒，谁心里清楚”；有人威胁她要坐牢，她就说，“我愿意把牢底坐穿”；人家说，你不怕死？她答，“到这个时候我还怕死吗，我不会屈服，你们想好吧！”

但是最后有一次，只有一次，在审讯人员面前，她哭了。那一次，王佩英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长了，审讯人员威胁她，给她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否则她就再也见不到她的儿女了。这时，王佩英哭了，哭得很伤心。可她擦干眼泪，还是坚持，“刘少奇不是叛徒。”（以上均摘自铁道部专业设计院革委会整理的王佩英“罪行材料”）

1969年的下半年，王佩英参加了无数批斗会，被拉到各个区和农村的大队游街批斗。王佩

何家栋的尊严

• 杜 光

何家栋是五七难友中最具悲剧色彩的思想家。

他的一生是备受煎熬的一生,但他从来没有在灾难面前放弃自己的尊严。他所表现的崇高品格和所写的大量文章,是他留给社会的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他以敏锐而清晰的洞察力,对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验,对我们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进行了独立的思考,积累了非常丰富、非常深刻、对当代社会极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理论成果。在他多数是用笔名所写的文章和同友人的通信中,闪烁着无数智慧的火花。2006年,何家栋在发现自己已经进入肺癌晚期、治疗无望后,曾在住院时对他的夫人陈蓓说:“这些年来,我化名写过一些文章,不但子女没有看过,连你也没有看过,为了让大家理解我,可以自费出书,送亲友看看。”

何家栋1938年15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赤胆忠心,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但他终其一生也

没有得到这个党的信任和重用。1939年,他参加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专事破坏日寇的铁路、列车、桥梁。他的伙伴们都参加共产党了,唯独他入不了党,为什么呢?原来,有一次,一位共产党员同他谈起统战工作,那位党员说,统战工作“就是借政府名义,发展抗日力量”。何家栋应声说:“我明白了,统战统战,借窝下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明统暗战,这不道德。”因此,他被认为是反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长期被关在党的门外,直到1945年才入党。

这个事实,典型地反映出何家栋投身革命后的矛盾所在。他认定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建设新中国,都是高尚的、值得献身的事业,但他容不得违背传统道德、不仁不义的政策和措施;他愿意为这个事业奋斗终生,却绝不放弃为人的尊严和品格。他虽然襟怀坦白,志存高远,却也不能不承受卑劣的冷箭。

1949年,何家栋在工人日报社工作时被任命为工务科长兼印刷厂厂长。经过他的着意经

力,想把头扬起来,又被按下去,大概是既怕她喊出口号,又怕堵住嘴太明显,显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孱弱,所以在最后的公审大会上用了一根比较细的绳子,勒住王佩英的咽喉,让后面的人拽着,这样绳子陷进肉里,既能使她发不出声来,远处的“人民群众”又看不到。后来专案组的人说,王佩英在公审后被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就发现已经被勒死了(这个说法,张大中和专业设计院的很多人当时都听说过,都印象深刻,可没有找到行刑人员的情况下,今天已无法对证)。

1970年1月18日由谢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请示,1970年1月22日得到批复,由文革司法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判决书”。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公审”,判处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

在会场中央,王佩英还在挣扎,她用全身的

力气,想把头扬起来,又被按下去,大概是既怕她喊出口号,又怕堵住嘴太明显,显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孱弱,所以在最后的公审大会上用了一根比较细的绳子,勒住王佩英的咽喉,让后面的人拽着,这样绳子陷进肉里,既能使她发不出声来,远处的“人民群众”又看不到。后来专案组的人说,王佩英在公审后被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就发现已经被勒死了(这个说法,张大中和专业设计院的很多人当时都听说过,都印象深刻,可没有找到行刑人员的情况下,今天已无法对证)。

我们可以确信的是,直到最后一刻,王佩英并不后悔。

(作者为独立学者、专栏作家)

(责任编辑 吴 思)

营,印刷厂扭亏为赢,又办起了出版社,他成为实际上主持出版社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出版社的业务蒸蒸日上,买了工厂,盖了大楼。1951年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了,在毛泽东的严令催逼下,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所有接触钱款物资的人员,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成“老虎”。当时有所谓“山高林密,必有老虎”之语,贪污一亿元以上为大老虎,五千万元以上为中老虎,一千万元以上为小老虎(这是当时的币值,相当于后来的一万元、五千元、一千元)。何家栋经手过大批钱财,在劫难逃,也被打成“大老虎”。后来虽然查清他没有贪污,但又被人密告有“叛徒”、“国民党特务”的嫌疑。根据是他1940年在水行营交通队,以上尉政训员的身份,承担共产党的秘密联络任务,被国民党的特别党部逮捕审讯,经地下党营救获释。1941年在129师太岳军区文工团工作时遭遇日军大扫荡,被捕后押往山西侯马做苦力,八个月后经他父亲保释到天津。他在天津结识了一批爱国青年,1943年他们13人相约投奔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因为没有组织介绍,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为首者被枪毙(此人是皖南事变时幸免于难的新四军宣传干事),其他青年都被驱逐出境。这些历史旧案继三反运动之后被翻了出来,明显地具有排斥异己的性质,结果何家栋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后来经过调查,不但所谓“国民党特务”纯属子虚乌有,而且查出何家栋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斗争的事迹。既然这样,就应该恢复他的党籍了吧,但没有。支部书记让他写申请,他拒绝了。他的理由很充分:你们既然查出当时搞错了,就应该主动改正错误,为什么要我申请。因此,他被认为是目无组织、对党摆架子,结果继续被关在党的门外。

这就是何家栋其人的精神特色。当他必须在屈辱和人格尊严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即使是面对党籍这样重大的问题,他宁可放弃党籍也要保持个人的尊严,不愿以接受屈辱来换取党籍。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损失太大,他是失败者。但是,他所遵循的道德标准和他所做出的是非选择,却表现出他的崇高品格。他以崇高应对卑劣,高傲地屹立在道德制高点



杜光(右)与何家栋

上,为社会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中华儿女的心头,崇高永远是对卑劣的胜利者。

领导职务被撤销后,何家栋被下放到校对科做设计版式之类的具体工作。但是,即使是站在党门之外,这个党的共产主义理念却始终在冲击着他。他时刻想着怎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他当时的处境却限制着他的愿望的实现。他觉得与其退避三舍,不如主动争取。当他看到报纸上介绍吴运铎的事迹,又听说吴运铎正在人民大学学习,便萌发了要把他的思想和精神写出来广为宣传的念头。何家栋利用中午休息时到人民大学采访吴运铎,写出了《把一切献给党》。这本既没有列入计划,也未经领导批准的小书,出版后的几个月里就发行几百万册,风靡全国。他因此被任命为出版社新成立的文艺编辑室的副主任。接着,他又写出《赵一曼》、《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等畅销一时的革命传记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何家栋完全抛开加之于他个人的屈辱,怀着满腔热情去描述吴运铎、赵一曼、方志敏等为崇高理念而不避危难、不惜牺牲的英雄行为,展示出共产主义教义同人性美好一面相结合所产生的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胡耀邦看到《我的一家》的校样,赞不绝口,马上批示《中国青年报》连载。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前那个弥漫着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社会蒸蒸日上的条件下,何家栋的这些炽烈如火、扣人心弦的著作风靡一时,成为广大青年学习的榜

样与传诵的话题。

在这个历史事件里,充满着强烈的嘲讽。它不仅在于这些宣传共产主义理念、弘扬共产主义者崇高精神的著作,出自一个被开除党籍,又拒不通过申请来恢复党籍的小人物;而且,这些书籍是以无名作者的形式出现的,何家栋被剥夺了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从小的方面来说,这些著作作为出版社带来一笔又一笔不菲的利润,不断提高着出版社的声誉;从大的方面来说,何家栋为共产主义的宣传立下了当时无人企及的巨大功勋,应该提倡人们向他学习,他应该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模范,应该获得与他的劳动相称的鼓励。如果换了一个人,也许有可能名利双收,但何家栋却没有获得任何报酬,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

对他的不公正远不止如此。就在他的著作教育着、影响着广大青年的时候,他竟因为出版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等书而被划为右派分子。

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何家栋虽然没有党籍可以开除,工资却被降了四级,但他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工作上。1958年,他被指定帮助李建彤编写《刘志丹》一书。书还没有出版,就因为毛泽东在1962年认定“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何家栋竟也成了“习贾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审几年后,他在1965年被遣送到山东武城县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大的灾难落到了他的头上,除他本人被揪回北京批斗,关进牛棚(后被送回山东)外,大儿子被造反派打成内伤,死在医院里;接着,次子又因绝望而自杀。

1979年右派问题被“改正”后,随着《刘志丹》一案的平反,何家栋恢复了党籍,不久被任命为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恢复党籍后的何家栋,虽然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已经逐渐消退,但为社会服务的志向却更加坚定了。他为自己的定位是做一个“发现者”。刘宾雁曾希望他去当记者,他说:“我的兴趣是做发现者,不是做干预者。至于发现的是流星还是行星,或者不过是一团鬼火,对我并不重要,因为我从不指望登上哪个星球,或蒙受它的光耀。发现,是一种乐趣,人在发现过程中得到满足,纵使一错

再错,也会乐此不疲。”

怀着作为一个发现者的意愿,何家栋在1983年、1984年先后创办了《人生》月刊和《开拓》文学杂志。但他的壮志未酬,就因为《开拓》创刊号上发表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再次遭到整肃。

1985年离休后,何家栋为自己开辟了全新的活动领域,在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同时,也实现了成为一个发现者的愿望,提升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离休当年,他就应一些青年之邀,担任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校长,为青年们挡风解困;1987年,他被聘为主要由青年活动分子构成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并创办《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担任主编;1988年出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1993年任《战略与管理》双月刊顾问,2004年还充当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创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的法人代表。在这些活动中,他发现了、结识了许多才智出众、忧国忧民的优秀青年,同他们心气相通,配合默契,把这些事业办得生气勃勃、轰轰烈烈。以《经济学周报》为例,据《怀念老何》一文中介绍,1988年《经济学周报》因负债经营,面临危机,何家栋应邀参加改组,出任总编辑。报社明确实行总编负责制,由何家栋主持全面工作。何家栋再一次表现出他的出色才能,使周报不仅起死回生,而且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引领时代风骚的舆论先锋。胡耀邦逝世前曾委托夫人李昭代他写信,称赞“周报不仅有学术研究,更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会得到社会的信任”。他祝愿周报“越办越好,起到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

我们可以从一些青年对他的评价里,看出何家栋在他们思想上的地位和分量:

“何老完全超脱了个人的苦难”,“从来不曾对自己的际遇有过任何抱怨。他思考的是整个民族的苦难,再从苦难中反思整个民族,也反思自己。反思得那样痛苦,那样彻底。在反思之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成就了一个新的何家栋,决绝的何家栋,勇敢的何家栋。”“从苦难中腾飞,在烈火中永生。何老的人生就是这样,悲惨而壮烈。”(笑蜀)

“何家栋先生为当代中国的知识和思想的生

产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人为参照的精神文明史。”“他在早年抒写了人的崇高美好一面之后,在晚年找回了人的本质,找回了火炬。”他的文章“是金石檄文,是黄钟大吕,是大海潮,是狮子吼,是大光明。”“命运从来没有给过他机会,但他功德圆满。”(余世存)

“何老的思想很彻底,但立场的超越性和思想的彻底性又是同对可操作性的现实考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我们同样尊重的一批老人中,何老的思考是最深刻、彻底的,理论性也是最强的。”(肖雪慧)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最大限度地发出人性中善良高尚的光辉,照耀自己的周围以至于整个社会,是一个很难企及的境界。何家栋以他的真诚、宽厚和孜孜不倦的精神,攀登上了这个人性道德的高峰。他多次自嘲“我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但恰恰是他,既继承了、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清高品格,又确立了、保持了现代公民对于个人权利和社会义务的历史责任感。

除了真诚奉献、埋头苦干、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刻苦学习、清廉自守、扶掖后进、甘为人梯等高尚品格的范例外,何家栋通过反思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验所得出的思想理论成果,是他留给后人的更丰厚的精神财富。如在2003年所写的关于道统、政统、学统的分析中,他指出:由思想家构成的道统,其重要性还在由政治家构成的政统之上;所谓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构成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上,以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为主链的“新道统”,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所以,何家栋用大量文字缕述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的主要政治思想观点,从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见解,到胡适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顾准对近代世界文明主流的辨识,李慎之为作为全球价值的自由民主和公民启蒙的大声疾呼,描画出20世纪新道统的“统系和精粹”。何家栋通过对前贤的思想学术的介绍,为后人启示了构成新的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的途径,指出了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那就是贯串于前贤们思想学术之中的民主、宪政和自由主义。中国当代和今后几代的知识分子,都必须

把握这个新道统,才能有所作为。

2004年,何家栋在为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在继续肯定民主的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妥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说:民主是“世界主流文明的基石”,“民主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机制,就像空气、水分和阳光,都是生命赖以存在的要素。”民主是“世界主流文明的基石”,“米奇尼克认为,民主是灰色的,而灰色是美丽的。”何家栋则进一步指出:“如果说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它不仅是美的,也是善的,真的。得到的是共同需要的东西,而将各自不想要的东西搁置一边,因为妥协各方都是胜利者,没有失败者。”妥协需要宽容,需要和解,需要平等对话,需要“对对手的理解与信任”,而不需要暴力。他引用米奇尼克在《狱中书简》里的话说:“那些运用暴力攻占巴士底狱的人,很容易建造一个更加悲惨的巴士底狱。”因为,“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何家栋在序言里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思想:“革命是自由的儿女,但却是专制主义的父母。”多么深刻!可又多么通俗!

在何家栋的文章里,还有许多高瞻远瞩、涵义丰富,但还没有深入展开论述的思想,如:“共产党不现代化,任何现代化都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的学说的第四个来源是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即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在严格的意义上,中国没有真正的改革派”;“中国人正经历着一场情感危机,一场比社会危机还要深刻的危机”;“旧民主革命是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新民主革命是阿Q不许假洋鬼子(知识分子)革命”;“离开自由、民主、人权……就要血流成河”。何家栋的这些观点,都很有启发意义。

何家栋的一生是值得我们怀念、学习的一生。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但有堪为楷模的崇高品德和奉献精神,可供深入开发的思想资源,而且,他通过刻骨铭心的生命历程而终于实现自我的体验,他在许多文章里所流露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教益的典范。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陈独秀是中国最早的工运领袖

• 胡甫臣

我一直在工会工作。但我对陈独秀,只知道他是非正面的著名共产党领导人,著名高级文化人,是大知识分子。不知道他和工人阶级有过什么直接的关系。在我工作过的这些单位,从来没有正面宣传过他的英雄事迹。当然,这和我学习中国工人运动、工会运动的历史不够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曾被中国共产党当做托派(当时是当做敌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服从共产国际领导而开除了党籍;抗日战争时无中生有地栽污他是汉奸而不让如实宣传他。所以,他是被满盆污水泼遍全身的伟大革命家,人们不知道他的本来面目。但我们不能把我国最早从事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领袖排除在历史之外呀。我们党并不是一开始就只搞农民运动,并不是远离工人阶级从农民运动中产生的政党。我个人的笑话正是远离了我们党最早从事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陈独秀,而把湖南水口山、江西萍乡的工人运动看成是我国最早的工人运动。其实,它们都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开展工人运动,由大会选出的总书记陈独秀领导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又分别在北京、武汉、湖南(包括江西安源)、广州、山东设立了五个分部之后开展起来的。李立三也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其实他从法国回来就是陈独秀派他去湖南做工人运动的。上述湖南、江西的工人运动,都是在陈独秀领导下开展起来的。

我是文化大革命后读了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从秀才到总书记》和唐宝林的《从总书记到反对派》等书,以及一些陈独秀研究者突破思想禁锢写出的一些文章后,才开始在脑子里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的。

他最先用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

陈独秀在发起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已经是全国著名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了。但那还是做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1920年初,他到了上海,当时上海工人阶级已多起来,苏联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他的思想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投入到工人运动中来。此时他已是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他向工人宣传的已是社会主义思想。3月间他即开始预告《新青年》将出五一劳动节纪念专号,并立即开始约稿。在这一期专号上刊出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希望中国工人把这一天作为一个觉醒的日期;介绍了全世界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而定五一为国际劳动节;介绍了美、英、日等国的劳动运动;刊载了苏联的劳动法典;刊登了他派人去几个省调查各地劳动状况的报告;还登了他自己写的《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两篇文章;登了孙中山、蔡元培等16人(其中有9个普通工人)的题词;登了苏联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内容丰富,有400页,等于平时该刊的两倍多。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典型,也是陈独秀思想转变的一个突出表现。他还积极地参加上海庆祝五一节的筹备工作。他首先提出将纪念会的名称定为“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这是上海工人也是中国工人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大会提出的口号和发布的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草拟的。

他在广州时(他曾在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前后两次去广州),受聘为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做了许多教育改革的工作。他自己说:“我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429页)他创办宣讲员讲习所,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了一批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又开办了工人夜校,先试验办了机器工人夜校,有100

多人参加。他第二次到广东时,开办了理发工人夜校,理发工会成立时,会员上千。

他这时期从事工人运动,主要宣讲的是要工人认识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阶级觉悟。他认为工人最高的觉悟就是阶级觉悟。他以他在思想界、文化界崇高的威望,加上他在办《安徽俗话报》时所积累的通达学问,用最通俗的白话文语言,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来教育工人。

1920年初他初到上海时,在上海劳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对工人讲:“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般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

他在上海和李汉俊创办了宗旨在改良劳动阶级境遇的《劳动界》周刊,他在创刊号上写了《两个工人的疑问》一文:“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世界上若是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已饿死了。”“人工如此重要,所以有人说什么‘劳工神圣’。但是有一个做工的人问我道:既然是劳工神圣,既然是人工如此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说做工的人是下等社会,不做工的人反来是上等社会呢?”“又有一个做工的人问我道:有许多出力做工的人做出粮食房屋或是衣服,却仍然没得吃没得住没得着,有许多人不劳一点力不做一点工,反而吃得很阔住得很阔衣服也穿得很阔,这还不算,还要把出力做工的人压在脚底下不当人看待,这又是什么原故呢?”(同上书,第243页)

在《劳动界》第四期上他写了《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一文。他说“十六铺提篮桥洋泾浜底小客栈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里住宿,这是容易见着的。丝厂香烟厂小女工一天只得着几个铜子还要挨打,这也是容易见着的。这班人做了社会上重要的工,和懒惰的乞丐不同,但是他们的生活比乞丐还不如……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人类



工运时期的陈独秀

底同情心,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同胞底感情,便应该出力帮助这种贫困的劳动者。”“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底同情心和对于同胞底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同上书,第266页)陈独秀还在《劳动界》上写道:“老年人不肖吃牛肉,是以为牛替我们耕了田地,出了米麦……但是种田的织布的做屋的做机器的劳动者也都替我们做了和牛一样的重要工作,我们千万不要吃他们的肉啊!”(同上书,第270页)

《陈独秀著作选编》选入陈独秀从1919年12月1日《告北京劳动界》,到1922年5月23日《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的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将近40篇。除上面所举例子外,还包括和资本家讨论“工人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讨论工人教育问题中减时增资问题,还有辩论和批判诬蔑工人、轻视劳动的短文,要工人正确认识宗教、正确认识劳动剩余价值,以及讲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问题的文章。

其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还有关于动员学生、文化界要与工人合作和要工人与学界团结的文章。他在《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一文中说:

“我曾劝许多在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吗?”(同上书,第169页)他在工业学校演说时说:“体力劳动者,把体力卖给资本家作工,是一个被雇者;工学生把脑力卖给资本家做工,也是一个被雇者。既然同是被雇于资本家便是同在一个阶级。那么,工学生便应该和体力劳动者携手,不应该同资本家携手,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同上书,第354-356页)他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中也特别提到:“我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底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同上书,第286页)陈独秀就是这样体贴工人,站在劳动者的地位,以心贴心来启发劳动者的觉悟。

他的文章通俗易懂,篇幅短小,论点清晰明白,十分好读好懂。好多重大的问题,重要的思想,都是这样表现出来的。

他最先领导工人组织工会

工人这么苦,觉悟又这么低,那我们开展工人运动,该怎么办呢?陈独秀大声疾呼:“无钱无势的劳工,怎样对付这班资产阶级一手把持的行政机关呢?也只有听马克思底教训:‘世界劳工团结起来啊!’”(同上书,第247页)他对工人讲,“外国各业工人都有工会……千辛万苦一件一件向国家及厂家”争得了许多好处,而他们以前也是不准工人成立工会的(同上书,第287页)。“我中国现在的法律,也是不许工人立会的。”所以有许多正正当当的工人团体,不准叫工会而叫“职工养志团”“工余群旅”等等。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啊!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啊!”(同上书,第243页)这是因为陈独秀了解当时上海的工会多半是下流政客、流氓、资本家把弄的,有的只一个把总一个兵,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衫的先生多,穿短打的工人很少很少。那不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组织。陈独秀要同他住在一起的李中到江南造船厂当

钳工,发动工人组织真正的工会。发起人有了80多人后,陈独秀就和李中帮助他们起草了上海机器工会章程。这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基层工会章程。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时,会员已发展到370多人,参加会议的近千人(邹沛、刘真:《中国工人运动史话》,中国工人出版社)。上海机器工会成立那天,陈独秀帮他们邀请了孙中山、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等社会著名人士参加,孙中山作了两个小时的演讲。陈独秀等六人并被邀请为名誉会员,机器工会还推举陈独秀为经募处主任。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后,随即建立了有1346人的印刷工会,更开始主动和天津机器工人联络。上海机器工会是党成立前共产主义小组组建的第一个工会,算得上是中国工会的老祖宗!1920年,标志着中国工人由自在阶级开始走向自为阶级,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了群众基础。

第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虽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仍被选为党的总书记。9月,陈独秀从广东回到上海,便积极执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最主要的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的决议,很快就成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不久又设立了五个分部,要求各地也组织工会,开展补习学校,组织罢工保护工人利益。

陈独秀在上海组织工会,首先碰到的障碍是那些被邓中夏所称的招牌工会,他们打着工会的招牌,自称工界的领袖,要求参加“国事会议”等不三不四的活动。陈独秀就以当时正组织的真正的工会与他们斗争。陈独秀曾两次写文章高呼:“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万岁!”他在《再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一文中说:“鄙人对新组织的各业工会代表团,抱以无限的希望。现在,他们能够觉悟,居然能够离开非工人的招牌工会,居然能够集合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真正工人的工会筹备组织,更加令人不能不欢迎佩服了!”(《中国工人运动史话》一卷,第80页)这是劳动组合书记部为成立上海市总工会斗争打下的群众基础。

他是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最早的领袖

1922年4月陈独秀第二次去广东,主持和

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两个代表大会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这一年全国罢工100次，罢工人数21万人，史称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这段时间进行工人运动运用的形式，有办工人刊物、演讲、办职工学校、补习夜校、干部培训学校、俱乐部和罢工等，这基本形成我国此后开展工人运动最常用的形式。这时已不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去教育、发动工人，而是以总书记身份领导全党开展工人运动了。

拿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四次大罢工来说，就都是在中共中央要求下，各地集中力量组织起来的。全国铁路工人罢工，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先锋。陇海铁路罢工是产业工人第一次大规模罢工，历时7天，胜利后建立了陇海铁路总工会，这是中国铁路建立的第一个总工会。陈独秀给领导罢工的罗章龙去信说：“陇海罢工，捷报先传，东起连云，西达陕西，横亘中州，震动畿辅，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中国工人运动史话》一卷，第162页）接着是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使工人阶级的觉悟大大提高，斗争经验大大增长，为以后的斗争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1925年5月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十二厂（纺纱厂）厂主无理开除工人代表，全厂工人停工抗议。次日，内外棉七厂（织布厂）借口无纱将厂门关闭。当工人涌进厂要求上工时，日人残杀了工人顾正红。惨案发生的第四天，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30日，约有3000学生上街宣传，被英国巡捕屠杀造成“五卅惨案”。中共中央当晚即宣布成立上海总工会，组织反帝联合战线，发动罢工、罢课、罢市。陈独秀在这期间发表了11篇文章，特别强调这不是地方事件，是全国大事，这不是经济斗争，是带有民族性的反帝政治斗争。运动迅速席卷全国600座城镇，有1700万人参加。五卅运动成了一次极为广泛的反帝宣传运动。运动后党的队伍扩大了，威信提高了，真正成了群众革命的党。但在我过去读到的党史材料中，在党史总结经验的材料上，参加领导这次运动的党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

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等都有，却没有全程参加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

1926年7月9日北伐誓师典礼。陈独秀起先认为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没有引起重视。但北伐军进军神速，党中央立即转为进攻，陈独秀马上积极起而领导。党中央决定建立市民政权，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陈独秀一直坐镇上海。运动中第一次以商界为主体，失败了；罗亦农提出以工人为主体的，未被接受。第三次起义接受第一二次失败的教训，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充实市民公会。起义前建立了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特委会以陈独秀为首，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主要负责人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8人组成，还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前线军事委员会，以尹宽为首的宣传委员会。特委会开了31次会，陈独秀出席了30次，他到会必发言，使整个运动的领导十分得力。工会实现了80万人的总同盟罢工，取得了起义的胜利，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了上海。而我过去看到写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材料，大多都避开陈独秀总的领导，把只是前线军事指挥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说成是整个起义的领导者，好像根本没有陈独秀这个人一样。

历史首先就要讲史实。陈独秀在历史上是怎么样一个人呢？还陈独秀的本来面目：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民主与科学的倡导者、启蒙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前清秀才，大学文学学院院长，诗人，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也是最早的工人运动领袖和工会运动领袖，是任过五届总书记的共产党人。但历史对陈独秀，党对陈独秀并不公平，几十年来一直让他受屈，五卅运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成功了，却把他的名字隐去，完全否定了他的功劳。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因为他也有错误，就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以及党内其他领导人的错误全都堆到他一个人身上，让他背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出党。从此，中国共产党好像就没有过这个为党立过大功的总书记了。

经过这几年党史界、历史界、学术界的研究，特别是苏联档案公开后，大家的认识已趋一致，重新评价陈独秀功过应该是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作者为工人出版社前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李晨）

改革的可持续性决定执政的可持续性

• 章立凡

“春晚越来越像两会，两会越来越像春晚”，看完春晚看两会，在中国几乎成了一年一度的大众娱乐。

一 选举法修改：尚未兑现建国承诺

今年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将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当然是一种进步。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冲突加剧的今天扩建“农村票仓”，或不失为一种“维稳”策略。据称，本次修改对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但1949年《共同纲领》所规定之普选方式，却未在本次修改中有任何体现。

建国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且有一处特别用了“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然是特指“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而非间接选举。目前除基层选举外，省市、全国人大代表仍由“代表选代表”的间接选举产生，名为普选，实与建国时的承诺存在歧义。

1953年制定选举法时，采用了“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方式。时任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的邓小平解释说：“我们的选举还不是完全直接的，投票的方法也还不是完全无记名的。这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人民还有很多缺乏选举经验以及文盲尚多等等实际条件所决定的。”

根据瑞典一个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IDEA）的纪录和研究，截止到2007年，全球已有185个国家的人民可投票选举国会，包括埃及、印度、南非、以色列等。更有108个国家的人民可投票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总统、总理、首相……）。

直接选举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马克

思、列宁均有主张直选的论述。1944年8月，毛泽东在与约翰·谢伟思谈话时也指出：“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它无需经过长期实验，或者教育，或者‘监护’。”选举法颁布已经五十七年，若仍以社会情况、选举经验及文化水平作为不实行直接选举的理由，则中国六十年来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又何从体现？

在公民普选权方面，中国既未与国际接轨，也未实现建国共识中的民主承诺，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沾沾自喜为时尚早。

二 “民意代表”分化：雷人秀 VS 民生提案

春晚以低俗节目娱乐大众，两会以雷人提案娱乐大众，是多年形成的传统。随着社会日益两极分化，今年两会的提案和发言也出现分化：除了“从来不投反对票”的明星政治秀、“封闭社会网吧”的商人圈钱秀、“获奖先感谢国家”的官员爱国秀、“老公给老婆发家务工资”及“改扫黄为扫色”等无聊变态秀，痛斥“卖地财政”、直指“房价高明明是地价高”等切中时弊的言论也有所增加，关注民生的提案占了很大比例。两类提案皆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反弹和热议。民间议政的存在，已对两会的代表、委员形成压力，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需要打“民意牌”，另一部分人则继续以弱智方式娱乐大众。

本次两会的风景线之一是：五十五年一贯不投反对票的申纪兰代表，如今有了倪萍委员这样的知音；另一道风景线则是：多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给表决器加盖子。一边是公开宣称从不投反对票，另一边是投票怕人知道，两个镜头折射出同一悖论：代表、委员都不是选民直接选出的，而是“被安排”的。在民主法制健全的国度，

有选票作为背书,民意代表可理直气壮地代表选民公开行使权力,无须有所顾忌。真正需要质疑的,是代表、委员的产生方式。

目前人大的执政党成员约占 2/3,既执政又“参政议政”,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监督”自己,本身就是一条悖论。两会参政能力的贫弱,折射出执政能力的下降。

三 关注民生 政府首先要让利于民

今年两会集中关注民生问题,聚焦点在高房价和“国进民退”。

90年代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切走了最肥最大的一块,土地财政成了很多地方的主要财源,房价结构中,土地出让金、税费及权钱交易成本占了一半以上。“卖地财政”没有可持续性,土地资源储备有限,前任卖多了,后任要提价。中央不让利地方,地方不让利百姓,房价怎能降下来?国有土地属全民所有,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置业,未享受国民待遇。

为了追求 GDP,政策历来注重虚拟经济,不注重实体经济。大众缺乏投资渠道,就只好炒股炒房。所谓炒房,主要是把钱从银行套出来,再装进地方政府(当然也包括官员)的腰包,其他相关环节也可各分一小杯羹,埋单的是食物链终端的消费者。迄今为止,国土资源部出台的政策,都在抑制炒房、囤房上,治标不治本。“卖地财政”的利益链不改变,房价不会回归正常。

一年来舆论热议“国进民退”,全国国有企业(非金融)的总资产从几年前的几万亿发展为2008年的42.55万亿元,估计2010年将达到近百万亿元。国家统计局列举了一堆数据来否认,工信部长和政协发言人也作如是说,只承认是“个别现象”。但马上有人提出,私营企业的工业增加值、资产合计、从业人数、业务收入以及利润都是一起上升的,而国有企业在主营业务收入下降0.2%、利润下降4.5%的同时,从业人数却上升了0.8%,总资产则增加了14%。国企规模日大,利润递减。前年的4万亿政府投资和去年的9.5万亿信贷规模,加剧了“国进民退”,不仅未能拉动内需,反而作茧自缚。

80年代“利改税”以后,国企就不上交利润

了。2008年开始实施“还利于民”新政,要求国企盈余缴库,实际缴库金额仅占GDP的0.2%。国企是所谓“共和国长子”,按“全民所有制”概念,全体人民都拥有国企股份,但从来未见“长子”给父老乡亲分红。

官僚化管理并不鼓励创造性思维,创意主要是从民间创业中产生。任何国家的经济活力都不是来自僵硬的体制,而是来自民间的创造力。国家经济状况窘迫的时候,网开一面允许民企发展,经济实力增强后就吃掉他们;待到民企大量倒闭,就会出现经济萧条和失业,政府税源也会枯竭。“国进民退”缺乏可持续性,出尔反尔的经济举措,在历史上是有惨痛教训的。

急功近利的经济政策,实为三十年间最大的积弊。“卖地财政”和“国进民退”,本质上都是“官进民退”。只有官府让利于民,官企不与民争利,国家藏富于民,社会才不致失衡。

四 监督无力 权力何时在阳光下运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在会场爆料:“预算法的修改将明确地提出‘所有的政府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正式实施以后,在我国存在多年的政府预算外收支将成为历史。”

地方政府“卖地财政”即属于预算外收入,据说目前全国公款消费已超过了一万亿大关,建设“透明政府”实为当务之急。人大要监督政府的钱袋子,当然是件好事,但打铁还需自身硬,人大也应晾晒自己的钱袋。全国人大、各省市人大及各级政协开会,从食宿、办公到通讯、交通,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的薪酬补贴如何计算?今年动用70万警力保两会,行政成本是多少?这好像不算什么“国家机密”,不妨学习广州市的先进经验,公布开会明细账目,行使监督权才更有公信力。

两年前就有披露,十年间上万外逃贪官带走6500亿人民币。官员的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从1987年就开始酝酿,迄今已二十三年。有代表已连续五年提出“阳光法案”,这回有关部门的答复仍是“条件不成熟”。“亡羊不补牢”,近年中国法

制建设出现倒退,保障社会监督的善法如《新闻法》及官员财产公示法规迟迟不出台,抵触宪法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刑法》306 条等恶法却横行无忌。人大监督不力,新闻监督无法,傲慢的权力藐视民意,才会出现某封疆大吏公然威胁记者的怪象。

虽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年年以人民的名义开会,年年讨论几乎相同的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开会意义何在?如今什么都讲究“低碳”,两会在北京这种特大城市召开,全市交通干线每塞车一小时,社会要分摊多少成本?说到这里,我也来提个“低碳议政”建议:既然今年两会给每人都发了笔记本电脑,不妨学习网民议政的方式,来年改开“网络两会”。电视、互联网同步直播,既减少扰民,又便于公众监督互动,还可节约资源和纳税人的钱。

五 兑现尊严:官员先学不撒谎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尊严”这个词,今年他已经说了三次。温总理一向提倡讲真话,我也愿意相信这回他讲的都是真话,但希望这个“我们”中,不包括说假话的官员。地球人都知道——撒谎的人没有尊严。

失信于民没有尊严。越是禁止人民讲真话,越是文过饰非,就越没有尊严可言。根据官方杂志《小康》2009 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有 49% 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37.8% 的人则更担心政府的信用危机。公众对“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提问,表示不信任的比例高达 91.1%。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选为本年度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政府官员的信用,亟需赶超小姐。

人民普遍富裕才有尊严,分配不公、贪腐严重的国家没有尊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六十年间财政收入增长 985 倍;外汇储备增长近 14000 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六十年间仅增长了 18.5 倍,农村居民

的人均收入目前还不到城镇居民的 1/3。另据财政部的统计数字,中国 10% 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 45%,世界平均数值为 31.7%;10% 的最低收入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 1.4%,世界平均数值是 2.5%。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世界银行指出,中国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

尊严植根于国民素质,教育落后的国家没有尊严。“产业化”的中国教育生产线,只会制造“标准件”,扼杀的是民族的创造力。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披露的数据,目前我国实际的公共教育投入仅占 GDP 的 2.4%,低于印度的 2.7%,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目前这一指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 4.9%,发达国家为 5.1%,欠发达国家为 4.1%。即使我国在今年达到 1993 年提出的 4%,也只是欠发达国家水平。

温总理 2 月 27 日与网民交流时,对“尊严”的含义作了解释,提出保护自由、人权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如果他在余下的任期内,有能力解决政府公信力、分配不公和教育三大难题,尊严才不会是一种奢望。

六 改革:改革者的墓志铭?

温总理历次重要出镜,都留下一些感人的名言警句,今年也不例外。他在 2003、2008 年和今年人大,都引用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格言。无独有偶,其前任朱镕基 1998 年上任时,也站在同一地方说过:“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说到“万丈深渊”,令人想起西哲尼采的格言:“当你凝视万丈深渊的时候,万丈深渊也在凝视着阁下。”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结局堪叹,改革开放以来,两任执政党领袖先后悲壮牺牲,尽管很少有人提起,但作为改革家,他们保持了历史尊严。此时此刻,我想套用一下诗人北岛的名句:“腐败是腐败者的通行证,改革是改革者的墓志铭。”

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

● 周筱赟

今年5月1日至10月31日,“2010年世界博览会”在中国上海举行,历时184天。作为首次在中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自然引起上上下下的关注。其后,从11月12日开始,“第16届亚洲运动会”在中国广州举行。作为一个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过多年,现在又在广州生活工作的媒体人,以我个人的观察,我发现对于当地主办的最大项目,从官方到民间,上海和广州这两座城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舆论生态。从中或许可以折射出两地舆论管理机构的不同思路,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上海到底欢不欢迎你?

我注意到上海集中舆论力量宣传博览会,是从今年1月21日开始。当天是上海世博会倒计时100天,我在广州看到当天的全国性媒体,连篇累牍地宣传上海世博会的重大意义,以及领导如何重视,上海的普通市民又是如何支持世博会,等等。乃至说到世博会工程的拆迁,电视镜头里出现一个老太太出来说如何支持拆迁。而在此之前,刚刚发生成都市民唐福珍为对抗暴力拆迁而自焚死亡的事件,引起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并最终迫使有关部门明确表态废止《拆迁条例》,代之以《征收条例》,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拆迁还

做出如此表态,确实令人诧异。

据今年3月23日《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为了挪出5.28平方公里世博会园区,共动迁了包括270多家企业和1.7万余户居民。这还不包括世博会其他一系列配套重大工程的拆迁。当然,作为世博会这样的大项目,必然要涉及拆迁,其实,我作为媒体人,关注的是这些拆迁户的补偿是否到位,够不够在同一地段购买相同面积的房屋,如果必须搬迁到其他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受到的影响如何解决等等。但相关报道对此只字不提。

今年的春节,我是在上海度过,看到了上海本地媒体对世博会的宣传。即使在春节期间,上海本地电视播放的新闻,也大多和世博会有关。甚至地铁上的移动电视,播放的社区新闻,几乎一半都关于世博。当然,全部都是正面宣传,无一例外。比如几位拆迁户,电视报道他们的临时安置房位于某区,强调环境如何优美,配套设施如何完备,他们如何感谢党和政府,但唯独没有提供如何解决这些人生计问题的信息。住到临时安置房内的,势必是社会弱势群体,如果是上班族,新居住地离单位距离改变,坐车上下班时间是否大大延长?如果是摆摊做小生意、开小饭馆等等,搬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原有的社会关系全部消失,他们的生意如何维持?这些信息,报道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今年两会前温总理也曾寄语网友:“有一种十分珍惜的感情,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多了。”这句话令人百感交集,邓小平在80年代就曾警告:“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体制内外利益纠葛盘根错节,“卖地财政”成了政府圈钱,拆迁暴政迹近直接抢钱。回顾三十一年来的

改革,如同重新经历一场财富再分配。

改革还有没有可持续性,决定执政的可持续性。始于1978年的改革,已接近四个八年抗战的周期,时间不多了,机会不多了,关键是公众的耐心似乎也不多了。

2010年3月17日风雨读书楼

(作者为北京作家)

(责任编辑 吴思)

完全没有提供。

我印象很深的是,由于世博建设,某条公交线路的运营时间缩短,面对电视镜头,一位年轻男子称:“这挺好的,不会影响到我上班。”这完全违背了正常人的逻辑。如果新闻报道只能这样做,那公众怎么能对媒体产生基本的信任感呢?行政权力具有无限扩张的天然冲动,媒体的天职之一,应当是反映民生疾苦,遏制行政权力的扩张。早在2005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就提出“要完善对行政管理权力的监督机制,强化对决策和执行等环节的监督”,中共十七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说:“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其中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更是前所未有的新提法。而这些权利的保障,媒体具有关键的作用。政府本来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它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完善,本来就是应该由公众通过媒体舆论来批评、监督。政府更是要直面批评,愿意接受舆论的批评和监督,而不是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全面表扬政府的舆论环境。

然而,随着倒计时开始,上海进入“世博会时间”之后,好像现在上海这个城市,就是为了世博会的举行而存在似的。任何不利于世博会的言行,都要被扼杀在萌芽中;作为上海市民,表态支持世博会成了义务,否则就是不顾大局。

但是,公众的情绪并不会因为本地媒体的有意规避和正面表扬而不存在。一首恶搞版《上海不欢迎你》在上海受到热捧,说明了正面报道之下的潜流。

去年11月28日,在上海举行的一个摇滚音乐节中,有一个叫“顶楼马戏团”的乐团借用《北京欢迎你》的曲调,演唱了一首《上海不欢迎你》。此后,该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一度多达240万个(而现在通过搜索引擎,几乎无法搜到一个)。歌中唱道:

上海不欢迎外地人伊也不欢迎上海人,
上海只欢迎一种人就是有钞票额人。
上海不欢迎你,除非来买东西,可是我们身

上都没有人民币。

上海不欢迎你,世博会实在是了不起,全世界有钱人来相聚。

上海不欢迎你,除非来买东西,我们没有文化也没有人民币。

上海不欢迎你,世博会实在是了不起,全世界有钱人都来勃起。

据现场视频显示,一曲爆响,全场大动,场内乐迷无不振臂高呼,可见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歌词把贫富阶层做了简单对比,涵义略显浅薄,至多只能说是一种戏谑成分。

《上海不欢迎你》还有多段上海话的旁白,自我介绍时说道:

零陵路93号住了一帮摇滚青年,
地下室有五间房间价钱也蛮便宜。
排练好到对过小饭店老酒再咪一咪,
可惜到了今年年底就要面临世博会动迁。

这就反映了社会弱势群体对于其底层生存环境即将被彻底打破后的不稳定感、惶恐感。就是我前文所说的,搬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原有的社会关系全部消失,如何维持原有的生活?没有租金便宜的房子可住,没有低廉的小饭店喝酒,诸如此类,等等。

歌中还有对时事的讽刺:

来工地旁边散步,
当心大楼横倒。
多多囤积大蒜,
价钿还要炒高。
开车子谨防倒勾,
最好熊姐当保镖。

这里共谈及四件时事,一是去年6月27日,上海闵行区“莲花河畔景苑”小区一栋在建的13层住宅楼整体倒塌;二是去年甲流爆发,因传说大蒜能预防甲流,大蒜价格猛涨十数倍;三是去年10月,媒体曝光上海浦东新区、闵行区等区的交通执法部门数年来雇用“钩子”,采用“钓鱼”执法治理“黑出租车”;四是去年10月,上海市南湖职业学校二分校女生熊某殴打女同学的视频被曝光,视频中扇耳光、揍腹部、扯头发、背后飞踹等场面极度暴力。这四件时事中,尤其是“楼倒塌”和“钓鱼执法”,发生在世博会前,被认为严重损害了上海的城市形象。

总之,这首《上海不欢迎你》,只是反映了上海部分民众的一种情绪,戏谑的成分居多,根本没啥大不了的,但是据报道,该乐队的主唱,因公开演唱这首“不和谐”歌曲,竟被当地文化管理部门约谈“喝茶”。

广州“被亚运”和上海“被喝茶”

对于迎接亚运会的广州,多个围绕亚运会的庞大的整治项目展开,也影响到了广州公众的日常生活。类似于《上海不欢迎你》,广州也有人用《北京欢迎你》的曲子,恶搞了一首《广州欢迎你》表达不满情绪:

我家路面常打开,乐不乐意随你
一到下雨深不见底,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新旧随便挖开,请不用客气
东西南北都是工地,我们欢迎你
我们养着规划局,书写每段传奇
中山立交变成骂名,他们不会在意
东西南北同时开工,请不要拘礼
施工快慢都没关系,反正按工期
广州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空气充满着尘泥
广州欢迎你,在天河路上屏住呼吸
在岗顶十字路上堵死你
我家的车很难开,一小时一公里
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更是恐怖时期
天大地大都是红灯,50米就停
内环路和BR T,只为堵死你
广州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有时间去听听调频
广州欢迎你,有道德谁都看不起
有勇气你就插队去

这首歌背景是,为迎接2010年亚运会,广州市在去年密集启动了81条主干道的维修改造工程。由于工期比较集中,城市中心区尤其是广州天河区的交通拥堵情况加剧,成为广州市民和本地媒体每天批评的话题。《广州欢迎你》的歌词和《上海不欢迎你》类似,也是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表达对广州交通拥堵的不满。

然而,作者不仅没有被文化管理部门约谈,这首《广州欢迎你》还让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亲

自为亚运工程对市民生活的干扰而道歉。据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报道,去年10月21日,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公开表示:“因为我们实施迎亚运的城市综合整治工程,对道路进行维修改造,从而造成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市委市政府要向市民表示道歉。”朱小丹还主动谈及网上热传的《广州欢迎你》:“我没听过那歌,但是我看过那个词,前面都挺到位。这个《广州欢迎你》讲广州的交通拥堵问题,我个人觉得,有那么一点夸张,但讲的基本还是事实。”

与之相对照,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政府,即使没有任何夸张,只要是批评政府的言论,就被以“诽谤政府罪”名义跨省追捕、拘留乃至判刑,如重庆彭水诗案、山东曹县帖案、辽宁西丰进京抓记者案、河南灵宝王帅帖案、内蒙古鄂尔多斯吴保全案等等,到今年2月又发生湖北十堰陈永刚案。情节如出一辙,罪名大同小异,地点则遍布全国。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诽谤政府罪”,因为诽谤罪的对象是自然人,政府不能成为诽谤罪的对象。而广州市委书记觉得歌词有点夸张,但仍然承认讲的基本还是事实,这就是最大限度尊重舆论、有自信直面舆论监督的表现。本来,让老百姓有个发牢骚的管道,释放不满情绪,可以减少酿成恶性群体事件的几率。

在迎接亚运会的建设过程中,广州全城媒体都持续不断揭露批评亚运工程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干扰,媒体还频繁使用一个词“被亚运”。《广州欢迎你》,包括《南方日报》在内的广州所有日报类媒体都报道了。而上海的媒体氛围和广州完全不同,我在所有上海公开媒体上查不到任何关于《上海不欢迎你》的报道,连演唱者被请去“喝茶”,也是外地媒体报道的,上海媒体就当这不存在。在上海,我看不到一家上海媒体对世博会的哪怕细节方面的批评,看到的全是广大上海市民的支持和拥护。

我觉得最能反映一些当地官员不自信的是,去年11月,上海嘉定区的世博论坛邀请青年作家韩寒去做演讲,结果韩寒一上台就说,他讲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正好和世博会的宣传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相反。韩寒还说:“期望世博早日地开幕,如果是城市让生活更痛苦的话,我就希望它早日地闭幕。”结果全场哗



广州亚运会吉祥物

然,本来正在直播的电视信号也被立即切断。

其实韩寒的讲演,只是讲了上海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油价上涨、交通堵塞、房价高企、卖地财政等等问题。在广州的媒体上公开讨论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任何障碍。我就不明白,这些地方官员怎么胆小到这种程度?世博会不能只关注上海这个城市最光鲜的一面,更不能回避由于世博会场馆建设而产生的问题和矛盾。世博会的发起机构国际展览局的主席让·皮埃尔·蓝峰,去年11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第7届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国际论坛上发表讲演,也发表了同样的意思。他说:

女士们、先生们,答案并非显而易见,上海世博会的组织者们他们不应该隐藏城市的问题和遇到的难题,这些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先生已经提到了。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困难,又不能够只专注于城市里面最光鲜的一面,而是找到问题的根源。这点正如伟大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子所说的,“切问而静思”。

而在上海世博会的官方网站上(连同上海本地的新闻网站),相应的这段话却变成了:

女士们、先生们,答案并非显而易见,希望上海世博会的组织者们找到问题的根源,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困难。我想引用伟大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所说的:切问而近思。

除了显然由于不同翻译而造成的细微文字差异外,最大的不同,是关于世博会的组织者不应该隐藏城市的问题的论述,竟然全部消失不见了。上引蓝峰发言全文的完整版,我是在人民网

(北京11月12日电,记者曹华)找到的。难道国际友人提及上海世博会也存在问题和困难,我们连公布这样的话的自信都没有了吗?

我曾在上海生活工作过多年,以我的感觉,上海没有媒体,只有宣传。这没有经过定量分析,这只是一种感觉,当然存在片面。但如果媒体制造一种全面表扬的氛围,规避一切批评报道,这无疑会鼓励说假话、空话、套话。让表扬政府成为常态,与当地公众的主观感受产生巨大差距,使他们天然地不信任媒体,认为媒体不是公众的代言人,而是政府的传声筒,那如何才能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呢?

“打开广州报纸天天批评亚运工程”

在广州,由于媒体成天批评亚运工程的扰民,以致连广州市的高层官员,也出来做这样的表态。除了前述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道歉外,今年1月20日,广州各媒体都报道了广州市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痛批部分亚运工程扰民,苏泽群说:“我可以用三个‘一塌糊涂’来总结(部分亚运整治工程),一是管理漏洞,工地不文明不节俭;二是监管漏洞很多,比如不负责任、不到位、不得力;三是道路整治工程漏洞很多,挖出的泥随意堆在路边的,这些报纸都有批评。”

苏泽群说:随着去年整治工程开始后,媒体开始报道一些工程存在扰民的现象,“这我就没有什么好心情,天天打开报纸就是批评。”这就说明了广州的媒体氛围和上海的完全不同之处。广州是报纸天天批评亚运工程,以致书记、市长不得不出来表态,而上海,媒体自然是一片赞歌,媒体报道中看不到一点负面情况。

苏泽群副市长表态后,1月21日在广州人民广场举行的亚运整治工程咨询会上,一位市民在广州人民广场上戴墨镜口罩、背后挂着投诉标语“救救广州吧”,逢人就散发自印的传单,口中不停高声喊道:“亚运改造也不能这么浪费,有钱不如用来控制房价上涨。”他说:“广州为迎亚运会开展的穿衣戴帽工程,有很多都富有建设性,

但也有很多铺张浪费、劳民伤财的。”在广场上接访的广州市建委主任简文豪对他的当面监督表示感谢,并当众将手机号码留给他,承诺有投诉一定认真处理。广州各媒体均用整版的大篇幅做了报道,又是大幅照片又是专访。第二天的消息,是有关部门采纳了他的建议,比如“口罩男”所质疑的广州现在各大道原来好好的花基石和路沿石要更换为花岗岩,就不再强行更换。光这一项,后续报道称可以节省材料费用5000万元。

而在上海,我无法想象可能有人敢公开质疑世博工程是“铺张浪费、劳民伤财”。即使有人敢这么说,也不可能会有上海任何媒体报道,而敢到公开场合像广州“口罩男”那样散发这类传单的人,至少我可以肯定,他不会受到类似广州官方给予的礼遇。世博工程是否也可以向亚运提出的“节俭办亚运”学习呢?1935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的主场馆是当时兴建的会展中心,而23年之后的1958年,世博会再次在布鲁塞尔举行,比利时人并没有另起炉灶,只是在旧有场馆的屋顶上覆盖了一层新材料,使得它们看上去就像新建的。直到今天,这座已经75岁的老建筑,仍是欧洲最大的展览会场地之一。比如每年1月的欧洲汽车展,就是在布鲁塞尔会展中心举办。

与我们相比,比利时人就显得太寒酸了。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上海世博会预计投资4000亿元,堪称“史上最贵的世博会”,对此,上海官方在今年3月7日回应,表示“不知道4000亿是一个什么概念”,上海世博会通过审批的建设投入预计为180亿元,营运投入为106亿元,这两部分费用共计286亿元,在上海世博会后由审计单位审计,再向社会公布。其实,4000亿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周汉民主动透露给媒体的。在2004年5月31日举行的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中国馆推介说明会上,周汉民称:“上海世博会财政预算方案目前已经初步确定,总预算高达3000亿至40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一将通过资本市场来募集。”周汉民介绍,“世博会原先的财政预算只覆盖了世博会园区内部分的5.28平方公里,总投资额仅30亿美元。”而新预算方案则分为园区内和园区外两部分。新增款项主要用于因增加范围而加大的基础建设投入,其中包括浦东机场扩建工程、

有轨道交通等项目。这一消息,国内多家媒体有报道,如2004年6月2日《新京报》(记者赵谨)、6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朱菲娜)、6月8日《信息时报》(记者邓志斌)。当然,园区内场馆的直接建设费用和园区外的基础建设投入有所区别,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在财政投入上通过法定程序,并及时、公开、透明地向社会公布,才能消除公众的疑虑。

而在今年2月初的广东省人代会上,专设记者会回答第16届亚运会的筹备情况。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表示,第16届亚运会组委会在成立之初,就专门成立了广州亚组委监督委员会,成员包括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别的专家,监督亚运经费的使用。亚运场馆压减后,实际用了约80亿,其中社会资金占20亿左右。亚运在筹备过程中的经费,也一直有跟踪审计,赛后的审计报告也会公之于众。

两相比较,广州多了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参与经费的监督。这即使是做秀,也是一种顺应民意,公开政务信息的表现。

更让人吃惊的是,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还公开质疑亚运整治工程背后存在官商勾结:“我现在拿着昨天的建筑企业诚信综合排名表,发现前100名的企业没几家是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多数是500或600名排名的企业在做人居整治工程。香港要有良好记录的企业才能承接政府工程,现在承接亚运整治工程的都是几百名后的企业。”而在上海的媒体,我们完全看不到这样的言论,更不要说官员向媒体公开说出这样的言论。

去年,深圳市民吴君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广州市政府提出公开公共预算的申请,结果广州市在政府网站公布了114个部门的预算,此后经过众多网友的研究,发现了很多问题,广州的媒体纷纷要求政府部门做出相关解释。虽然此后政府部门的解释多有牵强,但这种公开的姿态还是值得赞赏的。而上海市政府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开预算。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有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

预算被明确规定为主动公开的信息。

梁启超百年前的憧憬何时实现？

雷颐先生写过一篇《百年前梁启超憧憬的上海“世博会”》(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22日历史评论版)，介绍梁启超在1902年创作了专谈中国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其中竟然预言了“上海世博会”。小说想像1962年各国政要齐集南京，庆祝中国维新50周年，一时“好不匆忙，好不热闹”：

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是谓大同)。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眉批：专为请求宗教学问而来者已不下数万人，余者正不知凡几)。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阔哉阔哉)这也不能尽表。

也就是说，梁启超憧憬的上海“世博会”，不仅展示各种产品、各种商务活动，而且是“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是全球各种知识、观念、宗教、思想碰撞、交流的公共空间。而从这点要求看来，世博会与梁启超还有不小的差距。梁启超在1902年时的设想，到了108年后的2010年，还是没能实现。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曾将世界公园等3个公园辟为游行示威区，广州亚运会也遵循这一惯例，在亚运城划一块地方供游行示威。这种保护公民表达自由的措施，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中国的开放。更值得关注的是，广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亚运安保办副主任安要贞提到游行示威区时，表示在遵守我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愿意去的就去”。这似乎暗示，将放宽对游行示威申请的审批。是否真的如此，当然要到11月的亚运会才能揭晓。

而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则是宣布没有考虑过设立示威区，原因是世博会不涉及政治。可是，奥运会也同样不涉及政治，而且中国政府一向明确反对把体育政治化，但为什么要设立游行示威

区？这是为了逐渐和国际接轨，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开放姿态和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让公众的负面情绪有个出口，才能避免形成周瑞金先生所忧虑的“民情堰塞湖”，即“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周瑞金：《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载《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6期)要实现这一目标，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我觉得，虽然上海的经济总量非常巨大，但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程度而言，上海和广州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全面表扬政府的舆论环境，会让上海失去一个城市应有的活力。

(作者系广州媒体人)

(责任编辑 李晨)



2010年第5期目录

书屋讲坛	我不愿给拖进“三十年代口号之争”里面	
	——对巴金一封信的阐释	陈漱渝
	怎一句“人性卑微”了得！	雷池月
灯下随笔	市场巨无霸挑战政治巨无霸	任剑涛
	历史上的驻京办	王永华
	京师政治生活的后花园	
	——重读天津的历史地位	顾士
书屋品茗	格融清品 一脉文心	
	——朱玖莹先生和他的几件书画藏品	朱尚同 刘鸿业
	由叶圣陶日记所想到的	叶永和 蒋燕燕
	《傅斯年全集》书信编年考证	陈鹤
	性格的叙写	
	——读《青泥莲花》印象	鲁之洛
说长论短	关于武则天石淙宴饮诗会若干问题的辨正	陈福季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另类	柳士同
	“杂碎”随笔	韩羽
	有情则吟(代序)	张国骥
人物春秋	奇迹人天岂互从	蔡蓬溪
	叶紫：革命图景中的个人灵魂	熊权
	索尔仁尼琴的罗曼史	彭华译
前言后语	《范源廉集》前言	欧阳哲生
	《艾治平解读名词曲》跋	艾治平
思史佚篇	文人“追尾”究可哀	
	——读《周扬传》随想	杨学武
	沈括的劣迹及其他	刘法绥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苏东国家领导人更替的教训

• 张利华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苏联共产党自行解散,东欧各国共产党下台、改名、分裂。出现如此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少学者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方面分析了原因。然而,笔者认为,有一个原因倒是值得重视的。这就是,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前,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领袖出现了严重问题,他们当中,有的个人独裁,有的斗志消退,有的蜕化变质,有的脱离群众。党领袖的严重问题直接影响了党的威望,使党逐渐丧失了民心。

为什么苏联、东欧国家执政党领袖出现了严重问题?关键在于这些国家执政党领袖更换和权力交接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前苏联、东欧国家执政党领袖更替过程及权力转换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党内激烈斗争

1924年1月列宁逝世,斯大林担任俄共(布)中央总书记。当时,总书记的权力并不大,仅限于主管党务,国家决策和管理权掌握在人民委员会手中。1925年,斯大林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挫败了掌握军事大权的托洛茨基,解除了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次年,斯大林联合布哈林打败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新反对派”。1927年,斯大林又与布哈林等人联手打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联合反对派——“托季联盟”。紧接着,斯大林同布哈林发生了思想分歧,1929年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布哈林集团》的决议,取消布哈林政治局委员资格(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经过四场激烈的党内斗争,斯大林打败了所有的反对派,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

导人。1941年,斯大林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赫鲁晓夫夺取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也经历了激烈的党内斗争。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联合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与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进行了明争暗斗,1955年2月,马林科夫被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1957年,“马林科夫反党集团”被粉碎。次年,赫鲁晓夫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将党政最高领导职务集为一身。

2. “宫廷政变”

赫鲁晓夫就是在党内高层密谋策划的“宫廷政变”中下台的。1964年,苏共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与中央主席团委员波德戈尔内、柯西金、苏斯洛夫、谢列平以及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等人利用众多党政领导干部对赫鲁晓夫“重大失误”的不满情绪,趁赫鲁晓夫外出之机秘密活动,做通了大多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工作,并起用克格勃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是年10月中旬,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召集苏共中央主席团紧急会议,赫鲁晓夫从度假地匆匆回到首都,一下飞机就被克格勃人员带到会场,苏斯洛夫等人在会上发动“突然袭击”,他们发表长篇讲话,历数赫鲁晓夫的种种错误并加以严厉批判,逼迫赫鲁晓夫立即辞去党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等一切职务。经过此番突然袭击和激烈较量,赫鲁晓夫败下阵来,被迫辞职下台(谢尔盖·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49页)。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进入了勃列日涅夫时代。

3.中央主席团暗箱操作

勃列日涅夫之后的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国家执政党普遍采用了中央主席团秘密酝酿党领袖候选人,提交中央全会表决通过的方式更换党的最高领导人。1982年11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掌握党的意识形态、人事权力和克格勃大权的安德罗波夫占了上风,经中央主席团秘密酝酿,提名安德罗波夫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在中央全会通过。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戈尔巴乔夫与罗曼诺夫展开了争夺最高权力的角逐,在权力斗争相持不下的局面下,中央主席团暗箱操作,推出年老体弱的契尔年科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在临时中央委员会通过,戈尔巴乔夫任第二书记。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戈尔巴乔夫凭借八面玲珑的政治手腕获得了中央主席团的提名,继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若列斯·梅德维杰夫:《戈尔巴乔夫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

党内高层关键人物操纵党领袖更换的事例在阿尔巴尼亚也发生过。1985年4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恩维尔·霍查去世,经党中央政治局秘密酝酿,提名阿利雅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在党的特别中央全会通过。在此过程中,掌管党中央组织部门大权的霍查夫人奈吉米耶暗中操作,她对阿利雅继任党中央第一书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参见《阿尔巴尼亚前领袖霍查的亲密战友谢胡自杀之谜》,《扬子晚报》2004年12月13日)。在党中央主席团或政治局秘密酝酿党领袖候选人的过程中,党内高层权力斗争错综复杂,利益交换和密谋策划充斥其间,严重影响了党的肌体的健康。

4.苏共领导人把关

这种情况发生在东欧国家。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格罗取代拉科西担任匈牙利执政党第一书记,卡达尔取代格罗担任匈牙利执政党第一书记,都是在苏共领导人授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廖盖隆、梁初鸿等主编:《社会主义百科要览》,第2276页)。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事件”爆发后,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遭到赫鲁晓夫的质疑,后由波兰党领导人与赫鲁晓夫反复磋商,经赫鲁晓夫同意后,哥穆尔卡才得以继续任职(同上书,第2049-2050页)。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布拉格之春”事件,8月20日,以苏联为首的华约条约国家部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将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和其他捷共领导人挟持到莫斯科。在苏共领导人的胁迫下,1969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解除了杜布切克第一书记职务,任命胡萨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同上书,第2107-2108页、2114页、2116页)。

苏联及东欧国家执政党领袖的更换和权力转换之所以出现严重问题,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党都没有采用党内民主竞选的机制和程序选举党的最高领导人,其中央委员会对党领袖的选举流于形式。这样做,使党领袖不受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制约,不受党的监察机关的监督,更不受普通党员的约束,党的领袖一代不如一代。而由这种体制确立的干部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使党的干部“眼睛只向上看”,官僚习气盛行,严重脱离群众。

没有经过党内民主竞选而产生的党领袖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行统治,其权力日益膨胀。有的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有的实行个人独裁,有的大搞个人崇拜,有的蜕化变质。如此脱离群众的党最终被人民所抛弃。惨痛的教训告诉人们,执政党实行党内民主多么重要!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公 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秋瑾案与林昭案的启示

• 刘凤梧

鉴湖女侠秋瑾于1907年与徐锡麟等组织光复军,密谋在安徽、浙江等地起义,反抗满清统治。不料被奸人胡道南出卖,绍兴知府贵福电请浙江巡抚张曾扬同意,即于1907年7月14日(一说13日)派山阴县令李钟岳率兵包围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

李钟岳耕读传家,为官深得民心,他不甘心做清廷的忠实鹰犬,面对捕杀革命者的苦差,也曾多次婉言拒绝;但满族出身的贵福执意不从,他只得昧着良心执行命令。逮捕现场,为防意外,他曾多次向士兵大声疾呼“但加逮捕,弗许伤害”。秋瑾被押至山阴狱中,贵福立即命李钟岳连夜严刑拷问。但李钟岳不肯刑讯逼供,只是拿出纸笔让秋瑾自己书写供词,这才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千古绝唱。贵福急于结案,7月15日,便匆匆忙忙与张曾扬往复电报商议,最后张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贵福如获至宝,立即命令李钟岳执行。李钟岳正义凛然地反问:“供证两无,安能杀人?”因此“竭力抗拒,几至冲突”。但是上命难违,拖至子夜时分,他只得去见秋瑾,告之:“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谅之也。”说完,他“泪随声堕”。李钟岳仍尽自己的能力所及,答应秋瑾提出的“不要梟首,不要剥去衣服”,使之最后保存了一点点做人的尊严。

李钟岳此举当然大大地触怒了贵福等人,没过多少天,他便被撤职了。离开山阴前夕,他愤怒地将大堂所陈列的天平架劈毁,并掷地有声地大呼:“若借此想见好上台,便是禽兽!”他暂寓杭州,良知和正义每天煎熬着心灵,经常反复念叨“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渐渐地,他产生了以死殉道的信念。几次自杀均被人救下,不幸最终还是自缢于屋旁,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公平地说,李钟岳对于秋瑾之死,是没有多大的责任的。他对“禽兽”们的野蛮法律无可奈何,



秋瑾

林昭

但展示了封建时代一个知识分子的美好人性。所以,《新浙江潮》主笔王卓夫说:“李公为专制时代良吏,既因秋案如是,乃附祀秋祠,以光泉下,该社均表同情。”

秋瑾遇难之后,《申报》、《文汇报》、《时报》等各大报纸纷纷斥言:“绍府蒙上,浙抚欺君,秋瑾无供无证,处以极刑,无法可据。彼所根据者,是彼心腹中野蛮之法律。”在舆论压力下,贵福、张曾扬在原地呆不下去了,贵福谋调浙江衢州未果,转而请调安徽又被拒绝,只好改名换姓再设法钻营出路,张曾扬欲调往江苏,也遭到当地的强烈反对,不久即郁闷而死。

我们应该特别指出,因秋瑾被杀而引发的李钟岳的自杀、贵福的隐匿、张曾扬的郁死,都是发生在满清王朝尚未垮台的时候,专横昏聩的慈禧太后还握有绝对的权力。是舆论,是民心的向背,对上述三人形成了强大的心灵拷问;三人末路有所不同,也折射出他们人性有善恶之分、美丑之别。

林昭,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她1954年以江苏省高考第一名被录取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很快便以“才女”之声震全校,曾任北大学生综合性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

1957年,一个漆黑的夜晚,“左派”们集中火力反击“右派”,前呼后应,声嘶力竭。林昭一反往日的文雅温柔,奋力跳上一张餐桌,愤怒地反驳:“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面对“你是谁”的喝问,她朗朗地答道:“我是林昭……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

从此以后,林昭便踏上了万劫不复之路,被划“右派”,劳动教养,判刑二十年,直至被秘密处决。但即使在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为她作出的“平反裁决”中,都没指出她到底是以何罪名罪状被处死!连个“莫须有”也没有!

在狱中,林昭的双手曾被两副手铐交叉背铐达半年之久,就连女人的生理期来了,也毫不宽贷。管教人员还唆使同牢的女流氓、娼妓们撕、打、掐、踢、咬、抓林昭。林昭常常被折磨得口鼻流血,脸被抓破,遍体疼痛,衣服裤子也都被撕破。甚至有的狱警还想强奸她,迫使她不得不每天把上下衣服用针线缝起来,大小便时拆开,便后再缝上。

真正令林昭走上死亡之路的,恐怕还是她在监狱中割破血管,用发卡沾着写在衣服、被单、墙壁上的几十万字的诗文。

她写道,“1957年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分子界和青年群之血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她“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暴政奴才的地步”。

她对于自由的理解,对奴役制度的思考也达到通常难以企及的高度: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样不得自由。她说: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不愿做奴隶的同时,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但也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役制度。

在万马齐喑的年代,她的呐喊使我们这个民族于天地之间站立的时候,减少了一点儿愧色。

直至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林昭的片

段诗文,这还是一个有良知的狱警,冒着杀身大祸从狱中为她偷送出来的。而林昭用绝食等激烈手段,强行迫使狱方所保留下来的全部原始审讯记录,据说有四大箱,同被搜缴的其他遗著一起档案封存,声称五十年以后才能解密。

她这样一个思想的先驱,行动的巨人,当然不能见容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她自己也知道“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会说到今天。”

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押赴上海龙华机场,口中塞着橡皮塞子,防止她喊口号,颈部绑着塑料绳子,扣紧喉管防止她发声。在机场跑道上,执行人员向她腰上猛踢一脚,跪地之后对准她开了一枪。她倒下后又慢慢爬起,他们又向她开了两枪。看她倒地不再动弹,便将她拖入一辆吉普车飞驰而去。事后,有关人员还找到林昭之母,让她上缴子弹费。林母听后,当即昏厥倒地。

秋瑾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因政治而被杀害的第一位女性,林昭能不能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因“思想罪”而被杀害的第一位女性呢?杀害秋瑾的直接责任人是张曾扬、贵福、李钟岳,将林昭划为“右派”、判处徒刑的直接责任是谁呢,杀害林昭的直接责任人又是谁呢?迄今为止,任何媒体上都未曾明确透露,也从未听说任何参与整治林昭的人站出来公开认错道歉。这些人的思想境界同李钟岳相比,简直有天地之别,即使同张曾扬相比也差了许多。我们是将这一切罪行简单地算在“运动”、林彪、“四人帮”头上,便皆大欢喜庆祝胜利呢,还是以犹太人百折不挠地追捕屠犹纳粹凶犯的精神追究下去呢?

秋瑾被害以后,当时的舆论界并没有简单地把杀害秋瑾的罪行都算在慈禧太后头上完事大吉,而是对张曾扬、贵福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口诛笔伐,将二人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共和的旗帜终于飘扬在神州大地。以色列人也没有简单地把所有的屠犹罪行都算在希特勒头上便偃旗息鼓,而是对所有证据确凿的纳粹凶犯一个也不放过,哪怕只是一个下级官兵也穷追不舍。所以,以色列人空前团结,国虽小而势日强,许多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与其为敌也不占上风。

我们要追究林案的直接责任人,并不是肆意报复。在那个是非混淆的年代,作恶者也不过是

我的父亲李汉俊

• 李声馥

我的父亲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父亲 1890 年出生于湖北潜江，他少年时代就胸怀大志，十四岁时得到伯父的好友吴禄贞的赏识和帮助（吴是兴中会员，为湖北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得以随着我的伯父李书城到日本留学（李书城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农业部部长）。伯父学的是军事，父亲学的是工科，但是父亲却十分喜欢阅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对正在西方和日本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十分留意，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父亲在日本从中学读到大学，1918 年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同年回国。我在这一年出生，所以父亲为我取小名“碧生”，寓意为我出生在他毕业之年。

工科出身的父亲学识渊博，除精通日语外，还懂得英文、法文、德文。1921 年春经他介绍参加共产党的沈雁冰同志（即著名作家茅盾）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表示“现在年青的一代，乃至中年的一代，大概不知道李汉俊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在 1921 至 1922 年，同他有较多的工作关系，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他是湖北人，中学时代就在日本，直至大学毕业，学的是工科。日文

很好，自不待言，甚至日本人也很敬佩。又通英、德、法三国文字。德文说得极流利，此与他学工科有关，法文英文也能读能译。他如果不从事革命，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然而，父亲一回国，就投身于革命。他在上海积极参加劳工运动，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那时候他写了很多文章，大部分在他参与主编的《星期评论》上发表，很快成为上海社会主义者群体中的一位著名人物。

1919 年，父亲认识了到上海寻找救国之路的董必武，积极地向这位湖北老乡宣传马克思主义。多年以后，董必武在回忆中谈到：“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董必武同志后来也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党的创始人。他一直保持着同我父亲的友谊。我父亲被害后，遗属也得到董必武的关心。多年以后，董必武还对外国记者说，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1920 年，父亲和陈独秀来往密切，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并成为负责人。他们除了办刊物宣传马

主谋们手中一颗任意摆布的棋子。我们应该宽容，但宽容的前提必须是作恶者认罪，不然他们在逃脱之余还会暗中窃笑宽容者的软弱无能。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勇于忏悔的民族，更少有勇于负责的硬汉，我们不要指望作恶者有一天会良心发现，做出“杀人者，打虎英雄武松也”的壮举，而应该锲而不舍地追究下去，直到全部真相大白于天下！

我们对林昭这样的民主英雄宣扬得很不够，对残害他们的主犯帮凶追究得更不够。不要天真地以为，秋瑾、林昭的命运离我们普通人很远。正如德国神父马丁所说：“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

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我们更不要天真地认为，“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虐待人民的各种运动一去不复返了，只要不能确立真正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只要不能将一切迫害善良正直人们的主犯与帮凶绳之以法、警示后人，遇有适当时机，秋瑾、林昭的悲剧重演的机率就会很高。

（责任编辑 李 晨）



李汉俊和他翻译的《资本论》

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外,还负责与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联络的工作。1920年8月,父亲和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周刊——《劳动界》。父亲虽然没有做过工,但是他深切同情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为工人阶级的觉醒而呐喊。作为《劳动界》的主编,他在发刊辞中写道:“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他还指出工人之所以穷的原因,号召他们起来反抗。

1920年冬,陈独秀到广州,父亲代理党的临时中央书记。他夜以继日地忙碌,除了负责党务工作,还要编辑《新青年》等刊物。由于这些工作全是没有报酬的,他为了筹措党的活动经费并养家糊口,还不得不经常熬夜,拼命地写稿。他和李达负责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商讨大会召开事宜。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我父亲的寓所召开了(房子的主人是我伯父李书城,当时伯父到外地去了,伯父和我父亲的兄弟感情非常好,他积极支持我父亲从事的革命工作)。

解放后,继母陈静珠曾告诉我父亲生前对她讲过的一件事:“一大”开会法租界的侦探发现了,其他代表们立即转移,而我父亲因是房子的主人就留了下来。当法租界巡捕搜查时,父亲发现会上起草的党的文件正压在桌上玻璃板下,他

一面用法语与巡捕们交谈,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一面机智地用身体挡住桌子。这样文件才没有被发现,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的发生。

1922年,我父亲回到武汉,在武昌师大等校教书。他在讲授社会学等课程的时候,鼓励学生们理论联系实际,去亲身参加劳工运动。我的继母曾告诉我儿子甘子久说,你外公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来听他讲课的人很多,教室里坐不下,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他从没有空闲的时候,除了工作以外就喜欢读书看报,看得十分认真,所以他很有学问。你以后要像你外公那样,多读书,多看报,要做大事情。

我父亲一心扑在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上,很少顾及自己和小家。在我印象中,父亲平时穿着很朴素,烟瘾很大。初次见到他的人都说父亲不像个大学教授,像个乡下佬。他自己曾对别人说过,穿着简朴一些方便与工人联系。父亲与继母结婚时,几乎一无所有,连婚礼上穿的西装都是从伯父那里借的。当时我们家里的经济不宽裕,但父亲还是尽力资助其他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志。他的学生夏之栩(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副部长)、袁溥之(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教育局副局长)等很多人都曾在我家学习过、住过,并得到过父亲的帮助。我儿子甘子久曾经问过他外婆:“外公做过那样大的事业,又是大学教授,我们家为什么那么穷呢?”他外婆回答说:他的朋友多,学生多,回到家里,经常有很多人来找他。他常常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家里也经常有好多人吃饭,所以没有什么积蓄。

记得在我小时候,在我们家吃饭的叔叔阿姨比较多,有时候一个桌子坐不下,还要开两桌才行。父亲和大家经常边吃边谈,边说边笑,十分热闹。那个时候我家蒸饭用的是一个大木甑,开饭的时候,厨师把它从锅中端出来放在桌子上。我个子小,盛饭够不着,有位客人想帮我盛饭。但是,父亲不让别人帮我盛饭,他要我搬个小木凳,站在上面自己添饭,并且说:“小孩子要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小要养成不依赖别人的习惯。”这句父母教育孩子极平常的话,在我以后的人生

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父亲还从小培养我不怕苦、守纪律的好品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父亲虽然很忙,但他每天都亲自送我。遇到刮风下雨,我哭着闹着不愿意去,我的继母陈静珠也说:“天气不好,孩子又小,今天就不去了吧。”可是父亲不答应,他说,越是这个时候,越是锻炼孩子的时候,不但要去,还不能迟到。

大革命时代,在父亲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哥哥同去报考湖北省立第三小学,我报的是一年级,哥哥报的是四年级。那天下着毛毛细雨,考完以后,老师在楼上评考卷,学生在操场上等待出榜,身子冻得瑟瑟发抖。当父亲常用的人力车来接我们俩回家时,我很高兴,可是哥哥声簧却在操场上大发牢骚,说:我们学生在操场上挨冻,老师们在楼上享福,太不像话。这件事车夫回去以后告诉了继母。后来父亲知道了,批评继母不该用公车去接孩子,还批评哥哥对老师不尊重。他说:“难道老师可以在雨中把试卷拿在手中评改吗?”哥哥知道自己错了,没有再说什么。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一生无论搞什么工作,都知道不能用公家的东西。

父亲有过两次婚姻,有一子二女。我的生母育有一子一女:我哥哥李声簧(1914年4月16日生)和我(1918年4月5日生)。我生母去世以后,我由祖母的保姆照顾。1923年,父亲与继母陈静珠结婚,这件事在当时曾经引起不小的哄动。大家认为以父亲的地位、学识完全可以续弦一位名媛淑女、大家闺秀,可是父亲却和一位没有多少文化的葛店姑娘陈静珠结婚。当时很多人不明缘由,父亲牺牲很多年以后,还有父亲当年的故旧和学生和我谈起这个问题。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当时有两个考虑,一是父亲喜欢简朴,他认为有一位勤劳、朴实的妇女持家,使他能有更多的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他的事业;二是父亲看到一儿一女都还小,这么多年来跟着他奔波南北,吃了不少苦,希望有一个贤良的后母能够很好地照顾他们。后来事实证明,继母陈静珠对我父亲忠贞不渝,对我们兄妹视若亲生。解放后,她曾经对我的儿子甘子久说:“跟你外公一起死的有好多人的,他们的妻子都改嫁了,可我从

来没有动摇过,因为你的外公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干过大事的人,有学识的人,我只想把他的儿女培养成人,这样才对得起你的外公。”从继母这番质朴的话语里,可以看出父亲的人格魅力。

1927年11月,国民党西征军进抵武汉。桂军正副军长胡宗铎、陶钧执掌武汉卫戍司令部,在武汉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由于杀人如麻,所以武汉人叫胡宗铎为“胡屠户”。12月17日下午,胡宗铎、陶钧派兵同日本租界巡捕一起,包围了正在汉口日本租界躲避的父亲和詹大悲的住所。父亲被捕的时候正在和詹大悲下棋,他当时脚下穿的是拖鞋,继母叫他换了鞋子再走,他说“不用换,我过会儿就回来的。”结果他们当天晚上就在现在的汉口单洞门附近被枪毙。第二天武汉卫戍司令部贴出布告说他们是“湖北共产党首领……执行枪决”。

父亲遇难时,我哥哥十四岁,我还不到十岁,我妹妹李声鹜还在母腹之中。当时,胡、陶也把我伯父李书城关押起来,但他们还不敢加害于伯父。伯父被释放出来以后,通过关系将暴尸街头多日的父亲遗骸收殓起来,停放在蛇山的一个庙宇内(现蛇山“抱冰堂”旁)。几年以后,我父亲的遗骸才在伯父的主持下得以安葬在武昌伏虎山上。墓地的正前方是伏虎山脚下的庙宇“古卓刀泉寺”,这个地点是伯父亲自选定的(这个山上先后埋葬着众多的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父亲牺牲以后,我的哥哥声簧从此投身革命,直到武汉解放前夕,他受党组织的委派秘密潜入武汉搞地下工作,我们兄妹才得以重聚。我妹妹声鹜和我也都先后参加了父亲参与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兄妹三人能够在有父亲鲜血染红的党旗下继续革命,我感到非常自豪。

80年过去了,我已九十岁了,缅怀我父亲,想起他当年的革命经历,我感慨万分。我想,如果1927年父亲能够躲过反动派的屠刀,他一定会像茅盾同志说的那样,“对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儿时对父亲的记忆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他的革命精神、他的为人永远值得后代人学习。

(此文是李汉俊烈士的外孙甘子久根据母亲生前发表的两篇文章综合整理而成,以之纪念李汉俊诞生120周年。)(责任编辑 李晨)

林韦这个人不会长寿

• 陈泊微



林 韦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社在天桥西边盖起了一栋四层的宿舍楼，当时的门牌是华仁路六号，包括我家在内约有几十户家庭住进了这个宿舍。不久，我们就常听到悠扬的钢琴声从三单元楼里传了出来。听人说，有一位老干部住在三单元二楼。他家有一架旧钢琴，是一个有音乐爱好的家庭。这家的主人是一位来自老太行的老干部，名叫林韦，是报社编委会八大编委之一。有个星期日，有一个中年人站在三单元门口拉起了手风琴，这人中等身材，有副红润的大脸盘，一脸天真浑厚的表情，这个老干部就是林韦。他拉手风琴的神情很投入，好像整个精神都沉浸在琴声里，一副陶然欲醉的样子。当时听到他拉手风琴的声音，我心里就想，这个编委颇不寻常，不但有光荣的根据地斗争历史，工作水平和能力一定也很强，而且又有这样高雅的音乐兴趣。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油然而生。一位和林韦早就很熟悉的老编辑黄植听见琴声时曾问过他：“林韦同志，我们不懂音乐，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乐曲才算好音乐？”林韦回答说：“凡是你听得好听的乐曲，就是好音乐。”

时间过得很快，说话就到了1957年。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政治激荡的年头。一阵鸣放之后，紧接着就是反击“右派”的猛烈斗争。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出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号角。真没想到，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不是别人，竟然是我们宿舍那位拉手风琴的林韦！后来得知，林韦是奉胡乔木之命执笔的。当时他是负责报道政治运动的新闻部主任，胡乔木素来欣赏林韦简洁爽利的文笔。

1957年下半年，正当“反右斗争”高潮来临的时候，我们农村部的李庄主任奉调准备去莫斯科任职，已经不管农村部的工作了。没有多久，社

里派来了一位新主任，他就是林韦。我在过去写过的两篇文章中曾经说过，1957年中，我曾在胡风问题上说过“错话”，被人抓住，受了批判，但是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也未受到党籍处分，就是因为两位有力的领导人保护了我，一位是农村部前主任李庄，另一位就是后来的部主任林韦。不但是我，农村部里其他有过“错误”言论的人，也都安全地过了“反右斗争”这一关。所以我说过，整个农村部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一个“安全岛”。

在“文革”结束后，林韦的夫人李克林大姐曾向人透露，林韦在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中为了保护部内同志，曾经受过一些压力，因为当年社内曾有人向林韦提出陈某等人的问题（意思是要把陈某等人端出来严加批判，甚至考虑给“定性”），这种意见，都被林韦挡回去了。林韦向人们解释说：“部里年轻干部一时糊涂，说了错话，不属于向党进攻的问题。”在那种激烈的政治运动中，敢于这样尽力保护本部门的干部，确实是要承受几分政治风险的。

不久以前，当年农村部的老同事何燕凌还向我说起一件事。在1957年那些紧张斗争的日子里，林韦主任总是煞费苦心地保护部下，比如上面要求各部对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排队”的时候，林韦就说：“我们部里的人都是左派，没有右派。”

大约是1958年夏天，报社“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以后，进入了“整改”阶段，农村部开过两次会，主要对我的“错误”问题进行批评和帮助。林韦曾在会上针对我的问题作了发言，尽管对我批评的分量很重，但是说来说去都是思想认识的问题。这样，我就算是最后平安地过了运动关。这以后，在工作上我仍然被重用，林韦主任照样让我撰写评论和社论。

转过年,也就是1959年初,报社有一批干部下放到地方劳动锻炼。我参加了去辽宁的下放队,在岫岩县山沟里劳动了将近一年。同年冬季,劳动锻炼结束,我们回到报社。这时报社里一场激烈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已经过去了,人事上有些变动,我们农村部已经换了部主任。这时我才知道,全社只定了一个“戴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个人竟然是我们农村部的主任林韦!我不禁大吃一惊!有人告诉我说,林韦“戴帽”后被降了三级,已经下放到甘肃去了。三年后,林韦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得到了平反,听说他已经被调到国家建设委员会去了。又过去了几年,我搬出了永安路宿舍,紧接着就是十年“文革”。所以,在十几年间,我一直没能再见到林韦。“文革”结束以后,听说林韦的工作又有变动,他被调到社会科学院去了。

1983年春季,我结束了驻日记者工作回到了报社,突然得知林韦患上了脑血栓,已经坐上了轮椅。有一次,我到报社南区宿舍去看望林韦、李克林夫妇,没想到林韦已经卧床不起了。我刚走进林韦的房间,李克林大姐就喊道:“老林,陈泊微来看你啦!”这时候,林韦立刻伸出一只大手握住我的手不放,激动得泪流满面。他依然神志清晰,但已不能说话了!当时我也几乎哭出来。一年后的春节期间,我到林家拜年,卧在床上的林韦,听见问候声,只能睁开眼睛看了看我,他已经不能和我握手了!

1990年4月24日,数年卧床不起、成了植物人的林韦,离开了人间,享年只有75岁。

林韦是一位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老干部。他处理稿件效率很高,给我的感觉是,他文笔犀利,文理清晰流畅,时露警语锋芒。他曾做过理论部主任,平时有理论思考的兴趣,但谈吐很朴实,毫无教条气味。“文革”结束后,他被调到社会科学院成了这个学术文化部门的一位重要成员,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总编,本来可以大展身手,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孰料身染重病,天不予寿,过早地结束了生命,令人痛惜不已。

林韦的人品,格外令人敬重。如果让我用几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仁慈、赤诚、

浑厚;他是一个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老干部。他为人刚正不阿,诚实敢言。也可以说,他是一个不计个人安危利害的纯正的性情中人。他一贯反对说假话,就像眼睛里不能进沙粒一样,他绝对不能容忍把错误说成正确;当一个普遍性的错误酿成巨大的社会灾难的时候,他就会寝食不安,要大声疾呼,难免发些议论。1959年他到安徽农村采访,看到到处闹饥荒和饿死人的事实,就向报社领导写了一封信,痛陈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主要罪证。他平时对“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发些议论,都被当做反“三面红旗”的材料。尤其是有人揭露他说过这样一句“尖端”的话:“没想到革命三十年,竟出了一个饥饿的中国,这是怎么回事儿?”有人还揭发说,他诬蔑大办人民公社和实行供给制,说出了“历代皇帝也没有这么愚蠢,敢包六亿人的生活”这样的话。他每天在这种声讨“右倾机会主义”声音的包围中精神异常痛苦,夜不能眠,以致患上了冠心病。据李克林回忆说,林韦从甘肃回来以后,仍然睡不着觉,常在夜间把她叫醒,说道:“饿死人还不让说,难道我们许多同志牺牲流血就为创造这样一个局面吗?难道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样子吗?”他还说:“彭老总究竟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那么多老同志都不说真话?党内生活肯定有问题。”他在病重卧床期间,让一位青年把《彭德怀自述》读给他听,他听着听着流泪不止,泣不成声。夫人李克林赶快阻止说:“不要再念下去了。”

林韦去世后,我去看望李克林大姐。谈起林



林韦夫妇与子女留影(1969-8-30)

韦的为人,克林大姐说了这么一段话:“林韦这个人不会装扮,是个直肠子,怎么想就怎么说,那句关于‘饥饿中国’的话就是这么冒出来的。所以林韦这个人不会长寿,他太天真,性子激烈。政治运动这么多,他这样的人能逃得了吗?”

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高潮期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平日的好朋友揭发了林韦许多条言论。后来,林韦对李克林说,他不恨当时给他“定性”的人,也不怨他的朋友,因为是在运动中,只要是不歪曲事实,都能理解。他还说:“新华社定了七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人民日报社没有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吴冷西也交不了账。”从这里可以看出,林韦为人的宽厚和胸怀的开阔。他在病重期间,还念念不忘起草“六·八”社论那件事,他对老伴说:“我这一辈子从未做过对不起人的事,只有起草那篇社论,使我永远感到愧疚!”李克林对他说:“你那是奉命执笔,社论的话都是胡乔木口授的,那里面只用了你的一句话。”

林韦有音乐的天赋,读过太原师范,当过音乐教师。1937年到延安后,他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刊主编,当时音乐家郑律成也在抗大工作,两人曾合作创作了数首抗日歌曲。数年前,有位朋友把从郑律成作曲集中发现的三首林韦作词的抗日歌曲的复印件寄给了我,这就是:《黎明曲》、《今日九一八》和《十月革命进行曲》。特别是《黎明曲》,曾经在各抗日根据地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林韦逝世后,中国青年报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一支永远难忘的歌——悼念林韦同志》(《中国青年报》1990年8月22日3版)。作者林琼写道:“这支歌当时曾响遍了延安,很快传遍了大西北,传到了华东地区。当时我们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一群革命青年,几乎天天都唱这首歌,因为那充满战斗激情的歌词和曲调,是那样强烈地反映了时代精神!”

林韦有一个高素质的家庭。50年代中期,他的夫人李克林曾任我们农村部的副主任,是人民日报社内数一数二的农村问题专家。他们夫妇的为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一贯反对说假话,反对颠倒黑白和混淆是非。夫妻之间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真是天生的一对!李克林的特点是为公道、正直、豁达,敢说真话。有许多李克

林式的“名言”常为同事们所称道,例如她说:“有调查研究的人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的人倒有发言权!”类似针对现实弊病一针见血的话就不再列举了。李克林大姐在生活上极为俭朴,把省下的钱寄给家乡小学,还给回到农村的老保姆寄去了大笔“退休金”。在报社内部提起李克林大姐有口皆碑,在她的晚年,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李老太”。这位大姐于2003年8月12日逝世,享年86岁。依她生前的遗嘱,遗体捐给医院做科研之用。

林韦与李克林于1938年在太行革命根据地结婚。李克林说:“我在太行六年,生了三个孩子,我的两个大女儿都寄养在老乡家里是农民的奶汁养大的。他们对农民很有感情。”据我所知,林韦的两个女儿都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从事科技工作。他的小女儿李银河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他们的儿子李向南原在一家报社工作,现已退休。

林韦逝世以后,我去看望李克林大姐,发现在林韦生前卧室的墙上挂着一件写在白布上的条幅,上写“怀念林韦,耿耿赤心,可昭日月”几个遒劲的大字,落款是王晶尧,写于1990年5月25日。当时我还不知道“王晶尧”是何许人,过了一段时间,才得知王晶尧原来是林韦、李克林的儿女亲家,是一位在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的老干部。他的夫人就是师大女附中在“文革”中被校内红卫兵打死的副校长卞仲耘。他们的女儿王思是李向南的妻子,也就是林、李的儿媳,她一直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当我了解到他们之间如此这般的亲戚关系,心中波澜起伏,感叹不已。

林韦前辈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他那可昭日月的赤诚忠心,他那不顾一己得失荣辱、坚决捍卫真理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激励着后人向上向善的一种精神力量!

(陈泊微,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25年出生于辽宁省庄河县。早年曾就读于长春大学和辽东新闻学校。1946年4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共。1947年7月至1954年先后在《辽东日报》、《东北日报》担任编辑和记者。自1954年9月起,先后供职于《人民日报》财经组、农村部、国际部、理论部。曾任国际部副主任。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先后任驻东京、驻香港首席记者。1987年底离休。) (责任编辑 李晨)

怀念张遗

● 李洪林

纵横江北扫狼烟 尽瘁八闽四十年。
武夷山高多风雨 沙溪水急藏险滩。
宦海浮沉只一笑 国事兴衰岂等闲。
宏篇未就成遗恨 碧海丹心夜夜悬。

2009年11月,厦门国际机场花枝招展,喜气洋洋,因为这个月里,机场迎来了它建场以来第一千万名旅客。

当巨大的波音客机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徐徐滑向停机坪的时候,外地来的旅客大概不会知道这个机场的建设经历过多少艰辛。他们更不会知道,在厦门北面的天马山上,安息着一位新四军的老战士。他后半生踏遍了福建的山山水水,晚年更把全部精力献给了改革开放事业,这个机场和厦门航空公司,就是他一手创建的。这位老战士最后是被入用暗箭射下马来,带着遗恨长眠在这座山上的。

给特区插上翅膀

198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创办厦门经济特区。但是当时厦门连一个民航机场都没有,这个特区怎么能“特”的起来。那时“计划经济”体制还控制着一切。要建国际机场,首先就要“立项”(纳入国家计划),这一关就通不过。国家计委的理由是:厦门客流很少,能有多少人坐飞机?

国家不给钱,省里又拿不出钱,机场还是高速度高质量地建成了。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长眠在天马山上

的新四军老战士、福建省原第一副省长张遗。他不光把机场建成了,接着又买飞机,请飞行员,组建了厦门航空公司,还建成了厦门港的深水码头,这就使特区有了符合现代化标准的空中和海上通道,因而为厦门的大发展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前提。在那个“计划统治一切”的时代,一个穷省,居然能跨越雷池,靠自己的力量办成这些大事,真可说是奇迹。除此以外,那时福建还有些重要项目,都是打开大门,引进先进技术和外来资金办成的,张遗借用民间俗话把它叫做“借鸡生蛋”。

艰难的脚步

这些奇迹没有一个是顺顺当当诞生的。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决定在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还给福建派来一个思想解放的新省委书记——项南,但是财政上并没有给福建吃什么偏饭。福建在改革之



1984年秋,张遗(左一)陪同国务委员谷牧(右二)、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右一)视察厦门



1985年,张遗(前中)率团出访,在约旦与彼得拉银行签订合作协议

天奔波,到处生气,晚上又休息不好,就病倒了。不过像这种摩擦,和在他的工作中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相比,只是小菜一碟而已。在引进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给福建创造经济起飞的基础等方面,他几乎时时刻刻都要两面作战:既要克服工作上的困难,又要抵挡政治上的高压。

对外开放的风球

一个典型例子是围绕福日公司展开的持续了几年的一场斗争。

前的30年,因为被当做“解放台湾的前线”,准备打起仗来“破罐破摔”,所以从来没有投资进行大的项目建设,以致工业基础极其单薄。农业方面,又吃了“以粮为纲,一切砍光”的亏,弄得百业凋零。在这样一种物质基础上进行改革,难处自不待说,更难的还是人为的阻力,因为它突破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计划体制,触犯了操控旧体制的长官的权力,所以几乎每走一步都要对付各种非难和压力,抵挡来自前后左右的明枪暗箭,而张遗就处在明枪暗箭的靶心,因为在项南的领导班子中,他是主管对外经济工作的。上面提到的那些奇迹,只是他一小部分业绩。今日福建省的面貌已经远非昔比。“喝水不忘挖井人”,福建老百姓不会忘记老书记项南,也不会忘记老省长张遗怎样为改革开放辛勤奔走,日夜操劳。要问他的工作难到什么程度,只要看看他为建设机场筹措资金而奔波的一个细节,就可略知一二了。

因为在国内找不到钱,他就专程跑到科威特去借。可是到北京去办出国手续的时候,却遭到“有关方面”的阻挠,阻挠的理由是:一个副省长去一个小国借钱,规格太高了,有损国家面子。就为了化解这个矛盾,他整整用了五天时间,跑遍“有关机关”,直弄得舌敝唇焦,才把出国手续办好。当初以为办这么一个手续,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所以从温暖的福建来到寒冷的北京,没带多少衣服。为了省钱,到北京后他又和秘书挤在旅馆的一个单间里。本来就年老体弱,天气又冷,白

这个企业的前身是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小厂,每年生产2万多台黑白电视机,建厂八年,年年亏损。张遗经手把它改造成中日合资福日电视机有限公司。双方股份各占50%,中方只是以原厂的厂房设备作价入股,日方以三条先进的生产线作价入股。结果这个陈旧的小厂,只增加了一百多名工人,仅仅经过半年的时间改造,一下子就变成能够年产20万台彩色电视机和18万台黑白电视机的现代化的大厂,产品质量进入世界先进水平。以前所生产的黑白电视机,无故障工作时间只有1000小时,合营后达1万小时以上,而彩色机则超过2万小时。

然而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却遭到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和有关部门领导的强烈反对,说它是“殖民地性质的厂子”,是“日本工厂的装配线”,是日本人打入中国的“桥头堡”。国家某部委一位副主任,指名道姓要和张遗公开辩论。

张遗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和这些人辩论。大量的工作在等待他。反正事实总会给他们回答的。事实是:福日公司后来成为公认的先进合资企业,在它成立十周年的纪念册上,就有当年反对者给它题的贺词。

1982年胡耀邦到福建视察时,已经知道围绕福日公司的斗争,就对他们说,福日公司是中日经济合作的一个风球,即使吃亏,也要坚持办好。事实上,我们不但没有吃亏,而且大赚特赚。获益的不止这一个厂,还带动了一大批和它配套

的企业。这个厂改造前,连续八年,年年亏损,改造后,从1981年投产到1984年,仅仅三年时间,累计纯利润已经远远超过原来的投资。这还是只算福日公司一家,如果加上那些配套工厂,我们赚得就更多了。当然,福日公司的利润,日本人要分去一半,这是市场经济的常规。如果害怕日本人赚钱,那就不要去引进。也就是说,一切照旧,不但自己也赚不到钱,而且继续年年亏损。这就是那些反对改革开放者的逻辑。其实当时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日方)再赔也是赚,我们再赚也是赔。”碰上这种逻辑,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

明枪暗箭

福建省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是这样在重重阻力中,步履艰难地行进着。但是披荆斩棘走在前面的人,总是要冒最大的风险。“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这句伤心话,不应该成为真理。可惜古往今来的许多事实,却使人不得不对这句话正眼相看。在围绕改革开放的斗争中,项南和张遗都中箭落马了。确切地说,一个中的是明枪,一个中的是暗箭。

公然从政治上对张遗为改革开放所做工作的指责,已经被事实所粉碎,于是改为暗箭,诬陷他“以权谋私”。1984年,“上面”就立案调查,1985年,下令“停职审查”,强迫他离开工作,“交待问题”。然而他并无“问题”可以“交待”,省委也审查不出他有什么“以权谋私”之处,但是“上面”还是揪住不放。他为此几次亲自到北京“上访”,结果,这位副省长和许多“上访”的老百姓一样,都被拒绝接见。谁说中国人不平等?你看,省长和老百姓来北京“上访”所受的待遇,不是一律平等吗?

纵然查不出他有任何“以权谋私”的事实,但是把他射下马来目的已经达到了。“停职”以后就是没完没了的“审查”,然后就不明不白地“光荣离休”了。

艰险的戎马生涯,繁重的经济建设,文革的牛棚囚禁,他都挺过来了。但是暗箭他却没有躲过,中箭落马再加上精心策划的慢性折磨,摧毁了他的健康。

素昧平生,倾盖如故

我以前在北京工作,1984年调到福州,在福建社会科学院做研究工作。张遗是主管对外经济的副省长,我们互不相识。有一天他忽然到宿舍来看望我。我发现他和项南一样,一点架子也没有,谈笑风生,一见如故。此后我们常常深谈,观点不谋而合,很快就成为推心置腹的老友了。我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工作都是外行,在交谈中学到不少知识,特别是这个领域里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竟是如此尖锐,实在使我吃惊。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时,我正在北京,当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建议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点东西。这对改革开放很有意义,也能使他痛苦的心情有所缓解,精神上有个寄托。

张遗虽然弱冠参加革命,戎马倥偬,但学习勤奋,是同侪中文化素养甚高的人士之一。他思路清晰,见解深刻,文笔精炼,叙事说理,均其所长。但几十年间,从无施展文采的机会。一旦赋闲,正好有暇把计划经济的弊端和改革的必要,从容地写出来。所以他见信后马上同意,并且邀我参加。我虽然很愿意和他共事,但是自己手上也有许多工作,脱不开身,所以他只好一个人先干起来了。

直到1991年秋天,我经历一场风暴之后也赋闲在家,终于可以和他合作了。10月他来北京和我商量好,12月我就去厦门,共同开始工作。谁知苍天无眼,11月19日,突发的心脏病夺去了他的生命!我立刻飞到厦门,已经不是和他共同工作,而是作最后的告别了。本文开头的那首七律,就是我在厦门向他告别时写的。

他只活到72岁。以他的身体状况,虽然不算很健康,但属于中常水平,并无恶疾缠身,在现代的医疗条件下,完全可以终其天年。然而在他为之献身的祖国大地上,遭人暗算却找不到说理的地方,悲愤的心情可想而知。虽然他心胸豁达,但这种郁闷是任何人都难以排遣的。这是他后来健康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

宏篇未就成遗憾

面对他的遗稿,我不禁黯然神伤。这里面凝聚了他在福建惨淡经营四十年的心血,怎能让它付诸东流呢?我义不容辞,必须把它整理出来。

经过几年的辛勤工作,他搜集了不少资料,也写出不少篇章。每一个篇章都很简练,条理清楚,说理透彻,深入浅出,只是不曾发挥。1991年10月他回厦门后,已经编出两部分,并已写好《自序》。第一部分是他亲身经历的事实,大标题是《艰难的脚步》,讲述他怎样冲破旧体制的阻碍,又怎样中箭落马的。第二部分是他总结出来的理论问题,标题是《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命运》,讲的是他根据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对计划体制的批评和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另外还有许多短篇札记,尚未分类。看来,全书已经大体成型,只等我来和他一起推敲编排最后定稿了。

他已经编好的两部分,条理清楚,叙事明白,立论精当,文辞简练。虽然他自谦“是个提纲”,其实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只要把问题说透就足矣,何必浪费读者的时间呢?他留下的零星札记,都是从各个方面说明旧体制非改不可的。我从中选了一些精彩的,加个大标题《不改行吗?》作为第三部分。另外还有个第四部分,是这本书的附录,标题是《西方眼中的社会主义》,选自美国人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初出版的《大失败》一书。他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有深刻的批评,不过对中国的改革还是较为看好的。

我把这部书稿整理好之后,交给张遗胞兄张肇忱先生带回台湾,由他以编者的名义1992年交香港经济理论出版社出版了。他把此书取名

《觉悟》,副题是《一位计划经济者的反思》。作者如果地下有知,当可稍感欣慰,因为他虽然未曾把话说完,这本书毕竟已经出版;书总是给别人看的,自己虽然不能看到,但是别人能够看到,也就不必再有遗憾了。

这本书充溢着一位忠诚于原来革命理想的老共产党员为改革所倾注的心血,读起来是很感人的。一个在计划体制下面工作了几十年的领导干部,能这样深刻反思这种体制的弊端,坦诚地讲出自己的观点,而且达到这种理论高度,实在难能可贵。而且作者写这部书的时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特别是1989年到1991年,正是对改革进行“治理整顿”的时候。在那种沉重的气氛下,作者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勇敢地讲出真话,不能不令人钦佩。要知道,那时作者已经中箭落马了,他却不顾伤痛,仍旧为改革大声疾呼。这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记得几年前在电视上看到过一幕永生难忘的景象:一位西方新闻记者在中东某个战场采访,他已经中弹倒地,却紧握摄像机拍摄不止,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和他一起采访的另一位记者,同样不顾子弹横飞,奋不顾身摄下了这个场面,才使全世界都亲眼看到,那位令人尊敬的记者是怎样以身殉职的。这是我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震撼人心画面!不知为什么,我整理张遗的遗稿时,在他去世前一个月所写的《自序》里,仿佛又看到了那位记者的形象。不过那位记者是被战场的流弹击中的,而张遗却是被人从背后用暗箭射中的。

沉痛的呼唤

下面我就摘录几句他的《自序》: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我的信念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味着人民都有最自由最幸福的生活。然而世界范围内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却告诉人们:沿着这种轨道去追求自由幸福,实在是缘木求鱼,因此非改不可。”

“我赞成三中全会路线,并倾注了全部心血来贯彻它。”“但是要贯彻这条路线谈何容易!1979年以来,我自己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改革的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下转第63页)



本文作者与张遗(右)

我家的“阶级敌人”

• 张 安

我家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样样俱全，但个个都是冤案。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每当读到被极左势力所伤害的受难者的冤情时，总会联想起我家的冤情来，心里暗暗流泪。旁及我耳闻目睹，许许多多普通受难者的冤情，并将其与大背景大人物联系一起思考，又每每使我难以入眠。说说我家冤情，我倒也不担心把我打成“反革命”了。

先说母亲。母亲丁氏，1912年出生在云南省砚山县一个穷山村的农民家庭中。外公是个自耕农。家有二亩黄土地。由于会切点烟丝卖，跑点小街子生意，温饱还能过去。外婆是个家务勤俭会帮外公做些农活的小脚女人，所以我妈从小也被缠足，也养成了会帮助外婆做家务和做农活的好习惯。母亲嫁给父亲时，父亲和祖父是会做人工面条的手工劳动者。家务活也全由母亲包做了。祖父曾对我说，我曾祖父初逃至砚山时是帮人挑大粪的雇工。由于后来学会了做人工面条，温饱生活也算过得去。所以，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到了1951年全国最后一批土改在大西南边远地区进行时，我母亲竟意想不到地被划为阶级敌人的“地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父亲在1947年就病故了，只留下一间空房子和二亩雷响田。缠足的母亲带着9岁的我和一个4岁一个2岁的弟弟，没法自耕。于是，为了活命，有亲戚介绍，把二亩雷响田租给一家姓肖的银匠家。年租为四挑谷子，约四百来斤，只够一个人一年口粮。其余不足是靠亲友接济一点，母亲又帮人缝补浆洗衣物，饱一顿饥一顿地苦度时日。三弟生病无钱医治病死后，靠父亲生前的一个好友帮助，我才勉强得以读完小学五年级。

1948年到1949年间，我大舅和老叔分别参加了滇桂黔边纵红军闹解放，母亲曾暗暗帮助他们缝补衣服和做红军帽，盼望早点解放能过上一天好日子。1949年底解放大军从广西到云南，母亲和四叔还积极参加迎军工作。到了1950年云南全省解放，我已是新办的县一中的初一的学生了。那时学校要求我们住校，并向我们宣传土改的伟大意义。学校又组织我们观看影片《白毛女》和苏联影片《女拖拉机手》。拖拉机隆隆地开在田野上，多美好的集体农庄啊！我在心里欢呼着，盼望土改早日成功。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盼望有一天也能过上集体农庄的生活。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有天吃过晚饭我从土改工作队（那时我们中学生只参加做登记填表的工作）回到家中时，母亲含着泪把一块“地主”的黑牌摆在我面前。顿时，我眼前发黑，如五雷轰顶，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预料，一场可怕的灾难已经降临到我家了。我和母亲一同看看这块黑牌，相对无言地流着伤心的泪水。一会儿我问，我们家田少，又无劳力，怎么会划为地主呢？母亲流着泪说，他们说我家出租田已满三年，刚够地主条件。又说如果不认，就跪砂子……我妈害怕，只得认了。这时，我想到了我们红军校长，他懂政策。我安慰母亲说，我去告诉我们红军校长去，也许他能帮我改过来。于是，我立即回到学校找他反映实情。红军校长叫赵林，昆明人，是个才二十多岁的革命学生。听完我的哭诉后，他脸色为难，只说，少先队员要站稳阶级立场（此时我是少先队的中队长），只要划清界限，将来还是有前途的。又安慰我说，你回去告诉你母亲忍耐一下，过了五年后，大家都一律平等了。我牢记红军校长的话：划清界限，耐心等待。但是，从此我不敢回家，我不忍看母亲的眼泪，我害怕我心太软而会失去阶级立场。

大约过了一个月，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一个好心的亲戚告诉我，我妈被打斗得遍体鳞伤被抬到医院抢救去了，快要死了，劝我去看母亲一眼。我问母亲是怎样被伤害的，那个亲戚告诉我说，是我那老婶害我妈，说我妈还藏有金条。土改队当然相信了。实际上，父亲过世后我家就一无所有了。母亲只是不吭声，任他们打斗。因为说“有”是无中生有，到哪里去拿金条子？说“无”人家根本不相信，叫我母亲在四脚板凳上站着，不说“有”就一脚把板凳踢倒，母亲就摔在石头地板上。倒下后又拳打足踢，重新提了站在四脚板凳上。就这样，反复斗了三天，直到母亲最后提不起来，翻白眼为止。亲戚又说，干这个事的人是从外县来的一个无业游民，好心的乡亲们并没有动手。

听完了好心亲戚的陈述，我这天真的无力的少年，心里只会产生伤痛。去看还是不去？又让我陷入两难选择。去，我能做些什么呢？说不定还有阶级立场问题。不去，对母亲的无助与痛苦的冷漠，做儿子的岂不是太残酷与自私了吗？思虑再三，我唯一的选择还是去找我的红军校长去，因为我那红军的大舅和老叔为了自保，早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当我把情况向红军校长哭诉后，他的眼睛里透着同情与无奈，只悄声对我说，去吧，但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当晚，我偷偷地跑到医院从窗外看了母亲一眼，只见她的鼻孔里还插着氧气管，还没有死，我伤悲的心情稍有缓解，

悄悄地返回了学校。

又大约过了六七天，一个更大的噩耗传来了——我母亲死了！告诉我这个坏消息的表娘说，我妈是死在老叔家的牛厩中。尸体被好心的亲友们用几块木板抬出去埋在父亲墓旁去了。一个清清爽爽的农民女儿，一个劳动妇女，一个含辛茹苦的母亲，就这样悲惨地死去了！

我妈死了，一个所谓的“阶级敌人”死了。我们兄弟俩还是儿童，我的“阶级立场”又很坚定，应该算清白了吧？不然。每个政治运动都要把我们审查，使我们受侮辱，还监视我们有没有“翻案”的言行。我老实接受改造，靠拢组织靠拢党，都有人说这是“假的”，“本质未变”。就是在批准我入团的政审结论中还说“对家庭出身的本质认识还需要继续进行”。

改革了！开放了！落实政策了！从此，我们不再是“二等”公民了。1980年有一次碰到了当年的土改片长周树森，问及我母亲错划“地主”之事。周无奈而痛苦地说：“张老师！那时我才十八岁，我懂得什么呀？你看，我也被打成阶级敌人了！”说后他也泪流满面了。周土改后提升为县银行行长，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为给县委提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劳教了二十年几乎饿死。1984年一个离休的红军叔叔李凯，劝我说一齐去找当时的贫协会会员为我妈作证。找到了已当了副县长的李从恩，他是我们小学同学，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上边还没有落实土改错划阶级的

政策，现在大家都一样平等看待了，说句本心话，当时我是贫协会会员，去没收地主浮财时，十有八九家都是“穷斯辣拐”的。我以为这位副县长说的倒是实话。至于扩大化的实情如何，则有待进一步落实。

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1951年大西南边疆的“土改”与1947年康生在晋西北搞的“土改”何其相似？与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曾彦修（他当时是康生部下）在《炎黄春秋》2009年2期中讲述《才德反差的康生》揭露的康生在晋西北搞出来的所谓“经验”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康生的经验是在贫穷地区无中生有，搞出“变相地主”来，达不到条件不管，只要挖出“地财”来就是胜利成果。到处打人、吊人、跪砂子，不知道打死打伤多少人。康生在“文革”中故伎重演，又不知整死了多少人。这就是康生之流从苏联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所谓“革命”，广大善良的中国人民怎么会知道呢？

以下简说我家其他的所谓阶级敌人：

外公，丁有福。有一亩左右雷响田，二亩左右山地，一生勤劳自耕，因为照顾比他们更穷的一个亲戚，农忙时请来帮几天忙，就被诬为“请长工”，错划为“富农”，外公于1959年饿死。

岳父，胡宝凡。从小跟父亲做小生意，读过几天老学。后来在乡小学教书，不够一家生活，开了一个小糕点店，才维持了一家人的温饱。家中无土地，他弟弟也参加红军，不知为什么

划为地主。据说是乡下有个亲戚借了点儿钱还不出，每年挑几担包谷来。

四叔 张珍禹。解放前当过半年卢汉队伍的文书上士（只是个兵）。1949 年爷爷怕事，叫他回家。他积极参加迎接解放军的工作，被指定大组长。不料在 1951 年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四年。但实际上劳改近三十年，积劳成疾而死。

老叔 张珍棋。19 岁参加边纵红军游击队，中共党员。解放后曾在县税务局工作。因年轻时曾与一个街坊朋友交为“把兄弟”，后来这个朋友被捕，

老叔与这个人纯属朋友关系，但因此而受牵连。1958 年没有任何证据，以“把兄弟”为地方坏组织为由，把老叔内定为“坏分子”而清理回家。1959 年饿饭，积郁成疾而死。

本人，学校分配参加工作。1957 年，县委动员帮助党整风，我因写了一张大字报《您的婴儿向您呼喊》，内容是请团县委关心一下基层组织的团员们的思想工作，因此被内定为“右派”，内部监督使用。1958 年我因积极参加昆明师范附设函大中文系本科学习，成绩优秀，单位批判我“走白专道路”。1960

年，我一个小小中学教员，又不知“庐山会议”为何物，单位又以“思想右倾”为由把我当做典型开大会批判我。文化大革命我跟着报纸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因此又受到大会批判为“漏网右派”，并把我关进“学习班”反省批斗半年。

由此可见，极“左”的肆虐在底层对一般人的伤害是何等深重，何等残酷！那些极“左”而又无知的先生们，又何曾承担半点责任呢？

（作者为云南省开远市教师进修学校原中专高级讲师）

（责任编辑 李 晨）

（上接第 60 页）战斗，最后我终于中箭落马了。”

“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已经遇到严重的危机，只有改革才能挽救它。”

“我相信，经过改革，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将在人类文明史上显示自己的价值，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现在改革已经中断。所谓用‘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来‘治理整顿’，实际上是停止改革，让旧体制去主宰经济。特别是 1989 年以来对所谓‘资本主义改革’大张挞伐，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事业遭到如此严重的磨难和肆无忌惮的批判，不能不使人对中国的未来深感担忧。”

作者显然知道，在 1991 年的气候下，他这本书，特别是上面那几句话，必将使有人震怒。可是他仍旧像那位倒在战场上的记者一样，用自己仅有的力气，喊出了他最后的声音：

“我知道那些‘左王’们肯定要祭起各种大帽子，向我头上扣来。我已经不屑于和这种人多说什么，但应回敬两句话：恰恰是你们在毁灭中国共产党！恰恰是你们在断送社会主义！”

一个月以后，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不管人们怎样看待他的观点，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坚持改革的信念，是无可置疑的。一年以后，客观事实对他的呼吁作了肯定的回应。“治理整

顿”收摊了，改革又重新起步了。因为 1992 年邓小平做了“南巡讲话”，谁不改革谁下台。所以中断的改革又恢复了。已回台湾的张肇忱先生，正要付印此书，闻此音讯大喜，当即加一《编者补记》于书尾，全文不长，意味隽永，特附录于下，以供读者品味。

编者补记

本书行将付梓，海内外忽盛传邓小平氏南巡讲话。两相对照，吾弟与邓氏所见略同之处甚多，竟然横遭贬斥，赍志以歿。

邓氏之言，不闻久矣。今乃必待南巡，始能开口，足见阻力之大。以邓氏之尊，尚且如此，吾弟何人，其能免乎！

吾弟生前曾言，中共党内，不乏锐意改革之人，惜多不得志。一九八九年以来，左派执意己见，毫不捐弃成见。棍棒横飞，万马齐喑。黄钟毁弃，瓦缶雷鸣。吾弟不忍改革之中断也，故以捐弃之身，进针砭之言。风雨鸡鸣，志士苦心！

今闻邓氏讲话，知大陆停滞三年之后，改革之议又起。苟能贯彻，国家幸甚。

本书所言，改革也。改革声中言改革，纵有逆耳之处，亦皆忠言，当见容于大陆诸公也。

张肇忱一九九二年三月

（责任编辑 李 晨）

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

• 周 拓

《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民主的对立面不是专制吗》一文在国内的刊物上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有彻底澄清之必要。本人不揣冒昧，谈一点浅见，就教于方家。

首先，我们要弄清“民主”的涵义。

当今世界上一般提及“民主”，是指目前已扩展到一百多个国家的所谓“主流民主”，即自由民主——法治、宪政、人权保障基础上的民主。这是“民主”与“自由”结婚所生的混血儿，或者说，是受法治和宪政约束的民主。这里的“法治”，英文是 rule of law，即“法律之治”，法律至上，每个人、每个党派和组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之下活动，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而作为下位法的一般“法律”不能与上位法“宪法”相抵触。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则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制宪原则，其核心是，每个国民在宪法所列举的“基本自由权利”即人权（比如我国宪法 35 条所列各项）上都必须享有平等权利——除非因违法犯罪而依法剥夺一部分基本权利。权利是 rights，“我所享有的”；不是“权力” power，“我施加于别人的”。

历史上，这一系列基本自由权利即人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所谓“三代人权”。第一代人权包括平等的人格尊严，平等的法律保护，生命权，人身自由安全权利，财产权，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和从事经济活动的种种自由（迁徙、择业、创业、订立契约……），但不包括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主要是平等的政治权利。第三代人权即平等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核心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权。

仅有原则、原理还不行，还必须有制度措施加以保障和落实，这就是宪政，完整表述是“自由宪政”。各自由民主国家的宪政设计可以有许多形式上的不同，但基本内核都不能背离限权、分权、制衡（制约与平衡）这一条。这是因为，凡有至上性一元绝对权力，即没有限权、分权、制衡的地方，必定

只有专制，没有自由。对于每个人来说，“专制”就是“来自他人的强制”，这“他人”可以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当你以外的“他人”有绝对权力时，就会变成施加于你的，一个人的专制或少数人的专制，或多数人的专制。所以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第一必须分开，不能集中在一人、一些人或一个机构手中；第二，这些分离的权力既要互相监督、“制约”，又要相互合作，这就需要“平衡”，畸轻畸重就无法有效地相互监督、约束与合作，因为一旦失衡，太重的那种权力就要压制其它权力。

法治、宪政和自由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体：自由是价值目标，法治和宪政是保证自由这一价值目标得以实现的制度措施。

自由民主是自由加民主，所以很显然，自由与民主是两回事。只不过，西方人习惯成自然，就把“自由民主”去掉修饰词“自由”，简称为“民主”了。久而久之，许多人甚至忘记了这是两回事。

那么，和自由相区别的、“不加修饰词的”“民主”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务必要清楚区别“民主”的两种涵义。第一种，本源民主。“民主”的本源来自古希腊城邦，就是“人民的统治”，democracy 的“demo”是“人民”，“cracy”是“统治”。这里的“人民”，是指与“贵族”或“富人”相对立的“平民”或“穷人”。贵族、富人、社会上层是少数人，平民、穷人、社会下层是多数人；于是，“人民的统治”实际就是“多数穷人的统治”。

“民主”还有另一个涵义，是指“平等的政治权利”。如上述，第一代人权是不包括平等的政治权利的，第二代人权才有这个东西。以英国为例，从 1688 年的“光荣革命”开始，英国就确定了法治和宪政，但享有政治权利的全权公民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直到 1832 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才开始扩大享有政治权利的全权公民的范围，开始“民主化”。直到 1918 年给了妇女选举权，才实现了以

全体成年公民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为主要标志的民主。从1688年到1918年,这两百多年英国都是“有自由,无民主”(香港至今仍然如此)。1918年之后,才变成既有自由、又有民主,这就是自由民主。

很明显,民主的这两个涵义——“多数穷人的统治”或者简化一点说,“少数服从多数”和“平等的政治权利”是不相容的。因为,“少数服从多数”当然意味着少数人低于、受制于多数人。这就既不公平,又不正义。“本源的民主”如果不受法治、宪政的约束,就不但不是专制的对立面,反而成为“多数穷人(或各种情况下的多数人)的绝对

权力”,这本身就是专制——多数人或多数穷人的专制。

因此,第一,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不是民主。第二,宪政本身一定不是专制,但有可能是有自由、无民主。第三,民主的第一义(“人民的统治”、“多数人的统治”)如果是指人民的、多数人的、多数穷人的不受限制、至上性的绝对权力,那么,这种民主本身就是专制,是自由的反面。第四,民主的第二义“平等的政治权利”,本身就是平等的自由权利即人权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 吴思)

编读窗

理性批判的范围是什么

● 朱震林

2010年1月号《炎黄春秋》刊有《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一文,揭露批判戈培尔利用职权控制舆论的种种劣行。文中有两处分别用了“这个跛子”及“瘸子部长”来鄙称戈培尔,虽然我理解这是作者出于对法西斯主义者的憎恶,但从理性批判的层面来说,我觉得不妥。

我所理解的理性批判,它应该是对行为人思想和行为的评判,而对行为人特殊生理缺陷的评判,那属于医学研究或是戏曲脸谱的艺术想象,不应在理性评判的范围内。其内在的原理在于,行为人的生理缺陷与行为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不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退一步说,如果存在某种联系,如精神分裂导致行为异常,那也是医学研究或是精神分析领域内的课题,不是理性批判的分析所能胜任的。虽然贪污犯肠肥脑满的外形和贪污行为有想象中的联系,但法官通常不会把肥胖作为贪污罪的定罪证据(坊间传说的韩复榘看相断案除外)。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常识,我觉得戈培尔作为纳粹党意识形态的主管,其利用职权控制舆论的种种劣行,尽管可恨可憎,可这和此人的“跛”及“瘸”没有内在联系,《纳》文用生理缺陷作为戈培尔的丑恶标签,朴素的大众情感可以理解,用理性批判的标准来衡量是欠妥的。

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如果我们把戈培尔生理上的“跛”及“瘸”抽象出来,定义为可鄙,那么我们如何看同样的“跛”及“瘸”出现在华罗庚院士身上,出现在作家张海迪身上,出现在罗斯福总统、金大中总统身上,甚至普

遍地出现在进入暮年的老人身上?如果我们不能用同一标准来回答这个问题,则说明我们理性批判的标准有失偏颇。

其实,把行为人的生理缺陷现象作为批判组成部分,我们是不陌生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压倒一切的批判潮流中不仅有两报一刊社论,更有民俗化的批判漫画铺天盖地家喻户晓,被批判者除名誉被批臭外,更被形象丑化,漫画中刘少奇的鼻子和林彪的秃顶至今在我的脑子里难以抹去。经过了若干年,现在我明白了,这类“理性批判”虽贵有真理华丽外衣,但其手段水平与坊间传说的韩复榘断案不相上下。

时至今日,大批判漫画已经成为古玩市场上的文物,但把评价对象的生理缺陷作为评价内容来评判的习惯,还在时时显现,究其思维深处,是评判者在评判中并没有自觉地把被评判者的人格权放到应有位置来尊重。即,被评判者即使有错有罪,但他作为我们的同类,仍同我们一样享有“人”的尊严不被侮辱;具体到戈培尔,他的罪行应由公正的法律来审判并惩罚,但其“跛”及“瘸”,还应得到人道和医学的包容善待。另外,就理性批判的方法而言,我们还不能忘记两句曾经广泛流传的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如果我们现在对此没有应有察觉和警觉,当真理在手,被评判者又无还手能力时,为解气、爽口、习惯,仍然使出嘲笑被评判者生理缺陷的招数,这样不仅降低了评判的理性成分,也降低了评判的品位,使评判的理性光芒蒙上阴影;更要紧的是它将阻碍我们整体文明水平的提高,导致我们在将来再次成为被嘲笑嘲弄对象时,我们手中没有抗争的依据,也没有抗争的资格。

被埋没的红军攻占长沙大捷

• 李维民

八十年前的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曾两次攻打湖南省会长沙，第一次是在7月底，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胜利攻占了长沙城，并占领了十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战果非常辉煌的一次进攻战役，也是红军唯一一次攻下省会城市，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连共产国际都感到惊讶。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也说过：第一次打长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应是非常大的”。但是，自从1945年彭德怀在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上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特别是1959年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几十年间，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大捷，也被抹煞了，1979年以前出版的许多史书，都避而不提这件事。抬高毛泽东和一军团，贬低彭德怀和三军团，一时成为风气，而且至今还有影响。例如《炎黄春秋》今年第3期第34页刊载的彭查理所写的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叙述：“红三军团由于打长沙损失惨重，撤下来后与红一军团会合，实际上有投奔红一军团的意思……彭德怀这个人是个直脾气，他主动提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并成立红一方面军，并明确表态他个人不担任红一方面军总部的领导职务。”这一叙述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

第一次攻打长沙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1930年6月15日，彭德怀召开红三军团前线指挥部会议，讨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关于湘鄂赣红军“帮助鄂南与鄂东南地区暴动”，“切断武汉至长沙铁路”和进攻武汉的指示。彭德怀认为，武汉有敌军5个团据守，且有坚固的工事。而岳阳、阳新分别有钱大钧12个团和罗森一个师驻守，红军如进攻武汉，钱、罗两部必然尾随夹击，红军前有坚城，后无退路，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他不赞成攻打武汉，而率领红三军团主力向鄂城、通山进击，并且扬言进攻武汉迷惑敌人。国民党武汉行营急调岳阳的12个团星夜赶赴武汉，岳阳仅

剩一个多团驻守。红三军团根据敌情变化，转向岳阳前进，先后攻占通山、崇阳县城后，7月4日攻克岳阳，缴获了敌人长短枪500余支、机枪18挺、野炮4门、山炮12门及大批军用物资和粮食，完成了切断武汉至长沙铁路的任务。这时，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正在进行中原大战，湖南军阀何键以大部兵力在湘桂边境与粤军张发奎、桂系李宗仁的部队混战，长沙城内守备薄弱。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平江、浏阳地区工农群众支援下进攻长沙。7月25日，战斗打响，红三军团的第五、第八两军，从前后两面向敌发起猛烈攻击，经反复冲杀，26日突破敌军防线，夺占了长沙门户金井，27日晚9时攻占长沙城。这次战役共俘国民党军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机枪28挺，迫击炮20余门，山炮2门，电台9部，以及大批弹药、物资。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是彭德怀审时度势，抓住战机，正确指挥和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

攻占长沙后，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几千名政治犯和革命群众，其中包括第二天就要被杀害的向仲华、许建国、曾佑生等。7月29日和8月2日，在长沙市相继举行了两次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长沙解放，纪念南昌起义3周年。红三军团前委颁发了《告群众书》，阐明革命形势，提出革命主张和任务。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创办了《红军日报》，刊登《共产党十大政纲》等文件和国内外要闻。7月30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宣布了土地法、暂行劳动法等施政纲领，恢复和发展各行业工会，并且筹措现款40余万银元，解决了红军被服和医疗困难，而且扩大红军七八千人。按照湖南省委原先的决定，以红五军第一纵队和独立师为主，加上地方赤卫队等，在长沙新组建了红十六军。红三军团由两个军成为3个军，4个师成为6个师。

红三军团进入长沙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曾留学法国的红八军代军长何长工,还召集各国驻长沙的领事馆及教堂、医院、商团和记者等共有300多外国人参加的会议,用法文和英文宣传红军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政策,要他们通知本国兵舰迅速撤离湘江,要求国际红十字会支援医疗器械和药品。红军攻占长沙轰动中外,英国路透社等世界媒体纷纷发出电讯,西班牙驻长沙领事馆报道:“红军根本不是无组织的散匪,而是有文化、有教养、有礼貌的正规军队。”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国民党当局非常慌乱。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一面调兵加强武汉守备,一面派部队增援何键。8月4日,在游弋湘江的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敌军十几个团于8月5日晚从南北两方向长沙发起进攻。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红三军团前委及时决定撤出长沙,向浏阳、平江苏区转移。彭德怀率红五军一个师为后卫,控制浏阳门外高地,掩护部队撤退。6日,敌南北两路向浏阳门对进。此时,红三军团政治部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尚未撤出长沙城。在紧急情况下,彭德怀亲自指挥两个连阻击北进之敌,集中一个师的主力突击南进之敌,牢牢地控制着浏阳门外高地,掩护军团政治部和省苏维埃政府及进城的苏区群众撤向浏阳、平江。红三军团在撤离长沙的作战中又歼敌一个团,毙伤敌1000余人。红三军团由于及时撤出长沙,并无严重损失。

8月23日,红一军团按照先前与红三军团的约定,北进到浏阳东北的永和市,与由长寿街南进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当时红一、红三军团兵力大体相等,毛泽东在8月24日致中央的信中说:“第三军团(五、七军)已从长寿街来集中,三军团士气很壮,有七千枪和一军团来前方者相当。”彭查理的文章说红三军团由于打长沙“损失惨重”,来“投奔”红一军团,实属荒谬。

红一、红三军团会合后,在第二天举行的前委联席会议上,决定红一、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彭德怀提议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和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

红一方面军刚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的总前委就决定再次夺取长沙。彭德怀并不同意第二次打长沙,因为第一次打长沙后,敌人已坚固设防,

红军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进攻战,攻城能否取胜难以肯定;从三军团本身来说,撤出长沙只有十几天,从1929年11月至1930年8月,部队扩大了8倍,5月以后一直没有得到休整,迫切需要整训。但是,8月24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9月1日下达向长沙总攻击命令后,彭德怀还是积极执行命令,率领部队冲锋陷阵。如他所料,第二次攻打长沙很不顺利。经过3天激战,只突破了第一、第二道工事,未能突破敌军阵地,形成胶着状态。10月9日,方面军又下达了“强攻该敌,夺取城垣”的第二次总攻命令。红一和红三军团指战员,冒着敌人的炮火前仆后继,顽强拼搏,激战至11日拂晓,仍未能突破敌军阵地。9月12日中午一时半,方面军下达了撤围长沙的命令。

第二次攻打长沙,共歼敌两个多团,毙伤敌1000余人,歼敌不如第一次多,伤亡却比第一次大。9月17日,毛泽东向中央报告第二次进攻长沙不克的三个主要原因是:在敌人打工事前未能消灭敌之主力;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和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红军缺乏重炮和通讯器材,联络不好。

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第一次攻克长沙的胜利,所以多年被埋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人认为,那是立三路线时期,在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重点攻占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战略方针下打的,所以不值得宣扬。其实正因为彭德怀没有机械执行当时中央的指示,避免了进攻武汉可能遭到的重大损失,才取得了攻占长沙的重大胜利。彭德怀对此做了客观的评价。他说:第一次打长沙取得的“胜利在当时是很大的,否认这些胜利是不符合事实的”,“但这些胜利并不能掩盖立三路线的错误,也挽救不了立三路线的失败。”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攻打长沙,同样是在立三路线时期,也是受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影响。毛泽东在8月19日致中央的信中说,“我第一军团,把敌人次第消灭,占领长沙岳州,进攻武汉九江,开展三省更大局面,促进全国总暴动”;在8月24日信中又报告说,第一军团“决定以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开向湖南”。立三路线统治时期总共不到四个月,一时看不清这一路线的错误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长期以来,总是

李锐谈“周惠谈话”

• 盛禹九

不久前,互联网上出现一篇文章,题为《采访周惠谈话记录》,署名“张杰”。该文声称: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派出工作人员采访周惠,“其中有一段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锐”。文章通过所谓“周惠”之口,对李锐在庐山会议的作为提出了所谓的新史料,新看法,如说“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等等。笔者为此访问了九三高齡的李锐同志。现将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盛:《采访周惠谈话记录》在互联网刊出后,我注意到,您曾授权余习广发表一个声明。声明说:“张杰发表的这篇所谓《采访周惠谈话记录》,是一篇伪造的访谈录,所有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了解这一点,这个伪造的访谈录,以周惠之名对我进行的所谓揭露,纯属虚构。我希望,这个伪造者张杰,能够公开站出来,我愿意与他对质。”这个《声明》发表至今已近三月,至今没有看到这个作者“站出来”,而网上却闹得沸沸扬扬。有“专家”著文写道:“《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这份材料的出现,就像一阵清风,它至少部分吹散了笼罩在1959年夏天庐山上的迷雾,使我们更加接近了庐山会议的真相”,还有人感叹:“李锐老一世

英名毁于一旦,一生事业尽付东流”,等等。现在,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人大都已作古,只有您老还健在。面对着这些来历不明的“庐山会议的真相”,希望您能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李锐:我发表那个《声明》是有充分根据的。张杰文章在网上发表后不久,和我住同一座楼的北京大学刘世定教授就来告诉我:他接到周惠的侄孙惠海鸣(周惠原姓惠)从苏州打来的电话说,周惠的夫人范博和儿子惠小兵,“对网上传播关于李锐老的流言非常愤慨”,特请他郑重转告我:“周惠生前绝对没有那样一次关于评说李锐的谈话。”另外,经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魏久明证实:“中央党史研究室没有‘张杰’这么一个人,组织上也没有派任何工作人员去采访过周惠。”由此可见,所谓《采访周惠谈话记录》完全是一篇随意杜撰的文章,不可相信。

关于庐山会议的真相,我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已作了相当详细的介绍。这本书是当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提议并催促我才写成的。乔木同志参加了庐山会议,知道其中的许多内情,感到需要有一本书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否则,许多真相后代难以澄清。我的书写好后,经过

说毛泽东“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批评与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由于交通不便,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决议未能及时传达到红一方面军。这时,蒋、冯、阎中原大战以冯阎失败告终,蒋介石随即调大军摆开进攻江西红军的阵势。在10月下旬举行的罗坊会议上,毛泽东主张实行战略转变,引诱敌人到根据地来,“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据此提出红军东渡赣江的计划。当时红三军团的许多干部反对毛泽东的意见。这时,

彭德怀持什么态度非常重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占优势。”在这关键时刻,彭德怀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作战计划。1965年9月,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时还谈起这件事。毛泽东说:“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你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彭德怀这次的“一言为定”,对于红军后来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乔木审阅。这本书于1995年出版发行,至今十多年来,除了吴冷西提过意见,我在《读书》杂志和《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附录中作了答复和辩正外,此外没有其他任何人提出过异议。事情本来是很清楚的。现在,突然冒出个《采访周惠谈话记录》,质疑庐山会议一些事实的真实性,制造许多“迷雾”,并且造谣指名道姓地来攻击我。确实使人感到有些蹊跷。

盛:就我所知,张杰的这个《谈话记录》已在读者中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一些人随声附和,认为庐山会议爆出了“新料”,真以为“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哩!

李锐:关于庐山会议,1981年6月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定评,认为当年毛发动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的斗争,是完全错误的。这次批判和斗争的前因后果,还有我在山上的言行,我都写进《庐山会议实录》里了,读者只要细心读一读这本书,便非常清楚:把这一场自上而下发动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的“很大责任”,归咎于下面某些无关紧要的人物,显然是本末倒置。就我个人来说,实在担当不起。

盛:不久前,原“四人帮”的笔杆子朱永嘉也在境外发表文章回顾庐山会议,认为彭德怀问题很大,对庐山悲剧负有重要责任。马立诚在2009年12月3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有关庐山会议的一篇奇文》,对朱文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李锐:朱永嘉的文章,阐述他的不同观点,尽管是错误的,还可以进行辩论。张杰的文章不是“不同观点”,更不是“一阵清风”,而是造谣和诽谤,不能容忍。

盛:对造谣和诽谤应该坚决反击,以正视听。例如,张杰说,您给主席写的那封信,是“自作聪明”,“撒了谎,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那些最敏感的话”,因此“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又说,李锐后来“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大错误,如此等等,是那么回事吗?

李锐:我的书里写得清清楚楚:我给主席写信,不是我个人“自作聪明”,而是田家英转告胡乔木给我出的一个主意。因为当时彭老总给主席的信被印发后,各小组讨论中,有人追问7月23号

我们在黄克诚住处议论主席之事,“湖南集团”的指责即由此而来。乔木考虑到主席平日对我的印象比较好,写信给主席可能容易接受。为了消除毛的疑虑,我接受田家英和乔木的意见,给毛写了信。信的全文已收入书中。我在给毛的这封信里,确实隐瞒了我们在黄老处谈话中的某些敏感内容,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周小舟等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实际上,当时我们的一些议论已被主席有所察觉,因此主席几次找我们谈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如实地谈到一些情况,后来也不能不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作出深刻检讨。我在《实录》中写道:在检讨中,“我把帽子戴得大大的,‘一劳永逸’,免得再受‘避重就轻’‘不彻底’等类指责”。但是,我还是有底线的。因为此前和薄一波同志商量过,他告诉我:讲情况只能点到“彭、黄、张、周”为止,不要牵连到其他人。我是按照薄老的嘱咐做的。比如,大会《简报》揭发出田家英平日和我之间的密切关系。我把田平日对毛的一些议论(例如田说:“如果我离开中南海,我会给毛提三条意见:第一,听不得批评意见;第二,能夺天下,不能治左右;第三,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甚至把周小舟的某些言论,都揽到我自己身上。这样做,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我李某个人。这难道也错了,是“品格”问题吗?

盛:依我看,历次政治运动中,在“个人迷信”和那种严酷、高压的态势下,包括很多受人尊重的革命领袖人物,他们为了顾全大局,保存自己,不得不采取一些迂回曲折的方式,以避其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庐山会议上,彭、黄、张、周都作了违心的检讨。事后,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写道:“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来就非常痛苦。因为这件事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从此党内失去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

黄老的《自述》中,谈到8月10日小组会追问7月23日晚议论主席的事,还写了这样一段话:“罗瑞卿带着李锐到我这组参加会议。我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键的是议论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那句话。我深知他们当时很冲动,又都是一贯忠于革命事业的正直诚实的人,所以并不认为这句话有什

么了不起……这时看到李锐,心想他的为人,一定会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就说:可能是李锐说的,但也记不准了。后来,周小舟自己承认是他说的。”黄克诚这一段话充分证明:您和周小舟在庐山会议上的言行,光明磊落,没有什么可值得指责的。

李锐:还有《谈话记录》说我“夜闯美庐”,完全是造谣。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期间,主席的住处,戒备森严,任何人没有毛的许可,没有一定的手续,是绝对不可能进去的。连彭老总那样的人物,开始想找毛个别谈谈都不可能,结果只能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列席代表”,没有“上谕”,敢去“夜闯美庐”吗?!

盛:关于“夜闯美庐”,我曾看到周惠的亲属惠海鸣2009年11月16日写的,现在网上发表的《关于张杰的“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一文的声明》,其中说:“张杰一文中所谓李锐‘夜闯美庐’是‘1962年小舟告诉周惠的’,根本是造谣,与时间也不对头。因为庐山会议后不久,周惠1960年调到北京之后,从未见过小舟,更不可能议论时事。”这充分证明:张杰的这个《谈话记录》完全是胡编滥造。能谈谈庐山会议上您和主席真正接触的一些情况吗?

李锐:庐山会议期间,主席找我谈话有三次,都是几个人在一起谈的:第一次是7月11日,有周小舟、周惠和我;第二次是7月17日,除二周和我外,还有胡乔木、田家英;第三次是30日上午,有黄克诚、二周和我。这三次谈话的内容,我在《实录》中都如实写了。除此之外,我没有单独找过毛;毛也没有单独找过我。前面说过,我接受田家英和乔木的意见,7月30日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对7月23日在黄克诚住所谈话的事作了解释。原以为就此过去了,谁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毛实际上已得知我们在下面议论的一些情况,我和“军事俱乐部”已经有了难以剪断的牵连。在这种情况下,我除了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作深刻检讨之外,还会去“夜闯美庐”,自讨没趣吗?

《谈话记录》说,周小舟调任广州后,田家英出差广州,曾顺便看望小舟,告诉他:庐山会议上,李锐和田家英都曾在毛的面前“下跪”求饶,这更是荒唐透顶!我知道,您和田家英也有过来往,应该了解田家英这个人。田家英和我不是猥琐小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不会做出那种卑躬屈膝的事

情。

盛:关于田家英去广州看望周小舟的事,就我所知,最近汪澍白老先生专门打电话到广州问周小舟的夫人王宁。她已97岁高龄,脑子还非常清醒。王宁明白无误地回答说:“田家英没有到广州来访问过周小舟。”可见此事纯属子虚乌有。至于您提到我和田家英,是的,50年代我在《中国青年》杂志工作期间,对他曾有过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接触。田曾谈过他对“主公”的敬仰和心中的一些郁闷,使我感到他不仅有才气,也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田家英在你们的保护下,躲过了庐山一难,却躲不过“文革”那场灾难,在毛的书房永福堂自裁明志。记得您曾对我说,安子文告诉过您,田死前把他平日收藏的一些毛用宣纸写的小字幅,主要是唐宋诗词,一一撕碎,丢入马桶冲掉。然后把头悬在一根栓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自尽。田家英满怀悲忿离世,我曾写诗悼念他,有“士可杀而不可辱,铮铮铁骨显刚雄”,“自诀悲凉难许国,伤心岂独一田生”之句,表明我对他的景慕和痛惜之情。同样,我也钦佩您,两次灾难您都没有躲过,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却始终昂首挺胸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啊!

李锐:田家英和我都是自尊心很强的人,但性格有所不同。田家英的性格刚烈而脆弱。他胸怀坦荡,受不了无端的侮辱和伤害,因此走上“宁为玉碎”的道路。我经历的苦难可能比田家英还多点:既有政治上接连不断的毁灭性的打击,毛泽东说的“六不怕”(不怕戴帽子、撤职、离婚、开除党籍、坐牢、砍头),我除了头颅还在外,其他的都经历了;又有前妻在家里不断地制造麻烦。举个例子:我从庐山回到北京后,田家英来电话说我俩是“道义之交”。前妻在一旁听到了,马上向上面反映,第二天就来人把我的电话撤销了。在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内外交困,到了几乎无法生存的地步。“三年困难”时期,我被发配到北大荒的农场劳动,快饿死了,是田家英救了我。他把情况反映到李富春那里,把我调离北大荒,总算活了下来。我这个人特别能忍,即使在那样的日子里,我始终相信黑夜终将过去,总有一天会见到光明。凭着这点信念,也就挺过来了。

盛:《谈话记录》还说您“当年刚42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因此

“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我看此说不值一驳。人各有志,只要自己行得直,走得正,想干什么都可以,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李锐:说我“想当总理”,那是十分可笑的事。你知道,1958年南宁会议一场关于建立三峡大坝的“御前辩论”,主席支持我的意见。就在那次会议上,毛叫我当他的秘书,我借口水电工作忙,想推掉;后来叫当“兼职秘书”,推不掉,转身回到北京,我就跟刘澜波(当时他是电力部部长,我是副部长)说:“我会碰鬼的。”这是湖南土话,意思是会倒霉的。后来的情况果然如此。

1959年4月,在上海开七届三中全会期间,此前我曾给毛泽东写过三封信,对“大跃进”提出一些意见。毛在大会上表扬了我。他说:“在南宁会议上,我找了个李锐,在长江水利上是和林一山唱反调的。他写了三封信给我。我看这个人有点头脑,就是胆小。”那是指我把信抄了一份,同时送给主管计划的李富春看。讲到这里,毛大声地问:“李锐来了吗?”我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只好应声站起来。主席当众说:“你坐在后面干什么?你坐到前面来呀!你给我写了三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李锐呀,我很感谢你,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你干嘛只给我几根‘骨头’,不给‘肉’吃?”毛是嫌我的信写得太简单。那个时候,开会的人对我说,你红得发紫了。三个月后,我从上海会议的“红得发紫”,到庐山会议成为“军事俱乐部的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政治风浪里的大起大落,使我看懂了有“中国特色”政治斗争的随意性、危险性!粉碎“四人帮”后,给我的冤案平了反。1982年,陈云同志要我去中央组织部成立青年干部局,开始我也不想去,是陈云亲自写了封信给我才去的。我是学理工的,一生只想为国家的“现代化”干点实事,从来没有想到要去从政当官,更不愿意转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去。但事情往往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无论你在哪个岗位,都很难回避政治。我终于深深地坠入庐山会议那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吃尽了苦头,想躲也没有躲过……

盛:您能够幸存下来,用文字和语言见证庐山会议那段历史,这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它将载之于史册。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在《周惠谈

话记录》中,多次提到周小舟和您。您能谈谈您和二周的关系吗?

李锐:50年代初期,我和周小舟在湖南一起共过事。他当省委宣传部部长,我是副部长。我们朝夕相处,我感到,小舟同志是一个平易而谦虚的人,讲求实际,为人率直,从不随波逐流,落井下石。他在庐山会议上就表现了这种可贵的品格。尽管人们批斗他那么厉害,他始终心地坦然,实事求是,对无理攻击硬着头皮顶住,不作过头的检讨,也不谄过于人。也正因为这样,遭到一些人的忌恶,他后来的遭遇和下场是十分悲惨的。

至于周惠,我和他在延安时代就认识了,南下时,又在开封见面。50年代初期我在湖南工作时,他任益阳地委书记,彼此十分熟悉。庐山会议上,我们开始一起交谈,观点是一致的。我和周惠是同志和朋友的关系,彼此没有什么“过节儿”。“文革”后,他是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仍不时和我联系,我们同为中顾委委员后,来往就更多了。

盛:张杰的文章发表后,很多人写文章或作证为您辩诬,刚才听了您的一席话,我很有感触,曾写小诗一首,现在念给您听:庐山迷雾早消澄,又见阴霾锁秀峰。几度清风驱恶瘴,明霞依旧映苍穹。

回头再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张杰”。戴晴称他为“没面目·张杰”,因为他至今确实没有亮出其真实的面目和身份。文章采用问答的形式,提问者是谁:是张杰本人,还是别人?该《谈话记录》有何凭证:是文字记录,还是录音,现存何处?这些都没有交代清楚,也不可能交代清楚。因此使人不得不怀疑:写这篇文章的人究竟想要干什么?

李锐: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许多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极左思潮受到批判。有一帮人很不服气,不愿意听到人们讲真话,总是按照自己过了时的脑袋,制造各种谣言“迷雾”,企图混淆是非,欺骗群众。但是,真正的历史是改变不了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再说一遍:如果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敢于负责任,希望他能有勇气站出来,把他的证据摆出来。我愿意在公堂上跟他当面对质。

2010年2月25日于北京

(作者系文史学者)

(责任编辑 吴 思)

背负杀人的自责

• 王冀豫



18岁的王冀豫

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所谓“大院”，潜台词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四合院”是北京的符号，“院”也就成了驻京党、政、军机关宿舍区的符号。军队大院狭义地讲就是北京公主坟以西按顺序排列，

空军、海军、军事训练总监部、军委通讯兵部、总后勤部、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解放军军事政治学院……各军兵种、军队院校的宿舍区。

大院孩子大多经过保育院和小学寄宿制教育。

1967年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同学常××急冲冲到我家：

“粮校（即北京粮食学校，是一所中等专科学校）的‘四·三派’^{注1}阶级报复，昨天把他们学校‘老兵’^{注2}高三的唐××在路上绑架了，学校军代表斡旋，今天中午才放，在里面他被殴打、侮辱。他们还正在这条路上抓捕殴打穿军装的同学呢。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打他们）。 ”

我积极响应，并招了几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二十几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

我在整个队伍的前面，骑车带着同学朱××。临近“粮校”门口，遭遇“四·三派”同学袭

击。我和另一个骑车的同学班××冲了过去，其他同行的同学被截在后面。满天的石头并不密集地砸在地上……

我们三个人首先到了师院附中，见几位高中生在紧张地争着什么，并一再叫初中生冷静，见到我们后呵斥我要听话。当时我并不以为然，但也不知该怎么办。

大约一小时后，绕道进师院附中的空军大院同学张××对我说：

“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即北京育英中学）的‘四·三派’同学，李红星没当回事。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李红星狂踢狂打，冲出校门，窜过围墙，游过运河。因为中了三刀，流血过多，游到岸边就昏过去了。要不是大伙绕道沿运河来师院附中，半道上发现李红星，赶紧就送空军总医院，李红星就完了！”

李红星是育英中学足球队主力，平时为人低调，自信平和，大家都很喜欢他。

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能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

师院附中“老兵”高三的栾××追着我說：

“小黑子（大家一直叫我黑子），这是武斗。我们也很气愤，能策略点吗？”

“不能！不能！”我们喊成一片。

我们是外校来增援的，在不冷静中反成了主角。师院附初中“老兵”与我们本就同住各个大院，无论“十一”、“七一”、“六一”的，还是“育鹏”、“育英”的，都是从小经保育院、小学两部制^{注3}长大的，大多是同学，共性太多。但高中生是哥哥辈，他们平日“傲慢”、“少沟通”，无论多正确，此刻的劝阻只能令人逆反。

我们都“混蛋”了，一场恶战开打。现在很多

情节已无记忆，但一种情绪至今还能感受到，就是“仇恨”！好像那天我们的体能、智能都超水平发挥。其实以往的团队训练，集体主义精神往往在一个最荒诞的时代总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犹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

我们到了粮校附近，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对方冲出校门虚晃了几下，就以满天的飞石和用螺帽为弹子的弹弓伺候我们。我们只能依仗树木为掩体，捡石头还击。这种无果的僵持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一个小时后结果来了，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一个整齐、低沉的吼声：“打倒‘联动’^{注4}！”使我们真正明白了这是在武斗。对方的柳条帽、工作服、标枪和棍棒使很多看热闹的师院附中同学“傻了”。

有人轻声说：“我们被包围了！”

我心里很藐视这些不中用的“好学生”，给他们做个样子，捡起一块鹅卵石，跳起来扒住卡车的大箱板，冲起哄架秧子的人群大叫：“打呀！”抡起来对车上的“四·三派”同学乱砸。我方的同学清醒过来，乱石如雨，甚至砸到我背上。

我感到卡车震动起来，赶快跳下。卡车如风一般窜出人群，向粮校门口驶去。

随着卡车停下，车上人员跳下车，与校内冲出的对立派同学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有两三百人向我方涌来。

“我方”溃退成一片，只剩下翠微、育英、太平路中学^{注5}的二十几个初中生和几个不知哪校的同学，缓缓地退，依仗路边的树，捡石头还击，有效止住了对方同学的冲击势头。

我见有个对立派同学十分勇猛地冲过来，就在一棵树后躲着。见其距我三米左右，抡圆了给他一石头，将其击倒，转身后撤，并大喊：“女生别慌，跑稳，我们在你们后面。”不知为什么蹦出那么多看热闹的女生。

我们二十几个初中生死死守在人群的最后，其中高中的只有栾××和王××。后者还拿着像机照相。

由于道路不宽，刚好是个“冷兵器”耍得开的战斗面。二十几个人，前后两排，可交叉换位、相互作用。

今日想来很可恶很可笑，这一切完全在无意

识中自然形成。事后我们曾以军人的后代、大院孩子、干部子弟、天生的、遗传的等等来解释，也理性地意识到这是生长环境、寄宿制、“共产主义”教育的结果，就是想不到对方也是同学、同胞。当然，他们当时也没想到。今天我们奔六、奔七了，常有聚首，当年的哪派都有，哪种出身都有，坐在一起，竟有一种莫名的沧桑。所谓“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想起来，大家只有感慨的自嘲和悲哀。

“兵败如山倒”，后撤就是溃败。无奈中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大喊：

“别退了，叫他们追到什么时候！后面的人截住他们，我们往回打呀！”

这样喊，起到了强大的暗示作用。双方追逐打斗呈南北方向。路东侧是一面坡，坡上是玉米地，西侧是民房。

对方同学想不到我们实际上有多仓促、多弱小，见我们竟敢去攻击他们，在心理上就有了一种风声鹤唳的疑幻。我的无奈喊叫，增强了这种疑幻，使前面追我们的对立派同学还在继续追的时候，后面的居然已经崩溃了。

那个被我用石头击倒的同学是育英“四·三派”的林×，也是文革前全市初中生铅球、铁饼第



武斗时期王冀豫(前右一)与伙伴们在一起

三名。他一身军装,满脸是血,追到我身后。我不认识他,以为是我方同学,大声叫他到我前面去,我掩护,结果挨了他一棍子,正中头顶。棍子打断了。我眼前的东西呈平行四边形地变换摇晃。预感到他会用打断的棍子刺我,我使用尽全力把我手里的大锄把抡向身后,只感到打中了,他倒了。

我拄棍呆了一下,眼睛的余光又见人群中一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头,就用左手护了一下,手腕剧痛,倒把我刺激正常了。

这是一场武斗中真正的胶着,双方混在一起大概有一两分钟,胜败即成定局。我疯狂地窜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

吼过,挥舞着棍子,把对方同学吓得转身就跑。同时,“我方”断后的二十几个同学一起转身,一副杀红了眼的架势。对方同学阵形大乱,非常慌乱。

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反应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的爬起。身体呈爬行状态时,我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我的棍子头呈四方形)。

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转身又追其他对立派同学。棍子打在人们背上嘭嘭作响,竟然无人倒下。其时我已虚脱,直到腹部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在地上,才停止追打。

看着满地的抛弃物:田径标枪、长柄斧头、各种棍棒、柳条帽,我竟对天狂笑,像头野兽。

“乐极生悲”,此时“我方”同学陈××从后面跑来,说:

“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

我惊呆了,怎么能打死他!还要拿他换人呢!

转身回师院附中。在校医务室,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了一下,但是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面色惨白。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

此时得知他叫“王岩宏”。

我问校医情况,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人了!

这是一种造就,在那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时代,在革命加拼命的鼓舞声中,以“三忠于四无限”^{注6}为平台的所有的正统教育,在我身上画了一个荒诞悲哀的句号。我和王岩宏个人之间形成了永不能解脱的负欠,这类负欠一再写在中华大地一代一代人的身上。

灵魂深处总有些东西根深蒂固,冥顽不化。但理性还是反复清晰地告诉我:“你是罪人!”一个“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这么多仇恨?忏悔是不够的,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

那年冬至日烧纸,给我奶奶我爸爸点的,火柔顺平顺,给王岩宏烧,就是点不着,我急了:“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恨我,也别和自己过不去。”“火”突地燃起来,兼有阵风,风助火势烧了个痛快!

四十二年了,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



(王冀豫,1951年生人。1967年8月5日北京粮校武斗打死人。1969年3月24日赴山西插队。1969年12月入伍。1979年到北京特殊钢厂当工人。1989年办稻香湖马场,牧马人工作至今)

注释:

注1 “四·三派”、“四·四派”:1967年初,党政权力机构被代之以“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以革命的名义,在“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的集权过程中,用中央文革小组替代党中央,利用群众运动运动群众,对国家各级权力机构进行了重组,现俗称“洗牌”。各级权力机构以“老、中、青”为组织方式,冠以“革命委员会”的称谓。文革中各群众组织在权力再分配的利诱下,纷纷自我标榜,都以革命的名义,希冀在“老中青”三结合的机会中当“官”。那真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在这个大背景下,1967年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提出中学生的群众造反组织要进行“革命大联合”,成立“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1967年4月3日,一派拥有激烈观点的各校中学生造反派组织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代表大会,发布“四·三宣言”,

后被称为“四·三派”。而4月4日,另一派持较温和观点的中学生组织召开代表大会就被称为“四·四派”。

注2 “老兵”,即“老红卫兵”。上世纪中期的“干部子弟”阶层普遍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未来国家主人翁意识,一种不同凡人的优越感。加之优于普通民众的生活条件、信息渠道,文革中被称为“特权”。文革前,大院有一种躁动,流传着很多关于毛泽东对侄子毛远新、王海容等人讲话的小道消息,对当时教育制度进行点评,起到了强烈的煽风点火作用。宋心鲁一封1965年还是1966年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洋溢着革命激情的信”,更引起了“要好好学习,但好好学习是为了谁”的思考。毛泽东一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更为“文革”、为大乱做足了文章。1966年初,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学术大批判使学生运动激发,渐成“红卫兵运动”。1966年4月,北京大学附中成立“红旗战斗小组”。5月29日,清华附中成立“红卫兵”,向校党委贴大字报,对教育制度质疑。后反对驻校工作组,并在全市各中学进行串联,各院子女之间的串联和议论尤甚,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北京各校在串联学生的鼓动下纷纷成立“红卫兵”学生组织,以红色政权的卫兵形象正式走向历史舞台。这些人大部分是干部子女,他们有着一致的教育基础,有着共同的抱负和理想,很多观点甚至不谋而合。后因毛泽东亮出了底牌,“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早期“红卫兵”的思想出现了根本变化,但惯性还存在。为区别后来的“四·三派”、“四·四派”,被称为“老红卫兵”。通常解释为毛泽东在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前后成立的各校学生组织。

注3 文革前干部子弟大皆3岁进保育院,7岁上小学。他们大都出自党、政、军各自的子弟学校,如空军:空军保育院、空军育鹏小学、育鸿小学;海军:海军保育院、海军七一小学。因保育院和小学均属于一个军兵种系统,俗称“两部制”或“二部制”。还有幼儿园、小学、初中“三部制”的,如十一学校、育才学校等。十一学校的学生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及各兵种部,如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的子弟,他们从各自的幼儿园升入十一小学,并可在规定分数线内升入十一中学,也可自选报考其他学校。还有一些因分数线太低分配到家庭住址附近的学校。国务院系统的育才学校是政府部门三部制的代表作,这类学校的硬件好于教育部的学校。不难看出,以上不同类型的子弟学校,仅是军政区别,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两个“板块”,其子女们所受的教育也是一脉相承。风格不同,水平差不多,都是以共产主义接班人

意识为启发学生努力学习的动力。

注4 “联动”,全称“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称谓首见于1967年陈伯达起草的元旦社论中“……对于‘联动’、‘红旗军’、‘荣复军’这样的反动组织,别说大民主,就是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不给!……”。这段话,起因是1966年底,由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石油附中、农大附中、一零一中五所中学的“老红卫兵”借“革命大联合”的口号,企图成立一个统一的行动组织,并于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这一天在苏联展览馆剧场召开大会,希冀统一思想。由于与会同学大多数人的父母受到冲击,并对中央文革小组及江青等人不满,情绪失控,提出“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火烧江青”等口号,造成组织行为中断,所以如毛所说“联动”反映的是一种社会情绪。继“血统论”之后,在干部子女中存在一种犹如面对类似隋唐以科举替代“阀阅”制的、贵族体系崩溃过程中的一种情绪宣泄。“12·26”大会后,一种社会潜在的冲突,以抓“联动”的名义扩大化成抓干部子女,使整个大院的子女层与文革小组情绪对立,爆发了“六冲公安部”的抗议行为。这种社会化的情绪甚至干扰了整个干部队伍的情绪。这迫使决策层于1967年4月22日,以毛泽东、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把监狱中的“老红卫兵”们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对话,并许愿:可以成立组织,中央给经费之类。江青、康生等以长辈的姿态,用“你是谁的孩子?”之类的煽情方式讲话,最后宣布释放。但总体情绪已对文革小组失去信任、失去信心,以极大的不满匿迹在后来的岁月中,萌发出“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三中全会后的体制改革、民主选举以及1989年风波中的大批领军人物。当然,官商、权力欲、腐败也大有人在。他们从不是铁板一块,而只是同路人,因各自的利益和追求终要回归社会各流派。今天,他们只是保留了些习气在身,如诗:“浪迹中华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注5 这三校因地缘位置处在成片军营之间,学生成分也以军队各院干部的子女为主体。三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统一行动,其实就是各军队大院的统一行动基地。后来不分学校,更广义地成为“老红卫兵”的活动场所,十分包容,对外统称“三校红卫兵”,简称“三校”。

注6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句政治术语。“三忠于”指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指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

(责任编辑 李晨)

贱民的本样

• 张 鸣

在我的案头,摆着一套厚厚的书,上下两册。这本书是由一群已经被遗忘的人写的回忆,名字叫《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以下简称《无声的群落》)。写书的人,是一群文革前就上山下乡的老知青。提到这些人,人们能够想起的,顶多是几个被誉为上山下乡运动先驱的人物,比如邢燕子、侯隽,即使这些曾经有过光环的人物,也已经在历史上被人忘却。但实际上,当年下乡的这群老知青,跟这几位先进典型,几乎没有任何关系。邢燕子和侯隽不是他们的代表。他们是一群城市里的贱民,不下乡,是没有活路的。正如书中的一位作者写的,三面架上机枪,只有一面好走。

这些只有一面的小路可走的人,是一些生活在城市里的政治贱民。每个人的背上,都跟当年美洲贩奴市场上的奴隶一样,烙着阶级出身的烙印,无非是地、富、反、坏、右,还要加上资本家或者其他的什么分子。写这本书的作者,在写回忆的时候,身份和地位已经改观了,有的成了教授、作家、会计师,有些人已经成为一定级别的官员,但是,在字里行间,你依然能够感觉到,昔日出身的魔咒,已然留在了他们的血液里,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跟其他的知青回忆不同的是,他们无论写什么,“阶级出身”四个字的阴影,都贯穿始终。

阶级斗争是革命的利器。中国人的阶级论历史,实际上起于1926年毛泽东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篇是《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头一篇被毛选收了,但删改较多,达到80%左右。第二篇一直不大出名,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这两篇文章,却构成了中国革命阶级分析理论的基本框架,把农村的人,按贫富分成雇农、贫农、中农和地主、富农。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分析,当然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构成阶

级的尺度,一是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一是跟先进生产力的联系,最次才是财产的占有程度。所以,他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对立意义上来谈阶级的。但是,到了中国的语境下,由于即使按最乐观的估计,1920年代的中国产业工人,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才有200万。相对于四万万的人口而言,实在是过于少了。而且以毛泽东的敏锐,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的革命,只能在农村有用武之地,所以,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实际上既没有了先进生产力的尺度,也没了生产资料的支配,只剩下贫富一个指标,一个中国古已有之的标尺。按照这个标尺,毛泽东将雇农视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贫农为半无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动力。反过来,地主和富农,就是农村中的反动阶级,革命的对象。处于中间状态的中农,则是争取的对象。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判断往往跟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比如对学生估计过于灰暗,认为学生基本上属于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往往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而农村中的雇农,往往并非革命先锋,投身地主民团反抗革命的也不少。而且农村中的阶级,划分往往界限不清,在一个村庄划为地主的,在另一个村庄可能仅仅是中农。所以,农村中的阶级,不仅中间这块游动性非常大,一个中农,一不留神就变成了富农,就是穷人,也很可能因为其他的因素被划成反动阶级。奇怪的是,这样一种阶级分析方式,却一直主宰了中国革命整个过程。道理很简单,所谓阶级分析,无非是用一种方式把社会切割开,便于革命动员。切割的尺度含糊一点,对于动员无疑是有利的。

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按道理革命已经结束,这样的动员也就不需要了。然而,中共的建设,是革命式的建设,治理,是运动式的治理。动员始终是党的生命。所以,在夺取政权之后,阶级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更加强化,而且等级分明,界

限清楚。即使在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农村的人没有了土地,城市人没有了生产资料,除了少数资本家还拿点定息之外,所有人在理论上都变成了“无产阶级”,但是阶级分野反而更讲究了。比如农村里的中农,现在分成三部分,下中农、中中农和上中农,又称富裕中农,在合作化和大跃进运动中,富裕中农成了重点整肃对象。更重要的是,这种阶级出身固定化了。不仅被评为某个成分的人,一辈子顶着这个身份过日子,哪怕身无分文,整天掏厕所,如果当初是地主,那一辈都是地主。阶级出身不仅固定化,而且跟封建社会一样,身份传宗接代。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在政府对社会的实际控制运作中,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是被严格定义为出身不好的人,在各种需要填写的户口、档案、表格中,打上耻辱的印记,在专政机构和群众专政的监视下,伴随一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等级高度细分的社会。作为贱民的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其实还可以分成若干等。出身地富加上历史反革命(做过国民党或者其他“伪职”),再加海外关系(海外有亲戚),位列地狱最底层,其次是地富加反革命,再次地富加海外关系,然后是单独的反革命家庭出身,接下来是单纯的地富和右派,资本家位列这个系列的最上层。在贱民上面,还有单纯的海外关系,历史上有污点的人,比如做过国民党兵,当过伪军,参加过会道门。这样的人,即使出身贫下中农,也算有污点,除非上面特别看顾;若要重用,也有麻烦。当然,位于社会金字塔顶尖的,就是革军革干和他们的子女。严格来讲,这种森严的社会等级,不大像秦汉以来的帝制国家,倒有点类似于西周封建制,在封建制下存在着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这样的等级,每个等级,都不能逾越,这种等级,比西周还要森严,而且身份固化,贱民之子恒为贱民,子子孙孙不得翻身。还伴随着专制的高压,属于一种专制高压下的封建制。平时的社会管理,就按等下药,每个等级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在运动到来的时候,就连打

倒走资派的文革,最终还是贱民受到的打击最大。文革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小运动,是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小运动中,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传统的地富反坏右。所谓走资派和他们的子女,虽然受了点苦,但被整死的人并不多。

令贱民们最感痛苦的,是他们的子女在升学、参军、提干等方面,都给设置了严格的限制。以考大学为例,对出身不好的人的限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到了1960年代,基本上除了极少数单纯的资本家的子女,可以在高分状况下报考少数师范院校外,贱民子女统统被拒于大学的门外。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无论成绩考得多么好,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大学。像遇罗克那样的遭遇,在中国有千千万万。严格来讲,遇罗克在北京,境遇还要好一点,如果他生活在本书部分作者所在的成都、重庆、长沙等城市,那么,连一个街道工厂的工作都不可能有了。

由于存在着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所以,城乡的贱民待遇也因此有了不同。乡居的贱民,处在十八层地狱最下一层。生产队里最苦、最重的活儿是他们的,但工分却拿的最少。如果摊上不厚道的乡邻,还要经常性地受欺负,养的鸡鸭要被人偷,自己种的菜被人摘。孩子动辄挨打,还不能还手。地富的子女,不仅不能出去工作,连对象都找不到,如果是男孩子,基本上就只有打光棍的份儿。如果赶上运动,不仅地富本人,就连他们的子女,即使什么错都没有,也时常会被拖去挨斗。即使被打死,也没有地方告去。在大饥荒的年月,贱民的死亡率比正常人也高。文革期间很



《无声的群落》插图

多地方发生的针对地富及子女的大屠杀,从根本上说,只是这种长期的歧视的延续和突变。一般来说,相对于乡村的同类,城里的贱民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这是因为当年中国城乡本身存在着差异,城市户口本身具有很大的含金量所致。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们告诉我们,城里贱民们这样可怜的“优势”,也很快就被盯上了,被处心积虑地消除。当政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特别卖力地“消除城乡差别”。消除的办法就是,既不让他们升学,也不给他们任何城里的工作,采取种种方式,把他们逼下乡。因此,文革前的知青,除了像邢燕子那样的少数人,多数都是这样的贱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他们,是心甘情愿选择去农村插队的,因为经过多年的宣传,这些贱民当然地认为自己身上带着原罪,去“广阔天地”,可以用自己的汗水和鲜血,加以洗刷,终有一日,变成正常人。这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城市青年,成群结队来到农村,却很少有人敢恋爱的。对他们来说,如果要结婚的话,也得找一个成分好的,冲淡一下自己血缘的原罪。

对于贱民最严酷的迫害,还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每一个贱民的子女,都时刻面临着要求跟家庭、跟养育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的压力,这种压力,几乎在子女刚一懂事时就开始了,随着年龄的增加,压力越来越大。正如书中有的作者写的那样,当大批中学毕业没有工作的黑五类子女,没有饭碗,没有出路之际,压力达到了顶点。组织上会因势利导,给他们办学习班,引导他们大骂并检举揭发自己的父母亲。让他们自觉地用最恶毒的话,最绝然的行为,去伤害他们的父母。事实上,这种戕害,是深入骨髓的,实现了贱民的非人化。据我所知,很多贱民家庭,即使到了今天,当年的伤痕依然存在,难以愈合。本书作者之一的卢晓蓉女士,告诉我说,当年实行的政策,有一条是让地富资本家断子绝孙,这政策公开的提出不是指肉体消灭,而是在精神层面实现之。从毁灭贱民家庭亲情这个角度,这个政策的确部分地实现了。

在今天看来,这样一种高度专制加封建式的等级制,很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社会制度,怎么可能出现在20世纪?但是我们知道,改革前的中国,实行的是革命式的建设,运动式的治国。所

以,为了动员的需要,人群必须切割,社会必须分等级,尤其必须有贱民的存在。在农村长期吃不饱的情况下,正因为有贱民的存在,其他人即使挨饿,也会感到满足。再穷再苦再低贱的农民,因为有人还在他们的脚下,就会感到踏实和满足。而运动式的治国,也需要不断地有人挨整,不断地需要廉价而听话的苦力,所以,老的贱民不会解放,新的贱民还会不断地加进来。不断保持整个社会的火药味浓度,人与人之间的仇恨,革命和运动,才能有生命力。贱民的队伍,客观地说,一直在膨胀,膨胀到文革时,有人统计,已经有上亿人挨整了。

《无声的群落》的作者,用最朴实,最真实的文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过去的中国出身魔咒的样本。也提醒我们,魔咒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如果我们忘记过去,也许有一天,它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健康生活

从读《家庭保健报》开始

人生什么最重要?健康!有个形象的比喻:身体健康是1,财富和名利都是后面的零,没有了健康的身体,再多的财富和名利都将归零。健康的身体是最大的财富!

在得个感冒要花几百元的今天,疾病带来痛苦的同时,昂贵的医疗费用更让我们望而却步。

其实,疾病重治更重防。《家庭保健报》就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这里有您取之不尽的健康生活知识——家有老人的,到“关注老年病”版看老年病的防治和护理;家人有个头疼脑热,到“家庭医生”版找治病的小窍门;想要求医问药,“健康热线”帮您找到最适合的医院和大夫;想要吃得营养,“饮食保健”版能给您最科学的饮食建议;遇到疑难杂症,“验方集锦”版有中医专家推荐的治病良方和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民间验方……订份报纸,关爱的是一家人的健康。

到邮局即可订阅

邮发代号:13-3

年价111元 月价:9.25元

免费赠报试读 订报参与抽奖

对《家庭保健报》感兴趣的读者,只要将您的姓名、通讯地址、电话告诉我们(打电话至:0451—84652433,发短信至:13030075751,写信至: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2号,家庭保健报社发行部,邮编150010),我们就会免费寄去《家庭保健报》请您试读。3月-6月期间,订阅2010年《家庭保健报》半年期以上的读者,将订报凭证原件或复印件邮寄到报社,即可参加抽奖活动,有机会获得《家庭保健报合订本》或《家庭保健报》二十年精华丛书一册。

印度的宪政之路

• 思 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许多国家相继独立。它们都面临着选择何种政治制度立国的问题。例如,中国选择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而印度选择的是宪政民主制度。

印度的宪政民主制度,是从英国移植又吸收了本国文化传统,经过长期磨合形成的,它对印度独立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印度的社会、宗教、民族、语言、种姓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矛盾异常复杂尖锐,但全国社会秩序基本上得以维持,统一的中央政令大体上可以畅通无阻。在这些方面,政治制度功不可没。

20世纪90年代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印度的发展愈来愈快,长期落后的印度经济终于崛起于世。经济增长率在2007年便达到9.5%,增长率排名全球第二。据世界银行资料,对比1994年与2005年的数据,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已从36%降至27.5%。世界上许多学者都认为,未来十几年印度的发展速度将有可能超过中国。

此外,印度的犯罪率很低。在全球有统计的62个国家中,印度的犯罪率处于倒数第二。

印度大选被媒体称为“穷人的狂欢节”,因为此时是穷人表达民生诉求的最好时机。沿袭了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在近60年的全民普选中受到了致命的挑战,日趋瓦解。1997年7月当选总统的科·拉·纳拉亚南,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位贱民出身的总统。人数占优势的低种姓选民的参选参政,充分体现了宪政民主制度的生命力。

因此,印度堪称新兴国家中最完善的宪政民主主体制范例之一,被誉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

一、印度国情,与中国最为接近

印度和中国是接壤的两个亚洲大国。两国的

国情颇为相似,或曰最为接近。因此,印度的社会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也可谓最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1. 历史悠久

与中国一样,古印度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距今都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从16世纪起,欧洲列强相继入侵这块土地。1600年,英国殖民者成立东印度公司,逐步在印度沿海建立殖民点,至1849年占领全境,英国政府接管东印度公司,直接统治“英属印度”。1947年英国公布《蒙巴顿方案》,实行印度与巴基斯坦分治;同年8月14日和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自治领分别诞生;1950年1月26日,印度宣布成立共和国。

2. 国土辽阔

印度雄踞印度次大陆,国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在亚洲仅次于中国。

3. 人口众多

印度人口长期居世界第二,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一直高于中国。印度全国人口2008年已达11.9亿,预计2050年将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

4. 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

印度和中国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占总人口90%。而印度则有300多个民族,人口比较分散。其中人数最多的印度斯坦族占全国人口46.3%左右,其他如泰卢固族、孟加拉族、马拉地族、泰米尔族、旁遮普族等,分别占总人口的8.6%至2.3%,人数更少的少数民族分布于全国各地。

印度境内有180种语言、700多种方言,使用人口在百万以上的语言有33种。其中宪法上承认的正式语言就有15种,讲印地语的占人口总数40%。官方语言为印地语和英语。

印度是一个多教兼容的国家。约有80.5%的

居民信仰印度教,其他宗教有伊斯兰教(13.4%),基督教(2.3%)、锡克教(1.9%)。此外还有佛教和犹太教等,其信徒各占人口的1%左右。

总之,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宗教及多重文化背景的国家。

5. 建国前的经济基础十分落后

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前都经历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基础都比较落后。且印度遭欧洲国家侵略始于16世纪初,比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要早几百年,灾难更为深重。印度独立前夕,它所面对的是一个100万人死亡、1300万人流离失所、宗教暴力的伤口依然血流不止的社会。

按照某种流行的传统理论观点,在一个人多地广、民族复杂、国民素质低、历史包袱重、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实行宪政民主的。然而,印度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建立起了宪政民主制度,使自己最主要的弱点转变成了优势,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发展,以事实证伪了上述“流行”观点。

二、印度宪法

印度自1947年8月15日取得独立之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从事制定宪法的工作。制宪会议于1949年11月26日通过印度共和国宪法,于1950年1月26日生效,一直沿用至今。截至2002年12月,议会虽已通过86项宪法修正案,但从未发生整体推倒重来、制定“新宪法”的事。

印度宪法共有395条,1000多项具体条款,它的中文译本长达12万字,堪称世界之最。

(一) 公民

印度宪法赋予全国每个人以同样的公民权。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印度公民并且年满18岁,都有权参加选举。每个印度公民都拥有的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表达、信仰、集会、结社、迁徙以及选择职业和行业的自由。这些权利保护每个印度人,使其避免由于种族、种姓、宗教、性别和出生地等原因而受歧视。这些权利在法院是要强制施行的。

(二) 政府

立法机构:印度的政体形式是建立在全体成年人选举权基础之上的议会制。行政机构就议会

的决议和通过的法案向议会负责。主权最终属于人民。议会由联邦院(上院)和人民院(下院)组成。

联邦院:联邦院的成员不超过250人,其中12人由印度总统指定,指定代表都是在文学、科学、艺术和社会服务方面具有专门学识或实践经验的人士。除此之外则按各邦人口多少进行分配,由该邦立法会议员选出。

人民院:人民院是主要的民意代表机构和立法机构,目前有成员545位。其中530位由各邦直接选举产生,13位由各中央直辖区选出,另外两位由总统指定,代表英裔印度人。如果不提前解散的话,人民院的任期自召开第一次会议时算起为五年。人民院有权弹劾总统或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行政机构:印度总统是国家元首及武装部队的统帅。总统由一个选举团选举产生,其成员来自议会两院和各邦的立法机构。总统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一般只任两届。总统只能依照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的建议行使职权。

行政权力归总理领导的部长会议(即内阁)。部长会议对民选的议会负责。总统任命在人民院中的多数党领袖为总理。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实际上都是由总理领导的内阁行使。

司法机构:印度司法机构是统一的,且独立于行政机构,它是宪法的保卫者和解释者。最高法院是最高的司法权力机关。每一个邦都设有高等法院。民法和刑法皆有统一的法律适用于全国。

印度是一个由若干个邦和中央直辖区组成的联邦。印度各邦皆有自己的立法议会,立法议会的所有成员都是由本邦全体成年选举人选出的。各邦首脑称作邦长。邦长由总统任命,其在邦内行使的权力与总统在联邦政府内行使的权力通常一样。与中央政府相同,各邦也有自己的内阁,由首席部长领导,并对民选的邦立法机构负责。

选举委员会:选举机构是集中于中央的一个依法设立的独立机关。该委员会负责监督、指导和控制全国议会选举、邦立法议会选举、总统和副总统选举的选民造册工作,并安排实施选举事宜。

(三) 媒体

印度全部新闻媒体均属于民办,没有官办新

闻媒体。没有任何主管部门对于媒体的编辑方针进行限制和干涉。

这种体制决定了印度媒体一向以思维活跃著称。他们抨击时弊、揭露丑闻,成为印度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种政治力量,对于监督政府运作,增加国家管理的透明度起着重要作用。在同业竞争中生存发展的新闻媒体,由于有了公信力和信誉度,因而在印度社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非常大。

报纸和杂志在印度具有独立地位,均为私人或财团所有。截至2007年底,印度共有96种文字的报刊35595种,总发行量9900万份,居世界第2位。

全印广播电台(AIR)和国家电视台(DD)归一个由著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团体经营,24小时通过卫星自由地向全国各地播放。

三、民主与竞选

印度宪法是一部相对比较完善的宪法,是印度民主政治的标志。它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全民普选、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议会民主、新闻自由的宪政制度,同时规定公民的平等权、自由权、文化教育权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权。

在议会民主制度下,印度各党派为了争取权力,目标直接指向议会的议席多少,而不是通过抓枪杆子、笔杆子夺权。印度政党之多可谓世界之冠,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的报告,1952年印度第一届大选时,全国政党总数为192个,2009年第15届大选时,有1000多个政党参与竞选,注册选民超过7亿,其中有4.4亿人参加投票,投票率为60%。

印度普选制下的社会动员迅速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意识,拓宽了政治参与面,并使印度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在大选中,印度民众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政治热情,选举的结果基本上反映了民意。参加投票的比例一般都超过了60%。民众普遍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不仅逐渐扩大了社会各个层面民主体制的建立,使各级选举形成了制度,而且打破了印度传统社会中特有的封闭性和落后性,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开放。这无疑代表了社会的进步方向。

印度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

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的发生。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从1952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次大选从未中断。每一次选举都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平稳更迭和政府组成的合法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主政体对社会矛盾的调节能力。1989—1999年十年中,曾一度出现过政府更迭频繁,但这种不稳定并没有影响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没有影响国家重大政策的连续性,更没有导致中央政权垮台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因为具有较大弹性的民主政治体制有着保持政治基本稳定的能力;另一方面,印度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较好地保持了文官治国和军不干政的传统。军队始终保持了对整个国家的效忠,这是保持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

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看,尽管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演变,民主政治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但是它已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扎下了根基,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广泛认同,因为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这种制度建立了利害关系,都想通过这种制度分享一部分国家权力。

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像印度这样复杂,有着这样多的种族,相互之间无法用语言交流;宗教和文化习惯千差万别;各地的地形、气候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大不相同。印度的办法是“多样并存的民主”。印度没有借国家团结的名义对多样性进行压制,却在制度安排中认可了这种多样性:所有的团体、信仰、爱好和意识形态都能和平共处、相互竞争。

从圣雄甘地开始的现代印度创始人一直是民主的忠实倡导者,这一点对印度产生了很大帮助。印度第一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尼赫鲁用他全部的政治生涯向人们灌输民主习惯,尊重议会程序以及对宪法体系保持信心。

印度宪法所确立的民主价值观变得如此根深蒂固,甚至当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一度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暂时剥夺了印度的自由之后,她最终还是强迫自己要重新赢得印度选民的拥护,举行了自由选举并在选举中接受惨败的局面。

60年来,印度历经重重挑战但仍能生存下来并蓬勃发展,就是因为它找到了一个真理——

在没有单一的权威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管理国家。举例来讲,印度允许所有宗教自由发展,确保没有任何宗教被国家赋予优势地位。

曾经有人预言印度实行宪政民主会导致国家各民族、种族大分裂,并乐观其“败”。但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再认真谈论印度分崩离析的风险。泰米尔纳德邦和米佐拉姆邦等边远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被一个简单的方法平静地化解:昨天的分离论者变成了今天的首席部长和反对派领袖。

不仅如此,印度的宪政民主绝不是少数人参与的游戏,它对劳苦大众最为重要。投票箱化解了种姓分化的潜在破坏力,低种姓中最卑微的人也能担任政府的高级职务。玛雅瓦蒂,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女子,却三次作为首席部长统治着印度人口最为稠密的北方邦。

从更为广义的角度讲,选举的逻辑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可以支配其他人。在这里,只有选票可以决定权力的更替。

四、宪政与分权

在民主制度的建立上,尼赫鲁是通过自己的巨大影响力,身体力行,率先垂范,通过开创先例的方式来建立民主的惯例与传统。从一定意义上说,印度宪法及宪政体制的巩固,得益于以尼赫鲁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宪法初步运行阶段的宪政精神与工作作风。

印度社会、民族、宗教、语言的高度异质性、复杂性,对于印度的宪政民主制度而言既是一个障碍也是一个优势。各民族、语言、宗教共存于一个国家里的事实,必然要求国家在进行统治时去商量、说服、谈判、妥协与整合。而尼赫鲁作为第一代领导人中的最高领袖,恰恰是一位注重协商与说服的宽容的领袖,一位反对政治暴力的领袖。他曾经在一次演说中说道,“我能容忍因错误的原因而发起的运动,但这些运动必须是和平的、非暴力的。如果我们想要为我们的国家谋取一个伟大的未来,我们就至少必须在这个基本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即在政治领域中我们将实践真理,且以非暴力的手段。”

政治生活中的这种非暴力的精神的普遍存在,事实上为政治斗争各方的谈判提供了一个必

要的基础。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中失败后,一些幕僚曾建议尼赫鲁宣布紧急状态,以帮助政府渡过难关。但尼赫鲁予以严辞拒绝,认为这种措施有违民主传统。

尼赫鲁很注重权力的制衡。他并不赞成将总理和执政党主席的职务合二为一,因为他始终认为同时担任这两种职务会互相干扰。1954年秋,他在连续担任了三年国大党主席职务后,不顾党内的盛情挽留,坚决辞去了国大党主席的职务。为了使宪政制度能够在印度得到巩固,担任总理职务后,他公开表示:“我不想让印度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千百万人对一个人性命是从,我想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在内阁会议上,他从不采取压制的方法,而是以说服的办法使反对自己观点的人接受他的意见。1951年前后,在他的努力下,国大党政府改变以往对共产党的压制政策,使共产党合法化,并反对一些邦取缔共产党的法令,使共产党成为印度的主要政党之一。

尼赫鲁在任时期一直保持着一种民主的领导方式,并把这种领导作风加以惯例化,最终形成了一种制度、一种传统。尼赫鲁本来完全能够凌驾执政党和政治制度,把权力高度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他本来可以运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来取代这种正式的政治制度。许许多多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的领袖就是这样做的,并导致他们的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尼赫鲁没有选择这样做,因此,议会制度得以在印度生根。

五、政党政治逐步发展成熟

印度宪政制度走向巩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其政党政治逐步发展成熟。

从印度独立到印度人民院第9次大选之前的这段时间,国大党长期控制着印度议会(人民院)的绝对多数,独掌政权,因此被称为国大党一党独大制。但印度宪法和法律并不限制其他政党的存在及其谋求执政的活动,在一党独大的同时可以多党并存。1957年,印度喀拉拉邦出现了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邦政权。在西孟加拉邦,从1977年开始,左翼阵线连续执政28年,是印度执政时间最长的地方政府,其首席部长巴塔,是印共(马)中央政治局委员。这种多党并存的合法

状况,为印度独立以后长期保持政治稳定,并为印度最终实现从一党长期执政到多党交替执政的转变提供了法制环境。

纵观印度政党政治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48—1964年,尼赫鲁领导着国大党和印度政府:

由于国大党在英国殖民时期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卓越表现和尼赫鲁本人在印度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国大党理所当然地成为印度独立后的执政党。尼赫鲁及其领导下的国大党在印度独立以后单独执政了17年。

1965—1988年,国大党继续执政,印度民主政治有走向专制的危险:

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去世。不久,尼赫鲁的女儿英·甘地当选为第三任总理。她采取以“消除贫穷”为核心的政治来动员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穷人。这将英·甘地推向了政治权力的顶峰。同时,她利用民众的支持,排除国大党的元老,代之以绝对效忠和维护她个人的官员,这些人同样在低一级上任命效忠于自己的人,致使原来国大党自下而上选举党的领导人的做法被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党的各级领导的做法所取代。此举严重侵蚀了国大党地方领导人的民主基础。再则,为对付老一代国大党精英所组织的反对和指责,特别是对付纳拉扬领导反对党于1974年组织的全国性罢工,1975年6月26日英·甘地宣布全印度“紧急状态”,中止公民的民主权利,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逮捕了大多数反对派领导人。紧急状态持续19个月,英·甘地这一行动导致国大党支持率的急剧下降和国大党内部加剧分裂。1977年大选惨败,使得国大党及尼赫鲁-甘地家族执政链条一度中断。

1984年的第8次大选中,由于英·甘地的遇刺,许多民众出于对其儿子拉·甘地的同情,同时也由于当时拉·甘地本人有“廉洁先生”的美誉,国大党以人民院403席,占总议席73.9%重新胜出。

1989—2004年,印度一党独大体制的结束和两党制的雏形:

1989年,由于国大党在处理地区教派和外交事务上的失误,以及陷入“博福斯丑闻”,最终导致国大党在第9次大选中落败。印度政党政治

进入国大党、印度人民党和全国阵线三足鼎立时期。在1989年12月—1999年4月的10年中,印度一共组织了八届中央政府,其中六届只执政了一年左右便倒台了,印度进入了比较短暂的政府频繁更迭时期。与此同时,多党制终于宣告了印度一党独大体制的结束。

1999年10月印度第13次大选中,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全国民主联盟在人民院543个竞选席位中占有356席。人民党及其联盟稳定执政,一直到2004年。

2004年至今,印度两党制基本成功定型,民主宪政走向成熟:

2004年4月20日—5月10日印度举行了第14届人民院选举。以印度人民党为核心的全国民主联盟只赢得了人民院543个议席中的185席,而国大党及其盟党赢得了217席。根据印度宪法中的简单多数原则,国大党获得了联合其他党派组阁的权力。

2009年4—5月,印度进行第15届人民院选举。选举结果,由国大党领导的联合进步联盟胜出,再次组成联合政府。

这样,经过50余年的长期发展,宪政民主制度经过了初期的不确定状态,在印度基本上算是根深叶茂了。多党竞争、胜者轮流执政,标志着印度宪政民主制度已经成功定型。

六、政治力量的多元化

印度多党竞争局面形成的具体原因在于政治力量趋于多元化。

议会民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选票政治。选举的竞争性使各种社会集团都在为获得政治权力去争取选民,即使是那些原来政治上消极或被排除于政治活动之外的社会集团也被动员起来卷入了国家政治,从而使印度成为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在这个由众多种族、语言、宗教、种姓构成的多元性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在争取和维护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不断集聚并形成了各自的政治势力。长期以来,政治宗教化、种姓化和地方化已成为印度政治发展的显著特点。在印度当今的政治舞台上,代表不同宗教、种姓和地方种族的政治势力正在崛起,并从三个方面使政治力

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1. 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崛起

在国大党走向坎坷的同时,具有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教派色彩的印度人民党却迅速崛起。该党通过唤起广大民众对印度教传统文化的宗教热忱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赢得了政治上的支持,迅速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该党在人民院的席位由1984年2席猛增到1989年86席和1991年119席。在1996年的大选中,该党获得161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组织了政府。在1998年的大选中,印度人民党获得179席,再次成为获得人民院席位最多的政党,与十几个小党共同组成了联合政府。在1999年的大选中,该党获得182席,第三次与其盟党组织了新政府。印度人民党在其成立后的最初几次大选中的得票率,也反映了该党力量的增长和在选民心目中地位的提高。从第8次到第13次大选,它的得票率分别为7.4%、1.5%、20%、25.5%和23.8%。

印度人民党在1998年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情况表明了该党在印度教徒中的支持基础正在不断扩大。该党不仅继续获得了高等种姓半数以上的选票,而且成了获得较低种姓选票最多的政党。该党原来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城市中有文化的印度教徒,但后来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的印度教徒中,都是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在有文化的印度教徒选民中,其支持者最多。

印度人民党在民众中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越来越强,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印度教复兴思潮,一种新的印度教认同正在确立。印度教复兴主义的积极分子常常是成功的商人和官员,印度新闻界称他们为“身穿藏红色衣服的雅皮士”。90年代初其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印度稳健的中产阶级印度教徒、商人、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以及来自高级文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

2. 低种姓政治力量的觉醒

在印度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宪法上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民众,也是两支人数庞大的选民队伍。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表列种姓人数为1.38亿,表列部族人数6780万,两者之和达2亿多,占了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1/4。教育的普及、媒介的扩大和选举制

度的实行,大大促进了低种姓政治意识的觉醒。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政治权力的重要性,要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获得平等权利和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高等种姓和“大人物”逐渐失去了在政治上支配中、低种姓的能力。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较低种姓就已经通过政党政治的合法性,成功地挑战了婆罗门等高等种姓在政治领域里的支配地位。70—80年代,在印度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中、低种姓要求分享高等种姓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也开始高涨,例如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就出现了分别代表中等种姓和低等种姓利益的政党。

由于低种姓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因此很快就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能够在邦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低种姓青年积极参政并成长为颇具影响的政治领袖。从中央和各邦议会议员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政治权力正在从城市的高种姓手中转向农村的中、低种姓手中。低种姓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崛起,必然对其他表列种姓、表列部族等社会贫弱阶层产生示范效应。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低种姓的崛起和参政是印度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会对未来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力量对比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已经对沿袭了几千年的种姓制度构成了致命的挑战。最后彻底埋葬这一丑陋制度的必然正是这支力量。

3. 地区政治力量的增强

印度独立后,虽然名义上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但是联邦政府为加强国家的统一而采取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做法,中央与各邦的矛盾一直比较突出。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在国内少数民族的强烈要求下,按照种族/语言的原则划分了各邦。这种划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种族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助长了地区种族主义的发展和政党政治地区化的趋势。

印度的地区政党一般都是代表某一邦的地区利益或者是某一特殊种族/语言、宗教或种姓集团的利益,因此在地方上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在某些邦,如泰米尔纳德邦、印控克什米尔和西北部地区的所有邦,全国性政党的力量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一些所谓的全国性政党,如大众党(BSP)、平等党(Samata Party)、印共和印共

(马) ,实际上也只具有地区特征。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越来越多的地区政党的实力和影响不断增强 ,有的在本邦建立了政权 ,有的成了邦内最大的在野党。从 90 年代以后的几次大选结果中 ,可以明显看出地区政党在中央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地区政党在人民院的席位从 1991 年 55 席依次增加到 1996 年 110 席 ,1998 年 168 席和 1999 年 222 席。它们的得票率也从 1991 年 15.1% 增加到 1999 年 23.6%。

地区政党势力的上升大大削弱了全国性政党的势力。由于地区政党在人民院获得的席位越来越多 ,全国性政党只有在地区政党的支持下才能上台执政。目前 ,在一些重大的国家政策 ,甚至对外政策方面 ,邦政府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印度中央高度集权的联邦体制有可能转变为真正的联邦制。

正是政治力量多元化的趋势 ,促使印度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日益成熟和不可逆转。

七、宪政的活力

在宪政民主建设落后的国家 ,对于宪政民主制度了解不多、顾虑重重 ,往往有一种谈虎色变的落后意识。有些人误以为一搞宪政民主就会导致民族分裂、经济发展缓慢 ,引起社会动乱。而印度的现实 ,恰恰否定了这种落后意识和误解。

如今 ,宪政民主体制已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扎下了根基 ,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广泛认同。印度的经验再一次表明 ,宪政民主体制具有较大的弹性 ,对缓解社会矛盾有较强的协调能力。通过宪政民主制度 ,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 ,避免了大规模暴力事件的发生。印度仰赖这样一种制度 ,得以通过事前的充分协商和社会各集团的利益诉求 ,使社会矛盾适度释放 ,不至于因长期积累酿成不可收拾的大动乱 ,从而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政府作为定期获得人民授权的公仆 ,也不得随心所欲、胡作非为、折腾社会。在印度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中国那种针对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 ,在印度的宪政条件下 ,也不可能“高举三面红旗” ,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 ;更不可能出现一个领袖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竟导致整整



印度国会大厦

十年的全国性浩劫。因此 ,宪政民主被各界视为印度长期发展的可靠的制度性保障。

当然 ,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天然完美无缺的。宪政民主的推行 ,难免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印度也不例外。在不尽如人意的现实面前 ,倒退没有出路 ,出路就在于努力完善。民主制度本身 ,也是提高民主质量的最佳途径。正像美国大师杜威先生所说 :“当民主有病时 ,加重民主成分便药到病除。”例如 ,印度民众对于尼赫鲁 - 甘地家族权威崇拜的传统 ,正是在多党竞争中才得以逐渐淡化。

由于开国领袖尼赫鲁在经济体制上偏好苏联模式 ,印度搞了四十多年的计划经济 ,导致庞大的国有经济长期效率低下 ,政府管制无处不在。后来通过艰苦的经济改革 ,印度经济才摆脱了旧的模式。从 1991 年开始 ,印度经济逐步从政府管制中松绑 ,在自由市场中翱翔。幸亏印度宪法从来就保护私有财产 ,并拥有较完备的法治体系 ,故私有经济的发展如鱼得水 ,没有体制性的障碍 ,没有“所有制歧视”问题。在印度国内 ,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生机勃勃的创新型私有企业正在逐步获得全球竞争力。目前印度私有企业产值已超过 GDP 的 60%。

印度政府在“十五计划”中 ,将 2002—2007 年的经济增长率定为 8% ,已经完全实现。尔后 ,2008 年增长率达到 12.7%。后来同样是受到世界金融风暴的影响 ,2009 年第一季度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 6.1% ,而印度为 8.9%。

此外 ,印度在教育 and 医疗方面创造了诸多优势。

印度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 ,2003 年便已

达到 5% ,远高于中国(2006 年尚不足 3%)。印度从幼儿园到高中 ,全部免费 ,公立大学有补贴 ,私立大学学费与世界各国相比也很便宜。印度高等教育规模在世界上名列第三。

印度全民享受免费医疗。国立医院不但基本治疗全部免费 ,而且治疗期间 ,还可以享用医院提供的免费食物。私立医院虽然要收费 ,但按照一般国际标准衡量 ,价格仍然是相对便宜的 ,以至于大批西方国家的患者不远万里到印度求医 ,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

印度经济改革的起步比中国晚了 13 年 ,印度经济和中国经济你追我赶 ,都在崛起之中。“龙

象共舞”的图景已经成真。

然而 ,中印两国的崛起 ,在国际上的接纳程度却有很大的差别。全球“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却未闻“印度威胁论”。对于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 ,世界不仅没有顾虑和猜忌 ,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还纷纷予以协助和鼓励。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待遇如此悬殊 ,关键究竟何在 ?说透了 ,就在“宪政”二字。

看来 ,宪政问题不仅涉及内政 ,而且涉及外交 ,涉及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历史地位。

(作者系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	新华社总编室	26.00	6.00
吴江文稿	俞可平主编	200.00	18.00
李昌传	周士元	68.00	8.00
1957 年的夏季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 22 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	刘 刚 李冬君	58.00	9.00
1978 大记忆	苏 峰	35.00	7.00
刷盘子 ,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钟 庆	28.00	7.00
三十年河东 ,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杨继绳	39.80	8.00
国学大师之死	同 道	29.00	7.00
人生的三路向 :宗教、道德与人生	梁漱溟	28.00	6.00
问史求信集	阎长贵 王广宇著	58.00	8.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7.00
潜规则 :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 :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	邓 鹏	97.00	10.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揭秘	杨天石	60.00	8.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辉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经历——我的 1957 年	和风鸣	29.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6.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22.80	6.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于光远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36.00	7.00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26.00	6.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叶维丽	30.00	7.00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 ,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 ;一场突破禁区与僵化的思想解放运动 ,身处核心地带、参与和直面大讨论的亲历者 ,以第一手资料回顾 30 年前的讨论内幕。

《走出个人崇拜》 神化领袖 ,搞个人崇拜 ,先后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浮现 ,并泛滥成灾 ,如苏联 30 年代——50 年代兴起的个人崇拜 ,导致肃反扩大化灾难。中国 60 年代——70 年代个人崇拜的狂潮伴随文革悲剧的发生。作者对昔日政坛上的领袖们 ,以人生的视角做出新的考察和反思……

《李锐反“左”文选》 1957—1978 年的 20 年 ,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 :反胡风 ,反右派 ,大跃进 ,反右倾 ,“四清”社教 ,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 ,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 ,必读李锐文章。

《苏共亡党十年祭》 通过反思苏东剧变 ,深刻剖析了苏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悲剧 ,文章针砭时弊 ,“实话实说” ,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 ,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共鸣。

《问史求信集》 这是一部由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阎长贵、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合著的问信文革史研究著作 ,书中他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将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回忆和记录下来 ,供读者参考和研究。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这是一部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书 ,但不同于个人回忆录 ,书中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 ,作者将了解的情况如实写出来 ,留给今人和后人探讨。

北京市内乘车路线 :公交车 13 路、21 路、32 路、65 路、68 路在三里河东口站下车 ,西行 50 米路北 ,西华饭店院内。

更正

贵刊 2010 年第 2 期“《无声的部落》最后的古代故事”一文中提到王百明同学是被造反派农民所杀一事似与事实有偏差。

王百明是我在长沙三中(现明德中学)高中同班同学。1967 年 11 月我正在长沙,18 日曾买到一本“王百明烈士诗抄”,说到他在江永县落户,是造反军。2 月 2 日当了湘江风雷江永县宣传部长,2 月 4 日被抓起来,在监牢里关了 86 天,出狱后又干,8 月 17 日 7 时在县武装部谈判后出门被老保打死。

“湘江风雷”是当时湖南的造反派组织,从王百明被抓入狱可知他是造反派,因此杀他的绝不可能是造反派,而只能是保守派组织。

现在一提到在文革中干坏事就一定是造反派,这是对文革历史的简单化认识,如贵刊 2009 年第 2 期《郭小川借调到国家体委之后》一文中,说到 1974 年 12 月体委还有造反派在斗王猛。事实上在 1969 年底最迟 1970 年时已经是全国山河一片红了,各单位内各派(包括造反派、保守派)都已经联合成立革委会了,造反派作为一个组织早已经不存在,何以四年后又出来造反呢?

希望贵刊能对此类文稿加以更加细致的调查考证,以事实为依据,还原历史真相,尊重人性和世界观、价值观,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和准则看待和评判文革及其他历

史中的事件和个人。

最后祝愿贵刊越办越好,成为炎黄子孙研究中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读者 刘人灿

贵刊今年第 3 期的文章有文字的错漏,试述如下:

1. 第 4 页右栏第 10 行,“不爆发不造反”,应为“不爆发造反”。

2. 第 5 页左栏第 18 行,“这些价值观念的核心就人的……”,应为“这些价值观念的核心就是人的……”。

3. 第 28 页左栏第 2 行的“特色人选”,应为“物色人选”。

4. 第 85 页左栏第 3 行的“忠王李秀城”,应为“忠王李秀成”。

5. 第 45 页右栏第 15 行至第 16 行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应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6. 第 21 页右栏最后一行至 22 页左栏第 1 行“他们就把时任副部长的张闻天弄来了”。张闻天此时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无任何实际职务。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于 1959 年庐山会议后的国务院第 91、92 次会议被解除。

7. 第 68 页右栏倒数第 8 行“贵州彭水诗案”应为“重庆彭水诗案”。

刘金海

征稿启事

社科历史、文学小说、经济管理书稿

书稿内容: ●1. 以回忆录、自传或其他人物传记,社会纪实作品为主的文史类书稿; ●2. 以社会科学、人文与伦理、历史与年鉴、哲学与思想、文化与民族等题材的学术研究著作书稿; ●3. 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文学类书稿; 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败等各类题材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集书稿; ●4. 美术类: 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等; 书法类: 毛笔、硬笔、篆刻等作品; ●5. 区域经济、宏观经济、产业研究、商业流通、资本运营、财会研究、管理纵横、国际贸易、市场营销、公共管理等经济管理书稿。

畅销书出版方式或合作出版方式 国内正规出版、公开发行 或海外正规出版、公开发行

◆书稿要求 可为个人专著、也可为多人合集。个人专著可以由单独的作品或若干篇合集组成,字数应达到 6-8 万字以上;多人合集可以由 2-10 名作者的作品组合而成,每位作者单独或多篇作品字数应达到 3 万字以上。

◆出版发行办法 以图书形式陆续出版,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分别面向国内以及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国家级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查询。

◆其它事宜 1. 保证尊重作者著作权,签订标准合同; 2. 组稿、征稿长期有效,来稿来函将在一两周内回复; 3. 来稿请勿寄原稿(切记!),并保证字迹工整、清楚,已编好目录、顺序; 4. 书稿经审阅,如达到出版水平,我们将及时通知作者,如经审阅不符合出版要求,作者可以要求稿件退回(挂号或特快退回,须自付邮资); 5. 寄稿须知: 书稿打印、复印、剪贴、抄写、磁盘均可,发电子邮件(E-mail)更佳,来稿时附彩色近照一张,200 字内简历一份,注明联系地址、电话; 6. 未尽事宜,欢迎来人、来函、来电联系。

24 小时全国免费投稿热线电话 400-680-8368 详情请浏览网站: <http://www.zuojiaba.com> (中华出版热线)

投稿地址: 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 3 号 654 信箱(100025)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综合编辑部(收) 联系人: 羽菲、文馨、郝丽娜(编辑) 电话: (86)10-89506525、81118378、81118398、58429718 传真: (86)10-89506467 在线投稿: bookbj@126.com

约 稿

党建管理、行政管理论文专著

书稿内容:

●各级党政、企事业单位、院校领导干部、管理者、研究员专题报告、论文集、研究专著;

●党政领导、党务工作者编写的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经济众说、改革与发展、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公共行政、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等专著。

●各级党政、企事业单位编撰的实用政策论文、党建工作管理、党建工作探讨、党建优秀成果汇编。

●各党政、企事业单位、院校举办活动和庆祝所需的画册、专题类书稿;

●同时,我们编辑室也可代为策划、编写、整理书稿。



记录人生 传承文化

——三千元起编辑出版个人文集、家史传记

出书范围

一、个人文集：

- 1、个人文集：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 2、生平传记：革命史、受难史、创业史等回忆录、自传。
- 3、学术著作：思想理论、学术专著：旧文结集、旧书翻印等。

二、家史传记：

- 1、先辈遗文：先辈遗文集、先烈纪念集；录音、摄像，遗作汇编。
- 2、家史传记：家族大事记、家族先贤传，家谱族谱、家史档案等。
- 3、传家宝盒：百年家族史、家族图片册，家史光盘、家族音像等。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出版附赠光盘，需录音摄像另行协商）。

基本价格

一般标准：大32开本，封面插页铜版纸彩印、内页胶版纸印刷，无线胶装。

基本价格：二百页出版50本两千元，三百页出版50本三千元；设计、排版与加印彩色插页费用另行计算。

特别说明：书稿内容文责自负，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需办理出版书号的我们编辑、设计制作样书后另行安排。

欢迎“代理组稿”

“个人出书、老人出书、家族出书”价格便宜、出版快速，深受各地离退休老干部、老教授与民间文化人的欢迎和支持，每月汇编个人文集、家史传记50余部。为方便地方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们计划设立“地方组稿分站”，请有组稿资源与编辑经验者来函来电洽商合作。

出版服务热线：010—68920114 68920182

时代文化出版机构：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街五号
（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院）
博越商务楼6507室 邮编100089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老人出书网》（www.l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net）

长途免费咨询
400 633 2311

欢迎订阅2010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传真：(010) 68532569

每期定价：6.90元

全年定价：82.8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谜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新中国60周年丛书：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内容简介：

本书多位作者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非凡的历史瞬间，既有官家的宏观视野，又有民间的客观冷静。这些发表于著名纪实性杂志《炎黄春秋》的文章，致力于匡正教科书的偏误，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实历史，全面提供了观察中国政治、经济与生活变化的新视角，诸多真知灼见也闪耀其间。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欲购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购。



寻找王佩英

杜光：何家栋的尊严

山东的法制“大跃进”

秋瑾案与林昭案的启示

林韦这个人不会长寿

印度的宪政之路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6.90元